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邱坤玄博士

冷戰後美中關係之研究-以權力轉移理論分析

研究生：陳仁欽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

摘要

對於國際格局的變化，長久以來，國際關係學者對強權間的競爭，始終充滿著濃厚的興趣。因此，有許多著名的理論不斷的被提出，也引發國際間很多的爭論，其中最核心的問題，莫過於「新興大國的崛起對於既有強權，以及其所維持的世界秩序之挑戰。」雖然，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對抗觀點在冷戰結束後已不再適用，但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高速成長，關於中國大陸的議題不再集中在中國大陸是否能夠崛起，而是中國大陸將以何種方式崛起？其核心問題是，中國大陸是否將重導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歷，即與霸權國發生衝突和對抗，從而導致國際關係的劇烈動盪，甚至是戰爭？還是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成為推動和維護國際穩定繁榮的重要力量？這是一個異常複雜和難以回答的問題。本文研究目的乃在試圖解構冷戰後美中權力關係互動的實質內容，並進行合理的解釋，俾利達到理論與事實相互輔佐的功能。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國際體系不斷重複權力轉移的現象，而這種權力轉移的現象，大多伴隨著戰爭而發生。但是，也有例外的證例，如 20 世紀英美的權力轉移。冷戰後，美中對彼此的戰略布局，其主軸乃圍繞在「超級強權」與「崛起強權」的思維上，即美國所思慮的是如何因應「中國崛起」對其霸權地位的挑戰；而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是如何突破美國對其崛起的制約。至於美中權力關係的互動是朝戰爭或和平的權力轉移，仍有待觀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是否走向戰爭或和平之路乃取決於美中兩國對彼此的權力差距與滿意度，如果權力差距縮小；且不滿意程度越高，則發生戰爭的機率就越高。

權力轉移即是權力流動變化的一種現象，在權力重新分布的轉換過程裡，不只是國家與國家的雙邊關係受到權力轉移的影響而改變，而且區域與全球的國際秩序也因為國家之間實力的接近而重新調整。美中關係的變化即是一個典型的以「權力重新分布」為基礎的權力政治。美國與中國大陸之所以進行戰略競爭，其最主要的驅動力量係來自於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包括雙方各自內部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的不平均發展（而且是中國大陸高於；且快於美國），以及外部的國家實力接近。這個現象適足以被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轉移理論」所解釋。

關鍵名詞：超級強權、崛起強權、中國崛起、權力轉移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評述-----	5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15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8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20
第二章 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與內涵-----	22
第一節 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	23
第二節 權力轉移理論的內涵-----	26
第三節 英美權力轉移的過程-----	40
第四節 權力轉移理論與其他理論之比較分析-----	52
第三章 超極霸權的全面管理——美國的戰略布局-----	63
第一節 軍事層面-----	66
第二節 經濟層面-----	75
第三節 外交層面-----	82
第四節 小結—權力轉移理論的比較分析-----	91
第四章 崛起強權的全面挑戰——中共的戰略布局-----	94
第一節 軍事層面-----	96
第二節 經濟層面-----	110
第三節 外交層面-----	119
第四節 小結—權力轉移理論的比較分析-----	129
第五章 結論-----	131
第一節 研究回顧-----	131
第二節 研究心得-----	135
參考資料-----	147

圖 次

圖 1-1：資料蒐集與處理流程圖-----	17
圖 1-2：研究架構流程圖-----	20
圖 2-1：傳統金字塔形式的國際體系-----	29
圖 2-2：三角錐式的國際體系-----	30
圖 2-3：內生成長曲線-----	33
圖 2-4：滿意度在國際體系的分佈-----	35
圖 2-5：挑戰者與防衛者的權力轉移過程-----	37
圖 2-6：英、美的權力均勢與轉移之時間-----	44
圖 2-7：攻勢現實主義的邏輯架構-----	58
圖 4-1：中共珍珠鏈戰略圖-----	114



表 次

表 2-1：滿意與不滿意的動態-----	36
表 2-2：1890-1938 年大國的生鐵與鋼鐵產量-----	41
表 2-3：1880-1938 年大國整體工業潛力的消長（以 1900 年時的英國為 100）-----	41
表 2-4：1880-1938 年大國在世界製造業產量中占有率的消長-----	42
表 2-5：1800-1900 年之間英國與美國財富與人口之比較-----	42
表 2-6：1890-1938 年大國能源消耗的比較-----	43
表 2-7：英、美海陸軍人數與戰艦噸位之比較-----	43
表 2-8：1495 年以來霸權周期的過程-----	54
表 2-9：區域戰爭的機率-----	62
表 3-1：1997-2009 美中防務協商會談-----	74
表 3-2：1990-2009 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順差-----	77
表 3-3：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條件-----	81
表 4-1：中共公布近 10 年國防預算統計表（2000 年至 2009 年）-----	9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長久以來，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強權間的軍事鬥爭，始終充滿著濃厚的興趣。因此，有許多著名的理論不斷的被提出，也引發國際間很多的爭論，其中最核心的問題，莫過於「新興大國的崛起對於既有強權，以及其所維持的世界秩序之挑戰。」¹。雖然，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對抗觀點在冷戰結束後已不再適用，但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高速成長，關於中國大陸的議題不再集中在中國大陸是否能夠崛起，而是中國大陸將以何種方式崛起？其核心問題是，中國大陸是否將重導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歷，即與霸權國發生衝突和對抗，從而導致國際關係的劇烈動盪，甚至是戰爭？還是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成為推動和維護國際穩定繁榮的重要力量？這是一個異常複雜和難以回答的問題。誠如 2005 年 11 月，英國女皇曾對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示：

「上次我訪問中國，差不多已是 20 年前，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發展備受全球矚目和羨慕。但是，我們很想知道，中國人民究竟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而他們又將在 21 世紀的國際事務中，扮演甚麼角色？國際社會如何看待它的新角色呢？」²。

當中國大陸的經濟與軍事迅速成長的同時，「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也成為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領域裡（不論是學術研究或是政治實務）一個極為熱門的議題。³

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Kennedy, Paul 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

² 「英女皇告訴胡錦濤，西方為何擔心中國崛起」，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834&Itemid=47，上網檢視日期：2010 年 12 月 20 日。

³ 關於「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請參照：Denny Roy, "Hegemony on the Horiz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r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18-32;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5-40;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Summer 2006), p. 45-52.

在中國大陸快速發展的脈絡裡，有些人對東亞區域秩序的現狀與未來依然感到樂觀；他們認為美國終究還是此一區域的霸權，同時也認為為了維持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美國必須繼續保有它在此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優勢。相對地，有些人則對目前與將來的東亞區域秩序感到悲觀；他們認為中國大陸迅速的經濟與軍事成長將會很快地趕上並且超越美國，中國的崛起勢必會挑戰美國在東亞的支配地位。他們也認為極其潛在地，一個由美國與中國所共組的「兩極體系」(bipolarity) 未來將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兩個論點的相互對照之下，未來的東亞區域秩序會是什麼？是一個以美國霸權為首的「單極體系」(unipolarity) 會繼續維持？或是一個由美中兩國所構成的兩極體系會迅速到來？亦或是會演變成一個由美國、中國、日本與俄羅斯所構成的「多極體系」(multipolarity)？這些關於華盛頓與北京之間力量變化的爭論，以及對於東亞區域秩序重構演變的歧見，促使本篇論文想提出一個核心問題：什麼是形塑美國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有哪些國際關係理論是有助於我們瞭解這強權競爭與國際秩序重構背後的驅動力量？

的確，我們很想知道國際社會是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國」？因為國際關係中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就是「國際社會如何容納新興強權的雄心」。⁴

中國大陸，⁵這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國家，在 19 世紀前，以「朝貢體系」模式支配著亞洲，可謂是世界區域霸主之一。但是，隨著 18、19 世紀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中國與西方國家間的實力差距逐漸懸殊，在 19 世紀中淪為西方列強爭奪利益的犧牲品。經過 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國逐漸擺脫次殖民地的角色。與此同時，中國內部卻發生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鬥爭，其結果是中國大陸被共產黨赤化，成為共產集團的一份子。

美國，這個僅有 230 年歷史之久的國家，從 1776 年 13 州的殖民地逐漸發展成一個 50 州的大國。建國後的美國經歷了三項緊密相連的政策，一是在北美擴張；這項政策通常被冠上「天定命定論 (Manifest Destiny)」之名；⁶二是建立西半球最強的國家，也就

⁴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7 Vol.72, No.5, (November/December, 1993), p. 59-74.

⁵ 本文所稱之「中國大陸」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求論述方便亦簡稱為「中共」。

⁶ Anders Stephanson,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 Marc Egnal, *A Mighty Empire: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是在既有的領土內締造強大的國家；⁷三是盡量減少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在美洲的影響，而此項政策，就是大家熟知的「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⁸基此，美國於 19 世紀末成為美洲的區域霸主，更於 20 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領導西方國家與共產主義對抗的全球性霸主。

美中兩國之間的互動隨著時空背景而有所改變。1990 年初蘇聯勢力的解體，促使中國取代蘇聯而成為共產主義的代言者，中國國力的增強，在國際上掀起一股「中國威脅論」的聲浪，⁹導致美中兩國之間的互動必須重新省思。當「中國威脅論」相繼在西方提出後，中共官員與學者便意識到國際社會對此一問題的擔憂，並提出「和平崛起」的新論點。為此中共學者鄭必堅提出：

「中國不會走向擴張霸權，謀求崛起的道路，中國只是求和平崛起。」¹⁰

而所謂的「和平崛起」包括了下列幾點意涵：一是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己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二是中國的崛起應把焦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自立更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人力資源和雄厚的資金累積，以及改革帶來的機會創新。三是中國的崛起不會損害世上其他國家之利益。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四是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即使強大了，也永不稱霸。¹¹

2005 年 11 月，英國女皇曾對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示：

「上次我訪問中國，差不多已是 20 年前，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發展備受全球矚目和羨慕。但是，我們很想知道，中國人民究竟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而他們又將在 21 世紀的國際事務中，扮演甚麼角色？國際社會如何看待它的新角色呢？」¹²。

⁷ D. W. Meinig, *The Shaping of Americ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500 Years of History*, Vol.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4-32.

⁸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3).

⁹ Avery Glo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¹⁰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12/25/0112.htm>，上網檢視日期：2010 年 12 月 15 日。

¹¹ 李而炳，*21 世紀前期中國對外戰略的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頁 164。

¹² 「英女皇告訴胡錦濤，西方為何擔心中國崛起」，

的確，我們很想知道國際社會是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國」，因為國際關係中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就是「國際社會如何容納新興強權的雄心」。¹³

貳、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研究動機的描繪，吾人可確知中國崛起是目前全球焦點議題，其包含的面向非常廣泛，其中除經濟崛起被視為較具正面的態度外，其他如軍事崛起、國際勢力崛起等因素，對亞太地區的國家，尤其是臺灣而言，均形成相對性的威脅。對於各界疑慮中國勢力的崛起，中國早已意會明瞭，為泯除他國對中國勢力崛起的疑慮，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黨校前任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演講，首次提出「中國和平崛起」論題；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在哈佛大學演講，首次以中共官方闡述「中國和平崛起」的思想；2003年12月26日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胡錦濤再次強調，中國追求的是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¹⁴因此，本文研究目的乃在試圖解構冷戰後美中權力關係互動的實質內容，並進行合理的解釋。

根據文獻探討，發現不同的研究者採用不同的理論來研究美中關係的發展，而那些常用的理論包括了「決策理論」、「體系理論」、「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權力轉移理論」等。¹⁵上述眾多理論中，本文採取「權力轉移理論」，並在該理論的基礎上試圖從中論證「權力轉移理論」的解釋力，以達到理論與現實的結合。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評述

壹、文獻探討

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係針對目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加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834&Itemid=47，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2月20日。

¹³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November/December, 1993), p. 74.

¹⁴ 邵宗海，「胡錦濤對臺政策之分析 2002年—2007年」，楊開煌主編，**胡錦濤政權之續與變論文集**（臺北：問津堂書局，2007年12月），頁322-323。

¹⁵ 參閱本文第二節。

以探討。旨在整合某個特定領域中，已經被思考與研究過的資料。其目的乃在將已經研究過的作品，做一個摘要與整合，並提供未來研究的建議。¹⁶本文主要從「權力移轉理論」探討冷戰後美中權力關係互動的實質內容，為能充分瞭解問題核心與研究重點，擬將文獻探討區分「美中關係發展」及「中國崛起」等二部份實施分析整理。茲將各相關學術著作略述於后：

一、國外專書

2008 年，法里德·札卡利亞 (Fareed Zaka) 的「後美國世界」¹⁷一書是在當前的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對權力轉移進行的詮釋和剖析。札卡利亞認為，當代世界正在經歷現代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權力轉移。這種轉移不僅發生在經濟領域，還體現在軍事、社會和文化層面上，世界力量的分配正在逐漸脫離美國的經濟支配，邁入一個多元勢力共同支撐的「後美國時代」。但札卡利亞反復強調，後美國世界不是一個美國衰落的世界，而是一個「他者崛起 (the rise of the rest)」的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美國和其他各國領導人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創建一個新的國際體系，從而在全球性重大問題上開展有效的國際合作。「後美國世界」既含有對國際格局權力轉移的擔憂，也不乏對全球合作與治理的真知灼見，提出了一個認識國際形勢的新視角。

1999 年，詹姆斯·曼恩 (James H. Mann) 著「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一書出版，主要敘述從尼克森到柯林頓時期的美國政府如何制定對中國的政策，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提到，本書的目的是調查尼克森時期美國與中國形成的關係；檢討美、中關係在 1970、1980 年代如何發展；描繪因冷戰而起的結合，如何在 1989 年天安門廣場動亂，以及蘇聯瓦解之後，也告解散。是什麼原因使兩國結合？兩國領導人之間如何打交道、達成什麼協議？雙方關係為何？如何在 1989 年之後起了戲劇性重大變化？該書的價值在於詳盡的道出美國在對中國決策過程中的內幕。¹⁸

2001 年，藍普頓 (David M. Lampton) 著「同床異夢：處理 1989-2000 年的美中外

¹⁶ 盧建旭，「文獻評論」，朱宏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臺北：正中書局，1999 年），頁 95。

¹⁷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Norton, 2008), p. 21.

¹⁸ James H. Mann 著，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臺北：先覺出版社，1999 年），頁 49。

交」(*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一書出版，主要論述了冷戰之後最初十年裡美中關係的互動。該書提出四個影響美中關係互動的轉捩點，第一，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第二，1994年美國把人權問題與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掛鉤。第三，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第四，1999年發生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臺灣宣佈與中國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等四項事件。對於此四個轉捩點，該書提出詳盡的說明，並且認為這些關鍵性因素使得美中關係在未來是處在「廣泛合作的關係」(broadly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混雜的關係」(mixed relationship)、「廣泛衝突的關係」(broadly conflictual relationship)等不同的情境。¹⁹

2. 探討中國崛起所構成的挑戰：

1999年，美國研究機構蘭德公司(RAND)的一份研究報告「美國與崛起的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指出，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強權，在不久的將來將有能力挑戰美國在東亞的地位及美國在此區的軍事、政治與經濟實力。美國面對中國的挑戰，應該採取多方面的途徑加以因應，「交往」與「遏制」的結合是一種不錯的方式。²⁰

1999年，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與陸伯彬(Robert S. Ross)主編的「與中國交往：應對一個崛起的大國」(*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一書出版。該書主軸以「交往」為論述重心，賦予「交往」理論基礎，並且論證美國對中國採行「交往」的可行性與成果。該書中有一篇標題為「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的文章，該篇從理論與歷史的角度詳盡探討如何面對一個大國的崛起，對於後來研究與該相關議題者助益非常大。²¹

2000年，由布朗(Michael E. Brown)與寇特(Owen R. Cote)等人合編的「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一書出版。該書集結多篇文章，廣泛探討中國崛起的問題。包括對中國崛起能力與意圖的評估，如Avery Goldstein所寫的「Great Expectations:

¹⁹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²⁰ Zalmay Khali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Byman, Roger Cliff, D. Orletsky, David A. Shlapak, and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99).

²¹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一文；中國崛起對美日聯盟與東亞安全的影響，如 Thomas J. Christensen 所寫的「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一文；以及如何面對中國崛起，如 Gerald Segal 所寫的「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t of China」一文。²²

2002 年，由龐芙瑞 (Carolyn W. Pumphrey) 主編的「中國在亞洲的崛起：安全意涵」(*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一書出版。該書同樣集結多篇文章來探討中國的崛起問題。包括了探討美中(共)關係的相處，如 Joseph Grieco 所寫的「China and America in the New World Polity」一文，以及 Kurt Campbell 所寫的「Hegemonic Prophecy and Modern Asia: Lessons for Dealing with the Rising of China」一文。探討中國的崛起是否對鄰國構成威脅，如 Michael R. Chambers 所寫的「Rising China: A Threat to Its Neighbors」一文。²³

二、國內專書

1999 年，張亞中與孫國祥合著的「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一書出版，主要論述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轉變。該書認為，在冷戰期間，美國從未有過真正「圍堵」中國的思維。但是在冷戰後，美國對於中國的政策，「圍堵」的聲量不曾退去。實際運作上，柯林頓時期的美國以「交往」代替「圍堵」作為美國的中國政策主軸。展望 21 世紀，該書認為促使中國融入國際建制是美國未來的目標，而美中所建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是第一步。²⁴

2001 年，胡為真所著「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一書出版，主要以分析尼克森總統到柯林頓總統的美國對華政策史為重點，實際上卻敘述自 1949 年到 2000 年近五十年的中美關係史。胡氏參考豐富的中英文一手文獻，包括大量引用美國 1999 年才編輯的「中美關係檔案」中兩千餘份文件，對於學術界有相當大的貢獻。²⁵

2002 年，陳文賢著「柯林頓及布希政府的中、臺政策：決策小組之研究途徑」一書

²² Michael E. Brown and Owen R. Cote (eds.),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²³ Carolyn W. Pumphrey, *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²⁴ 張亞中、孫國祥合著，*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文化，1999 年）。

²⁵ 胡為真著，*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臺北：商務書局，2001 年）。

出版，主要以「決策理論」中「決策小組」模式來論述美國近十年間，那些行政部門的外交菁英（elites）的觀點深深影響美國對中國與臺灣外交政策的制定。所謂「外交決策小組」，陳氏係指「美國總統本人及其核心幕僚，外交核心幕僚有時不一定指與外交軍事有關的高級幕僚所組成，但通常是會包括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國家安全顧問、白宮幕僚長。針對特定國家的政策有時再包括較低官階的主管官員。」根據陳氏的研究途徑，我們很清楚地知道若要了解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應著重在「外交決策小組」身上，尤其是該小組成員的理念更是左右對中國政策的主要關鍵因素。²⁶

2003年，倪世雄所著之「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在述及冷戰後國際衝突的新課題「大國衝突」時有如下的評述：

「自蘇格拉底以來，歷史學家和政治觀察家就已經注意到，權力的迅速轉移是全球大國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近百年來，幾次大國戰爭的一個深層次的結構原因，就是權力的迅速轉移。因為權力轉移能夠導致衰弱的大國出其不意地襲擊正在崛起的對手，或者導致那些自認為國際地位與其軍事實力不符的新興大國侵略他國。」

但作者緊接著指出：「然而，冷戰結束造成的權力轉移，並沒有引起新的破壞全球均勢的大國衝突，更不用說世界大戰了。」此一補充相當程度的反應出大陸學者認為「權力轉移理論」有鼓吹「中國威脅論」之嫌，而傾向從負面解讀，例如大陸學者劉小彪就直接了當地指出：

「關於中國的崛起將對美國的霸權形成挑戰這一點，西方一些人還找到了「理論依據」，其中之一就是所謂的「權力轉移理論」。

2004年，袁易、嚴震生、彭慧鸞合編的「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一書出版。該書主要集結數十篇有關論述中國崛起的文章，分為四方面，一是有關政治現實與戰略選擇，其重點在突顯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挑戰與反應；二是有關經濟現實與經濟安全，其重點在於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與問題所在；三是有關區域安全與軍力平衡，其重點

²⁶ 陳文賢，柯林頓及布希政府的中、臺政策：決策小組之研究途徑（臺北：一橋出版社，2002年）。

在掌握中國崛起對區域安全的影響；最後，對於中國崛起進行綜合性的評估。該書的第一篇文章由「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書的作者 Ross H. Munro 所撰寫，題目為「中國的大戰略：目標不變，戰術更新」。該文作者仍堅持在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論點，中國的大戰略從未改變，仍積極刻意尋求建立東亞地區的霸權，並將美國視為是主要和長期的戰略對手。²⁷

2005 年，王高成所著「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戰略」一書出版，該書採取華爾茲 (Kenneth Waltz) 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論，結合國內經濟發展考量及威脅認知的觀點，共同解釋柯林頓政府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在此架構下，王氏運用豐富的資料以政治、軍事與安全、經濟等分類方式解釋柯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並進一步評估其所產生的國內外效應。王氏認為，柯林頓政府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基本上有利於鞏固美國的超強地位、復甦美國的經濟及維持全球與亞太區域的穩定與安全。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對外經貿與安全作為，但是在人權維護與民主政治的發展上則成效是有限。此外，美國也付出若干代價，包括美國人權理想被忽視、中共軍經實力及國際地位的提升、日本戰略地位受到壓抑及臺灣的利益被傷害等。²⁸

2006 年，向駿主編的「2050 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臺關係之迷思」一書出版，該書主要集結數篇文章，從「權力轉移理論」觀點探討美中臺三邊關係。該書的第一篇文章由「權力轉移理論」開創者之一的古格樂 (Jacek Kugler) 所撰寫，他認為世界上的權力結構正在轉移，尤其當美國優勢在未來 20-40 年相對衰退時，這個穩定的世界會改變並瓦解，而偏向中國與印度。其中，中國勢力屆時將與美國勢均力敵，如果中國的不滿程度增加，美國的領導地位會受到嚴格考驗。²⁹

三、期刊論文

2004 年，大陸學者孫學峰在「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發表的「大國崛起與體系戰爭：對兩種理論解釋的質疑」一文中認為，權力轉移理論雖是研究大國崛起與體系戰爭關係

²⁷ 袁易、嚴震生、彭慧鸞合編，*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

²⁸ 王高成，*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戰略*（臺北：五南出版社，2005 年）。

²⁹ 向駿主編，*2050 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臺關係之迷思*（臺北：博揚文化出版社，2006 年）。

問題比較有影響的理論之一，但在邏輯解釋和經驗論證方面存有缺陷。他的批判如下：

「仔細推敲，我們可以發現上述推理存在著自相矛盾的地方：既然雙方都是理性行為體，崛起國可以通過核戰爭改變現狀謀求最大利益，為什麼主導國在核心利益面臨巨大威脅（體系現狀難以維持）時不能採用同樣的手段呢？權力轉移理論雖沒有明確說明，但其潛在的解釋邏輯卻很清楚，那就是核戰爭具有極大的破壞性且難以控制，有可能徹底破壞體系現狀，從而極大地損害主導國的核心利益，所以具備實質理性的主導國不會選擇首先核武器，發動核戰爭。如果上述推理成立，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具有實質理性的崛起國發動核戰爭，冒本國遭到嚴重破壞，甚至體系不復存在的危險，它圖的是什麼？我們承認，改變現狀是崛起國的核心利益，但選擇一個可能葬送自己、消滅本國利益目標的手段去實現自己的利益，崛起國還是具有實質理性的行為體嗎？由此可見，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假設明顯違背了其理論假定，邏輯上難以成立。」

因此，他認為：「不滿現狀的核大國崛起後會發動核戰爭這一假設並不成立，這不僅因為假設存在著重大經驗反例，更為關鍵的原因是假設明顯背離了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假定，即從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假定出發不能邏輯地推導出理論假設。從分析過程看，這一邏輯矛盾產生的根源在於研究人員在推理時把國家對現狀不滿偷換成了國家不具有理性。」³⁰

2004年，大陸學者阮宗澤在「中國的和平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圓桌會議中所發表的「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理論探討」一文中認為，「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認為國際體系是否穩定主要取決於權力與滿意度之間的平衡。從過去的歷史經驗看，可供霸權國的選擇有三：一是戰爭阻止；二是和平過渡；三是和平共處。只要美國不損害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只要美國願意保持作為一個「善良的霸權」，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霸權和主導地位。何況，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也沒有這個能力。³¹

³⁰ 孫學峰，「大國崛起與體系戰爭：對兩種理論解釋的質疑」，*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頁3-4。

³¹ 阮宗澤，「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理論探討」，發表於「中國的和平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圓桌會議（海南：博鰲亞洲論壇與中國改革開放論壇聯合主辦，2004年4月24-25日）。

2004年，大陸學者俞正梁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發表的「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最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一文中認為，「國家會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的大趨勢主要表現在國家權力的多向轉移。(1) 大國間以和平方式達到權力轉移與平衡，通過談判結成建設性合作夥伴，進而不再外在地表現為霸權的更替，新舊大國通過制定國際規則和制度，來規範進行中的權力轉換，在協調、合作而不是威懾、遏制的基礎上建構全球新秩序，以期避免安全競爭和軍事對抗，這將是一種超古典的國家權力平行轉移。(2) 國家權力向次區域、區域和全球治理及其制度、組織轉移，這是國家權力向上轉移。(3) 國家權力向全球民間社會和國內市民社會轉移，這是國家權力向下轉移。(4) 國家權力向全球市場和國內市場轉移，這亦是國家權力平行轉移。通過上述國家權力的多重轉移和國家職能的轉型，國家在全球層次、區域層次和次區域層次上集結，將自己全面融入全球社會，與全球市場、全球民間社會走上協調之路，共同構成全球關係、全球政治的三大獨立、自主，且又相互作用的領域，形成全球性的權威與治理網絡，以便適應人類整體性發展的要求，形成建設地球村的歷史合力。³²

2005年，大陸學者龐中英在「世界觀察」發表的「和平崛起：關鍵在『和平』」一文中認為，現實主義所謂的「崛起」意味著一個新的霸權的興起，意味著國際權力從舊的霸主到新的霸主的轉移，意味著新舊霸主之間即將到來的、命中註定的衝突和戰爭。所謂「權力轉移」說，理解成中文，只有「國際格局變化」與之接近。關於「崛起」，現實主義理論描述的圖景是衝突的、悲劇的國家爭權奪利的畫面。也就是說，在現實主義看來，崛起不是與和平相聯，而恰恰是與戰爭相聯。這就是為什麼多數英、美現實主義學者認為「中國和平崛起」難以成立的原因。而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正是要用自己以和平為首碼的崛起，來改變這一傳統的觀念。³³

2005年，大陸學者門洪華在「美國研究」發表的「權力轉移、問題轉移與範式轉移－關於霸權解釋模式的探討」一文，試圖從權力轉移、問題轉移、範式轉移的角度分析當前的世界轉型及美國霸權，探索解釋霸權的理論模式。文中首先論述了當前權力轉

³² 俞正梁，「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最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4期。

³³ 龐中英，「和平崛起：關鍵在『和平』」，*世界觀察*，2005年4月11日。

移、問題轉移的種種表現及其影響，指出權力轉移既給予美國獨佔鰲頭的機會，也埋下了美國相對衰落的根源。問題轉移賦予了美國巨大的塑造空間，也給美國霸權地位提出了長遠觀之，堪稱嚴峻的挑戰。筆者認為，美國的霸權戰略範式有了轉移的必要，解釋霸權的理論範式也有了轉移的必要，如何看待由權力轉移和問題轉移所引發的範式，轉移成為解釋美國霸權的重要思路。而且還對美國霸權的既有理論範式進行分析，認為解釋美國霸權，應以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分析為基底、融合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制度分析和建構主義的觀念分析，從而確定一種綜合解釋模式。³⁴

2006年，大陸學者朱鋒在「國際政治研究」發表的「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一文中，認為「權力轉移理論」中基本的變數關係，一是「一個國家在以國際實力為基礎的國際權力等級結構中的地位越高，這個國家越容易走向戰爭」；二是「國際系統中的能力分配越是集中在某個主導大國身上，而且這樣的集中越穩定，國際體系就越是穩定」。換言之，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越不平衡，國際和平就越容易獲得保障。從這兩個基本變數關係出發，「權力轉移理論」客觀上將戰爭視為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等級排位元有關的活動。但該理論中的這兩大變數關係事實上並不嚴密。由於缺乏概念體系的創新以及研究範圍的深入，該理論中的許多問題事實上需要重新界定並確立其變數間的內在聯繫。「權力轉移理論」重在說明國際系統中權力集中的好處，並成為今天美國霸權維持戰略的思想基礎之一，但作為國際關係的理論性成果，其對指導和預見未來大國權力再分配中的關係問題的解釋與預測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權力轉移理論」所提出的問題，如國際系統中究竟權力集中好、還是權力分散好？大國間衝突的機率是權力均衡時比較高、還是權力差異時比較大？是國際關係中非常重要的問題領域，也是政策與學術領域恐怕永遠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但該理論並未令人信服地解答這些問題。「權力轉移理論」為公眾所提供的廣泛的、常識性的對大國崛起的消極認識，並不能讓我們相信「權力轉移理論」能夠成為觀察 21 世紀大國關係走向的可行分析工具。³⁵

³⁴ 門洪華，「權力轉移、問題轉移與範式轉移－關於霸權解釋模式的探討」，*美國研究*，2005年第3期，頁7。

³⁵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頁41-42。

四、國內學位論文

研究美國與中國關係的國內學位論文的篇數不少，大多數以美國某一政府時期的對華政策為研究標題，例如尼克森時期的對華政策、雷根時期的對華政策，或者是布希時期的對華政策。這類論文多數以「決策理論」來探討美中關係，說明影響決策的內、外環境因素，決策的過程，以及決策的產出。

此外，還有其他論文是以不同的理論研究美中關係。在「後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共的經貿政策：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分析」這本論文當中，作者以新現實主義的方式來分析後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的經貿政策，運用總體權力結構及議題權力結構的分析架構來論證新現實主義在這個議題上的解釋力。³⁶

在「美、中互動關係與臺灣安全（1949-2000）：以瓦茲（Kenneth N. Waltz）的國際政治體系論解析」這本論文當中，作者以瓦茲的「體系理論」，從結構因素分析美、中、臺三角關係。作者認為，研究美、中、臺的互動關係首先必須確認體系結構，其次是美中的互動，最後才是美中的互動對臺灣安全的影響。換言之，因為體系結構不斷的變化下，所以美、中、臺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會有所改變。這種「體系理論」的分析方式有助於我們了解體系對國家的行為是會造成影響。

在「現狀霸權與崛起強權互動模式之研究：一個理論與歷史的分析途徑」這本論文當中，作者以現實主義的觀點論述了現狀霸權與崛起強權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指出國力的變化、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領導階層的轉變是建立兩者之間不同互動模式的三個關鍵因素。不同的互動模式影響體系穩定的程度也不同，作者試圖解釋當今與未來美中關係的可能互動模式，以及該互動模式對體系穩定的衝擊。這種以「現實主義」的分析方式有助於我們了解權力、利益等現實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兩國互動的主要考量因素。³⁷

在「美國因應「中國崛起」之思維與策略：兼論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攻勢現實主義」這本論文當中，作者以米爾斯海默攻勢現實主義的角度分析美國因應中

³⁶ 蔡政修，「後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共的經貿政策：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分析」，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

³⁷ 呂冠頤，「現狀霸權與崛起強權互動模式之研究：一個理論與歷史的分析途徑」，臺灣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2002年）。

國崛起的思維與策略。該作者認為，米氏的攻勢現實主義確實對美國中國政策的制定提供一種思考方向，把美中關係簡化成一種霸權國與崛起大國的關係，將有助於理解複雜的美中關係。不過，作者在文中大膽的挑戰米氏理論中的假設，也就是認為霸權國在面對崛起大國的威脅時，應該會採取積極介入的策略，而不是米氏所說的當國際體系失衡時才介入大國的崛起。³⁸

貳、綜合評述

經由上述的文獻探討，發現不同的研究者採用不同的理論來研究美中關係的發展，而那些常用的理論包括「決策理論」(decision-making theory)、「體系理論」(system theory)、「現實主義」(realism)、「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s theory)等。這些理論或多或少可合理的解釋美中關係的某些行為，例如，「決策理論」說明美國與中國在制定重大決策時所考慮的因素及過程；「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說明為何美國與中國在安全議題上是衝突，在利益議題上有著複雜的糾結；「新自由制度主義」解釋了美中關係為何存在合作的可能性；「體系理論」說明了美中關係受到國際結構因素的影響，而臺灣安全則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權力轉移理論」說明了美中的權力結構若發生變化，其關係也會有所改變。

在學術上，每種理論都有其重要性與價值性，理論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對某一事件哪個理論的解釋力比較佳。透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解，得讓本文一方面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清楚美中問題的癥結所在，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在既有的理論上，更深入的分析問題。上述眾多理論中，本文採取「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轉移理論」的雛型誕生於 1950 年代末期，係由奧根斯基(A.F. Kenneth Organski)在 1958 年所著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中首次提出。³⁹到了 1980 年，Organski 與 Kugler 合著的「戰爭總帳」(*War Ledger*)才把該理論較完整的建構。⁴⁰1996

³⁸ 廖文義，「美國因應「中國崛起」之思維與策略：兼論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攻勢現實主義」，中國文化大學政治所博士論文 (2007 年)。

³⁹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

⁴⁰ A.F.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年 Kugler 主編的「均勢與戰爭」(*Parity and War*)⁴¹以及 2000 年由譚門(Ronald L. Tammen)與 Kugler 主編的「權力轉移:二十一世紀的戰略」(*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⁴²兩本書出版,可說是「權力轉移理論」近十年的代表著作。

「權力轉移理論」所涉及的議題相當廣,它解釋為何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會出現「層級」的現象;解釋產生戰爭的原因;解釋超級強權者如何來經營世界政治。若加以抽絲剝繭,其論述是建立在「超級強權與崛起強權」的關係之上。選擇該理論作為分析基礎的理由主要在於 1)「權力轉移理論」中的某些觀點對於國際政治的分析與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息息相關,本文將運用該理論的核心概念加以論證。2)國內雖有學者與著作從該理論探討相關議題,不過均有其缺陷。例如,「2050 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臺關係之迷思」一書僅是論文集,未能完整與有系統的分析。本文以「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試圖探討有關「超級強權與崛起強權」的互動關係。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研究途徑 (Research Approach) 係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一種常被用於同一學科的方向標準,此方向標準因研究對象、課題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途徑。換句話說,即研究者希望從那一個層次作為出發點、入手處或著眼點,去進行觀察、分類、歸納與分析之研究。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其差異性懸殊,研究方法是用於指導資料蒐集、處理、鑑定與運用;而研究途徑則是在確立研究方向與標準後,才選擇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⁴³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冷戰後美中權力關係,並以「權力轉移理論」為基礎來加以分析。基此,本文擬採用「歷史研究途徑»,並藉由文獻分析法,針對美中權力關係之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檢索、閱讀、整理、歸納等方式,有系統的將文獻資料匯於論文中,茲說明如下:

⁴¹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

⁴² Ronald Tamman and Jacek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

⁴³ Fred N. Kerlinger、Howard B. Lee 著,黃營杉、汪志堅編譯,《研究方法》(臺北:新加坡商亞洲湯姆生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9月),頁53。

壹、研究途徑

「歷史研究途徑」係指通過時間延續而成的變化過程，從事務本身產生和發展的具體過程中，研究和揭示發展規律的一種方法，其目的在描述從歷史事實，以某一特定時空所發生的歷史事實其前因與後果；或從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係中去重建過去的一種工作，同時也可以為此歷史事件和過程提出另一種的解釋方法。⁴⁴由於美中權力互動關係過去所發生的戰略作為、過程、結果等，皆可引為本文所要探討的範圍，並以去腐存菁方式蒐集，並引為本文相關理論說明之歷史背景資料。

貳、研究方法

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領域中，研究方法一般可分為兩類，一為質化研究法（qualitative method）；一為量化研究法（quantitative method）。⁴⁵若加以細分，又可分為實驗研究法（experimental study method）、統計研究法（statistical study method）、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及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study method）等4種。⁴⁶個案研究及比較研究屬於質化研究法；實驗研究及統計研究屬於量化研究法。就本文而言，擬採行「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亦即分析與歸納所蒐集的相關文獻資料。一般而言，文獻資料的來源可分為三大類：一是發表於學術期刊或媒體的文章或論述；二是私人日記、書信、傳記等；三是正式的官方文件，如政府機關的文件等。換言之，所謂文獻分析法，乃是透過引用原始文件、官方資料及正式的學術論文等，來作為論文研究論述的資料來源與分析基礎。其所採取之步驟包括：第一文獻選擇之標準乃著重於冷戰後美中權力互動之相關資料，主要來源為圖書館（政大國關中心、政大綜圖、臺大法學院圖書館）內所館藏之書籍，以及在相關期刊上（Foreign Affairs、International Security、Security Studies、Survival、Orbis、National Interest、Asia Survey、Issues & Studies、問題與研究、中國大陸研究、遠景季刊、美歐月刊、東亞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美國

⁴⁴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165。

⁴⁵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⁴⁶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5, No.3 (September 1971), pp. 682-693.

研究季刊)所刊登之論文。此外,還有一些重要網站,如智庫網站(蘭德公司、美國新世紀計畫、傳統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國際戰略研究所、外交關係委員會)、美國官方網站(白宮、國務院、國防部、參議院、眾議院、國會圖書館)、中國官方網站(外交部、國家統計局)、新聞媒體網站(*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Los Angeles Times*、*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CNN*、人民網、新華網、新紀元網、中時網、聯合網、自由網)等。第二針對所蒐集資料進行安排,基本上分成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文獻、中國對美國政策的文獻等二類。第三從上述二類中再細分成軍事、經濟、外交等議題。第四根據資料蒐集、安排與分類,以作為分析冷戰後美中權力關係互動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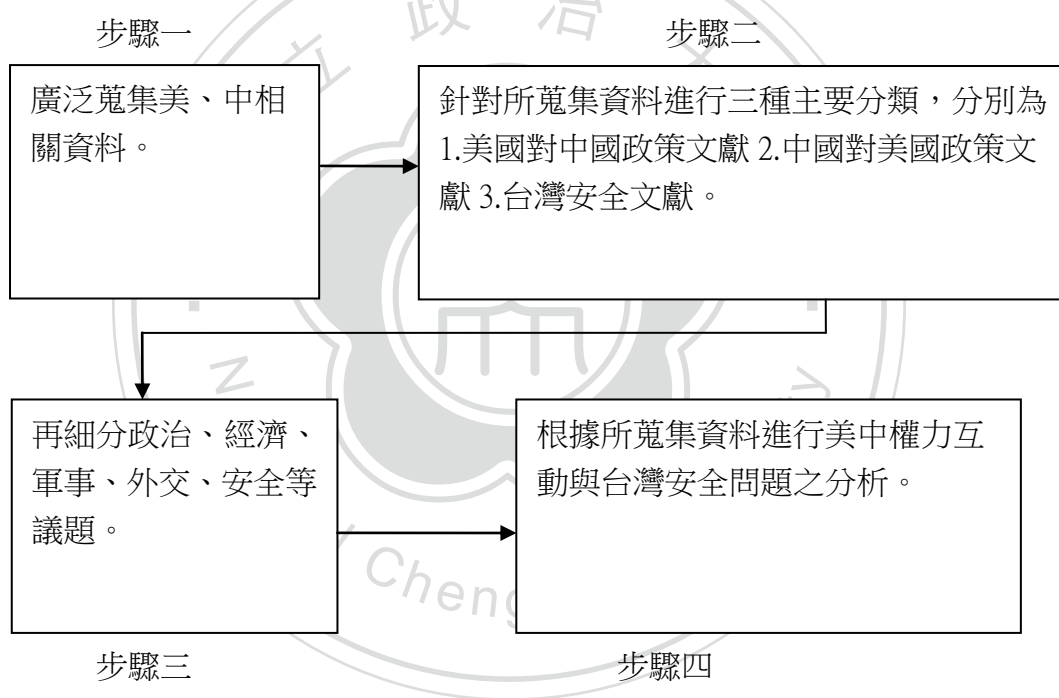


圖 1-1 資料蒐集與處理流程圖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主題在於探討冷戰後美中之權力關係。而美中關係的發展牽涉諸多因素，回顧美中之間的交往，是由尼克森擔任總統後，開始接觸的，然而隨著世界局勢的演變，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斷的改變，歷經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布希、柯林頓、小布希

與歐巴馬等8位美國總統，由各項美國的對華政策文件和宣示，可以明顯看出美國的「一個中國」立場，其間，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最大的，應屬美國在世局的發展轉變所詮釋的亞太利益立場，與中國大陸長年來的政治發展所呈現出來的對美政策，這兩大因素相互影響，左右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實質內涵。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可區分為時間、主體與內容等三方面來加以說明：

一、時間範圍

所謂「冷戰後」的起始時間，吾人認為應指涉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後，以兩極對抗為主體的國際體系結束後，迄今的時期稱之，就美國而言，布希總統的任期（1989-1993 年），恰巧橫跨冷戰結束前後，其間歷經柯林頓、小布希及歐巴馬總統等任期，另就中共而言，則歷經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等時期的集體領導，而本文所欲探討美中雙方的戰略布局，雖說其主要內涵乃在美國與中共各自國內安全環境與國際戰略的轉變而演進，但不可否認的是，同一總統任期內的戰略決策往往會因總統的人格特質因素而有所不同。因此，為切合本文主題的需求，吾人不可偏狹地將研究時間侷限於 1991 年，宜界定在 1989 年布希總統任期開始至 2010 年為止，並將此期間的歷任總統所採取的戰略對策一併納入考量。

二、主體範圍

本文主題為冷戰後美中權力關係之研究，其主體範圍集中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相對的「力量流動」(dynamics of power) 變化上。當我們在中國崛起的脈絡裡進一步審視東亞區域秩序的轉變時，吾人認為在冷戰後，驅策美國與中國大陸進行戰略競爭的主要力量乃源自於「雙方不平均的國內發展」、「權力之間的轉移」及「權力的重新分布」。因此，本文係以「權力轉移」的理論基礎，來檢視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權力關係。

三、內容範圍

本論文的内容置重點於冷戰後的美中權力關係互動的實質內容，為求研究内容能聚焦於特定領域，謹將美中的戰略布局區分「軍事、經濟、外交」等三個層面進行研究蒐

整，並配以國際關係理論、兩岸學者觀點、媒體主流意見等實務觀點匯入研究內容，以期強化本論文的概念架構。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為冀求研究之深入、完整，並考量個人研究時間與能力之限制，本文所述之「強權」限縮於「超級強權－美國」與「崛起強權－中共」為研究的主體對象，排除了其他新興強權的研究。

二、情勢發展的限制

美中權力關係就情勢發展來看，2012年美中兩國均面臨執政權的交替關鍵年，美國歐巴馬總統是否能順利連任；中共新任的集體領導是否能在穩定中接掌政權，均對美中關係的未來發展投下不確定的因素。

三、資料蒐集的限制

國際關係錯綜複雜，且因立論不同，故其理論或學說各成一門，然國際關係中國家間之互動彼此牽引，非單一理論可完全涵蓋。本文採用權力轉移理論以為立論依據，自亦難以涵蓋各個面向，是為本文之限制。然單一理論的運用，卻能提供從某一專門角度的精準研究結果，並使本論文之論述主軸明確，架構單純，利於對理論的深入探討。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本文的目的即是探討美中權力關係的實質內容，而分析的立論基礎乃根據「權力轉移」理論。基於此，本文的研究架構如圖 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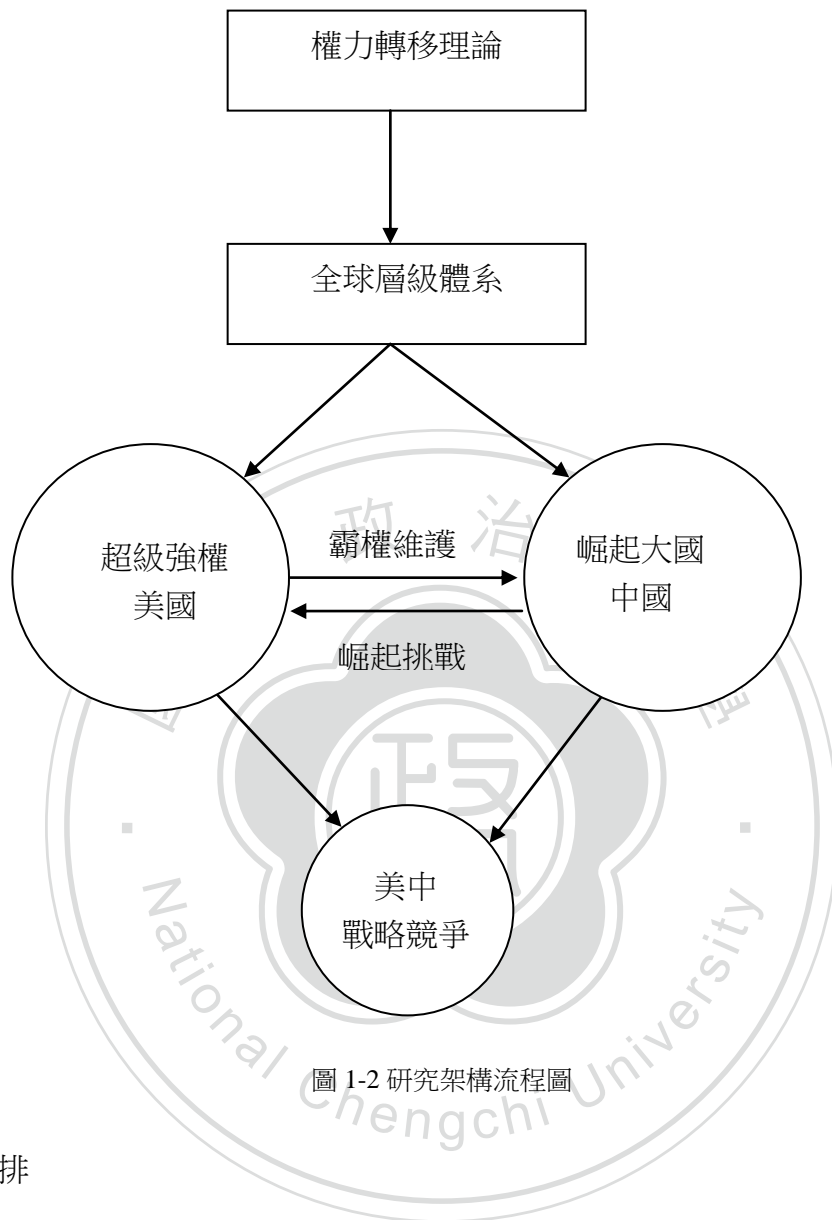


圖 1-2 研究架構流程圖

貳、章節安排

本文的章節安排計區分章節，茲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權力轉移理論：說明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內涵及重要概念、比較與其他相關理論的差異性，並就英美權力轉移過程作一概述。

第三章超級強權的全面管理：區分軍事、經濟、外交三個層面，來說明超級強權—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布局。

第四章崛起強權的全面挑戰：區分軍事、經濟、外交三個層面，來說明崛起強權—

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布局。

第五章結論：針對前述章節的主要內容作一扼要綜述，並對本文之研究進行總檢討，且提出個人研究心得與建議。



第二章 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與內涵

「權力轉移」理論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是 20 世紀 50 年代末期針對戰爭的相關解釋，特別是大國之間戰爭的學術論述。經過 50 多年來的發展，該理論已成為國際關係理論中，解釋大國間權力關係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理論分支之一。「權力轉移」理論的提出係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奧根斯基 (A.F. Kenneth Organski) 於 1958 年在其所著的「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一書中所提出，⁴⁷該書並於 1968 年再版。⁴⁸奧根斯基考察了近 3 百年的戰爭史，強烈質疑當時所盛行的「權力平衡」理論 (balance of power theory)，認為強國之間的權力關係變化，從而引發戰爭的最主要原因是彼此實力的接近。特別是當強國之間的權力分配出現「權力均勢」(power parity) 時，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最高。⁴⁹他也認為國際秩序之所以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其原因不是強國之間不能形成權力平衡，而是因為各國人口、政治結構和工業力量都處在快速的變化和發展之中。其可能的結果是：「一群新來者正在不斷的挑戰世界政治的現有領導者，如果這些挑戰者一旦成功，將意味著權力結構從一群國家向另一群國家轉移。這是新的國際秩序的開始」。⁵⁰奧根斯基提出「權力轉移」的觀點，目的乃在一方面批評歐、美領導人的冷戰思維；另一方面乃在釐清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的變革趨勢，希望找到當代政治「具有規律性的東西和主要趨勢」。⁵¹1980 年，奧根斯基與他的思想追隨者古格樂 (Jacek Kugler) 兩人合著出版「戰爭總帳」(The War Ledger) 一書，主要是對於奧根斯基之前所提出的論點做了基本的量化檢證，強調「權力轉移」理論的解釋力。⁵²

不過，奧根斯基提出「權力轉移」論點之後，並無受到當時各方的青睞，也未引起應有的回響，究其原因，乃在於面對冷戰時期美蘇的對抗，大多數國家的決策者與學者均偏愛「現實主義」中的權力平衡、嚇阻等概念，並依此來解釋當時的權力互動，而忽

⁴⁷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8).

⁴⁸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68).

⁴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Chapter 1.

⁵⁰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183.

⁵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39.

⁵² A.F.K. Organski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略其他可以解釋的理論。1990 年，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之後，部分國家決策者與國際政治學者乃開始對新的國際體系尋求新的基本法則，如林克（Douglas Lemke）從「權力轉移」理論探討冷戰的結束與未來。⁵³此時，「權力轉移」理論在學界的重要性逐漸浮現。邁入 21 世紀，主張「權力轉移」理論的論者於 2000 年出版「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書，他們統合過去的論點，用簡潔的文字讓「權力轉移」理論以更具體且完整的方式呈現。⁵⁴

本章計區分四個部份，首先針對「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作一概述說明；其次再對「權力轉移」理論的內涵作一論述，第三則針對英美「權力轉移」的過程，作一綜合性的分析，最後就「權力轉移」理論與其他相關理論作一比較分析。

第一節 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

國際體系不斷的重複權力轉移的現象，而這種權力轉移的現象大部分均伴隨著戰爭而發生。例如，15 世紀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權力轉移、16 世紀西班牙與荷蘭的權力轉移、17 世紀荷蘭與英國的權力轉移等。葡萄牙於 15 世紀在遠洋探險中處於領導地位，因而確立其霸權地位。到了 1580 年，葡萄牙被西班牙併吞，進入西班牙的世紀。西班牙在海陸兩方面的過度擴張和歐洲經濟中心的轉移（由地中海向波羅的海-北海地區轉移），使得西北歐的國家逐漸崛起，最終由荷蘭取代西班牙。在荷蘭崛起的同時，英、法也強大起來，由於荷蘭太專注於發展商船，忽視建立正規海軍，最終與重視海權的英國在 17 世紀中後期發生三次海戰（1652-1654；1665-1667；1672-1674）後被取而代之。

18、19 世紀是英國的世紀，法國是英國最強的挑戰者。在 18 世紀，英國藉由三次戰役，分別為西班牙王位戰爭（1701-1713）、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和英法 7 年戰爭（1756-1763）挫敗法國，取得 18 世紀的霸權地位。到了 19 世紀初，法國拿破崙雖然短暫取得歐陸霸權（1804-1815），但是 1815 年的滑鐵盧戰役後，英國接管法國

⁵³ Douglas Lemke, "The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4, No.1 (Feb, 1997), p.23-36.

⁵⁴ Tammen and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在亞洲與非洲的殖民地，使得仍繼續維持其霸權地位。

前述近 15-19 世紀的霸權領導，其中當霸權發生更迭，也就是權力轉移時，似乎皆與戰爭脫離不了關係。事實上，除了戰爭的權力轉移外，也存在著和平的權力轉移，如 20 世紀英美的權力轉移。

19 世紀初期，美國仍非強國，然而，經過一個世紀的努力，到了 19 世紀末，美國已是美洲的區域霸主，到了 20 世紀中期，更爬升至全球霸主地位。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當時的霸權國英國非常注意其動向，並採取措施加以因應，但最終兩國卻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權力轉移。為什麼美國可以在短時間內成為霸權國？為什麼英美之間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權力轉移？這是本章試圖要回答的問題。本章分為兩部份，首先，探討美國崛起的戰略。其次，探討英美的權力轉移。

1990 年代以來，「權力轉移」理論在不斷歷經新的理論發展。經過三代學者的發展，「權力轉移」理論的研究內容不斷擴展，使得「權力轉移」是否將產生戰爭？什麼時間引起戰爭？和在什麼條件下會發生戰爭？等諸多問題，成為過去 40 多年間最持續的研究計劃之一。⁵⁵

1990 年代的一個顯著發展是著眼於全球層次的「權力轉移」理論開始擴展到區域層次，用來說明區域權力結構中的次大國關係。蘭姆克運用奧根斯基的全球等級秩序學說來解釋區域問題，認為在全球的權力等級結構之外，並存著諸多區域性的權力等級秩序，這些區域性的結構可以同樣按照「權力轉移」的理論模式來解釋區域國家的行為。為此，他發展出「多樣性等級模式 (multiple hierarchy model)」，努力尋找區域層次上國家間也為出現「權力轉移」而引起的戰爭現象。他考察了南亞、中東、南美等區域政治的實證案例之後，認為，有些中小國家在權力增加之後，即便在全球的系統層次上不挑戰主導國家，卻會在區域層次上挑戰區域內的強國。⁵⁶

⁵⁵ 從一項具有綜合性、挑戰性的學術研究項目的角度出發，分析和肯定「權力轉移理論」的是傑克·萊維教授，他認為「權力轉移理論雖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但卻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問題。詳見 Jonathan M. Da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A Lakatosian Analysi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p. 109-157.

⁵⁶ Douglas Lemke and Jacek Kugler,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p. 3-33.

對奧根斯基的「內在因素」促成權力轉移的理論結論，做出實質性修正的是金宇祥教授。⁵⁷金教授質疑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內在要素」決定論。通過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大國間戰爭問題的研究，他認為權力轉移不僅受制於「內部因素」，而且更受制於「外部因素」。最突出的外部因素是大國間聯盟的重組與變遷，從而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決定性地改變了大國間的實力對比。而軍事聯盟關係的重組所產生的權力對比關係的變遷與權力轉移，甚至可以超越工業化的內部權力變更因素，從而使得權力轉移所導致的戰爭機率上升的論斷具有更加廣泛的適用性。⁵⁸金教授研究了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同盟轉移，提出權力分配變化必然導致同盟關係的轉移，恰恰是同盟關係的變化直接導致了「權力持平」，因而產生了戰爭。⁵⁹

此外，金宇祥教授的研究成果使得「權力轉移」理論所適用的時間擴大了。該理論以往使用的實證研究數據出自對 18-19 世紀的大國間戰爭的分析，這是因為奧根斯基認為，1750 年是工業革命開始的轉折點。而在此之前，都是「前工業革命時代」，並不能適用他的理論。但金教授將該理論的適用時間範圍擴大到了 16 世紀，以「前工業化時代」的戰爭來驗證「權力轉移」理論。蘭姆克與金宇祥教授的研究，是 90 年代以來「權力轉移」理論研究的重要發展，前者並稱之為是該研究項目內的理論進展，後者是該理論吸收了其他理論成果之後所形成的跨理論研究項目的進展。⁶⁰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冷戰的結束，1990 年代以來的「權力轉移」理論學者對於未來「霸權戰爭」假設的看法相對來說要更為積極。奧根斯基總體上對國際關係的未來非常悲觀。因為根據他的理論假設，大國間的戰爭似乎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對核武器是否能夠有效遏止大國間的戰爭持非常消極的看法。當主流學者紛紛認為核武器改變了傳統戰爭規律，使大國間的戰爭越來越缺乏可能性的時候，如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N.

⁵⁷ Jonathan M. Da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December 1999), p.692 - 694.

⁵⁸ 有關 Kim Woosang 對「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詳見 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 Vol.45, No.1 (October 1992), p. 153-172.

⁵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325-337.

⁶⁰ Jonathan M. Da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A Lakatosian Analysis," p. 146-147.

Waltz)曾放言核大國間戰爭的可能性接近於「零」,⁶¹ 奧根斯基卻認為核武器並不能阻止後起國家對「主導者」的嚮往,也不會阻止「競爭者」用軍事手段對「主導者」發起挑戰。⁶²他雖然認為「權力轉移」引起的霸權爭奪戰,並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感覺卻是「非常困難」的。⁶³但 90 年代後,特別是近年來「權力轉移」理論學者的看法有了明顯區別。例如權力轉移理論的支持者最近對中國,以及中美力量對比發展趨勢的一系列研究認為,美中是否會發生「權力轉移」理論所強調的霸權爭奪戰的可能性並不一定很高,關鍵取決於美國是否能夠在現有體系中兼容中國,並且對中國力量發展性質的關注應該高於對其規模的重視。⁶⁴蘭姆克則強調,中國即使在實力上超越美國,只要中國沒有要求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組織原則,「權力轉移」所產生的霸權戰爭就完全可以避免。⁶⁵但總的來說,1990 年代以來「權力轉移」理論的追隨者,並沒有對該理論作出實質性的理論發展。許多學術努力都是在給奧根斯基所創立的基本假設修建「防禦性的外圍」,而不是在進行主體性的理論深化,以及概念體系的完整化。⁶⁶該理論在如何通過定量分析確定可能導致戰爭的結構條件的具體化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依然缺乏全面的理論解釋能力,來說明為什麼「權力轉移」在相當程度上將導致戰爭,也未能清晰地解釋導致「權力轉移」的戰爭結果的因果關聯,究竟是什麼。

第二節權力轉移理論的基本內涵

奧根斯基觀察國際政治的理論方法和立場,基本上承襲了漢斯·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根據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處於無政府狀態,缺乏權威和秩序是其基本特徵。國家為了維護自身排他的國家利益,總是在國際行為中不斷地追求權力。權力

⁶¹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7, no. 3 (Spring 1988), p. 627; 有關核武器對大國戰爭的有效遏止作用的理論性分析,詳見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 to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The Basic Books, 1989);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Summer 2000), p.5-11。

⁶²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1968, p. 326-330; Organski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p. 33.

⁶³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1968, p. 333.

⁶⁴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p. 334-337.

⁶⁵ Douglas Lemk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p. 270.

⁶⁶ Jonathan M. Da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p. 698.

是國家利益的直接內容，由於國家利益表現為權力，國家對權力的追求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正當的。只有權力才能代表國家在國際關係中行動的最主要準則。摩根索強調，國家的權力慾和對權力的無止境追求既來自於人性的弱點，又來自於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

在現實主義看來，國家利益是由權力界定的。權力獲得的多少，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的大小。沒有足夠的權力，就不能充分地獲得和保障國家利益。國家利益的不斷滿足需要靠對權力的持續不斷的追求來實現。⁶⁷雖然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師們對什麼是權力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摩根索認為權力主要是一種影響力，斯拜克曼認為權力是一種支配關係，亨利·基辛格主張權力是可以讓別國做、或不做某些事的能力；但是，現實主義普遍認為，權力是由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構成的。國家對權力的追求就是不斷地增強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並以此為基礎不斷地擴大其在國際關係中的對外影響力。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評價現實主義理論時曾明確指出，以權力來衡量與規範國家利益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⁶⁸現實主義理論從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在美國國際關係學術界佔絕對的主導地位。

奧根斯基對國際關係的看法和現實主義理論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他認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特徵是它的權力。因為「權力是國家在國際關係中所扮演角色的決定者」，世界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至於什麼是權力，奧根斯基認為，權力是「按照自身的矛盾影響他國行為的能力」。⁶⁹他進而補充說，國家間的關係也是權力的一部分，因為不同的國家間關係的狀況往往取決於各國影響力的使用。一個國家雖有實力，但不去把它變成影響力、不去對國家間關係發生作用，那麼它的實力依然不能成為國際關係中的真正權力。因此，實力的行使比實力的單純存在對權力更為重要。奧根斯基以美國在二戰前後的國際地位變化來說明這一點。他指出二戰前後美國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戰後的美國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是因為美國廣泛地捲入了國際事

⁶⁷ 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著；肯尼士·湯普森（Kenneth W. Thompson）修訂；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 84-123。

⁶⁸ Stanley Hoffmann, ed.: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0, p. 22.

⁶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101-123.

務，具有將其實力變成現實影響力的巨大慾望。奧根斯基的結論是，不斷地對外使用實力、不斷地影響他國的行為是權力的本質。

從這一點出發，在奧根斯基看來，財富（經濟實力）、資源、人力和軍事力量都是權力的工具（instrument of power），但不必然導致一國的權力。只有不斷地使用這些實力並影響他國的行為，才會賦予一國以權力。他強調，權力來源於實力使用的有效性。奧根斯基的這一觀點是其權力轉移理論的重要基礎。當一國、特別是大國的實力不斷增強以後，其實力的顯示和對外行使，是權力轉移在權力追求同時的根本推動力。

漢斯·摩根索也曾如此分析過權力，但摩根索更強調的是權力行使和外交政策與國際政治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保持權力、增加權力和顯示權力是國際政治的三種基本模式，外交政策也可以相應地分為「威望政策」或「帝國主義政策」。⁷⁰奧根斯基所強調的是權力的行使對權力本身的作用。摩根索在分析權力行使時，還提到了政府和外交質量的問題，即認為制約外交政策的各種因素對一國權力具有影響力。奧根斯基卻認為，權力的行使主要與「權力的主觀性」（subjectivity of power）有關；即一國在估計和評價本國和他國的實力與權力時的主觀意識，包括如何思考權力的用途和使用權力的具體方式，以及國家在運用權力時的意志、手段等等。他認為，雖然權力是由影響他國行為的能力所構成，但這種能力很可能被運用權力手段的水平所左右。50年代末行為主義興起之後，外交決策理論和博弈理論的出現，都更深入地研究和解釋了國家外交行為中的權力意圖和如何運用權力的問題。奧根斯基闡發其權力轉移理論的「世界政治」一書於50年代後期出版，對權力的主觀性的分析充其量也只能達到這樣的高度。他所強調的是運用權力的意志本身也是權力的一部分。

權力轉移理論的內涵龐大，若加以簡要劃分，可為以下幾個部份，分別為層級體系（hierarchical system）、動態的權力（dynamics of power）、滿意與不滿意（satisfaction and dissatisfaction）、超越與均勢（overtaking and parity）、超級強權對世界政治的經營（the management of world politics）等。

壹、層級體系（hierarchical system）

⁷⁰ 漢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頁 63-122。

權力轉移理論描述一個權力層級化的系統，換言之，國際體系是一個金字塔型的層級結構。(圖 2-1) 所有國家都認知到這個層級的存在及權力在其中的相對分配情形，權力不是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手中。在此金字塔的結構中，具統治地位的超級強權國家或稱為支配國家 (dominate nation) 位於最上層，這個國家掌握了系統內最多的資源。其次，強權國家 (great power) 位於超級強權的下方，它是最有可能威脅超級強權國家地位者。再其次，位於強權國家之下的是次強權國家或稱為中等權力國家 (middle power)。最後，位於金字塔最底部的是弱權國家或稱為小國 (small power)，僅有一點點力量與少量資源。⁷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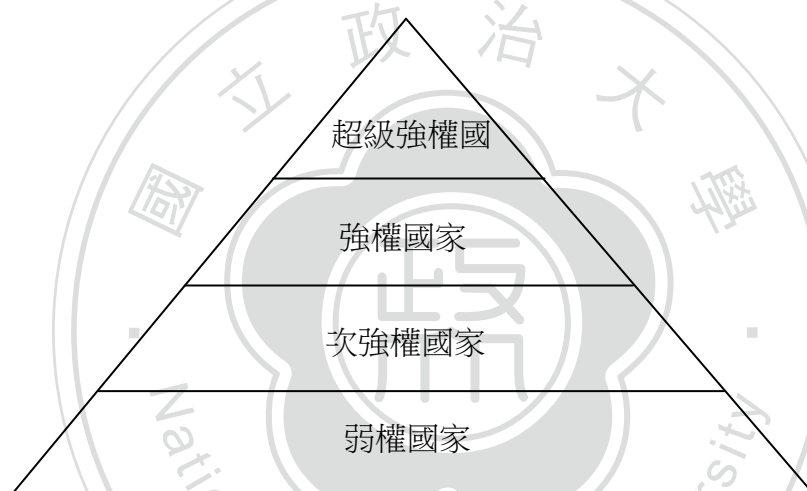


圖 2-1：傳統金字塔形式的國際體系

資料來源：Ronald Tamman and Jacek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7.

事實上，這種權力層級模式，在新一代權力轉移理論者如林克看來並不限於全球層面，也存在於區域層面，可稱之為「多重層級 (multiple hierarchies)」。⁷²換言之，在世界地圖中的每個區域內，例如南美洲、南亞，或中東也有區域的權力層級。(圖 2-2) 不同於圖 2-1，圖 2-2 以三度空間的角錐型態來表示，每一個角錐代表一個權力層級體系，最大的角錐代表全球性層級，較小的角錐代表區域性層級。將金字塔型態轉為角錐型態，增加了地理距離的第三構面，例如巴西與印度同樣地強大，兩者幾乎可以放置在金字塔之相同位階上，但是他們並不在相同區域層級體系中相互影響。他們被數萬哩的海

⁷¹ Tammen and Kugler (eds.) ,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 p. 6-8

⁷² Douglas Lemke, *Multiple Hierarchies in World Politics*, Ph. D. Dissertation, Vanderbilt University, 1993.

洋與陸地所分離。因此，印度在南亞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巴西則在南美洲扮演另一個重要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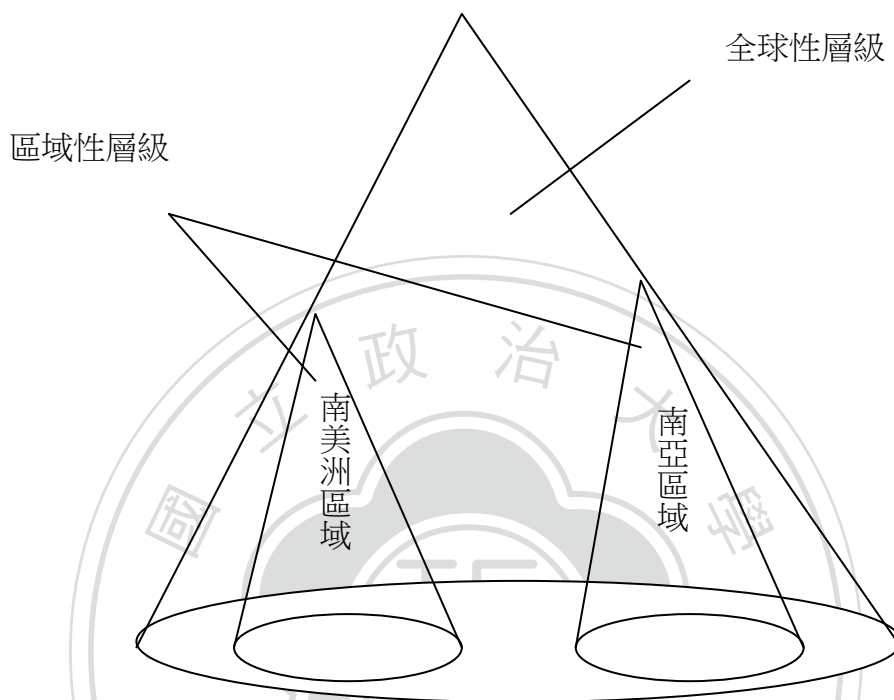


圖 2-2：三角錐式的國際體系

資料來源：Ronald Tamman and Jacek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8.

這些區域的權力層級附屬於全球性權力層級。在各種情況下，區域層級體系中的掌控國家均受到全球性超級強權和強權國家架構的影響。一旦那些全球性的超級強權國家或者強權國家覺得相關爭議涉及其利益者，它們可以介入區域性權力層級內成員之間的關係互動。例如歷史上許多全球性強權國家干預區域小國的事件，促使區域權力層級發生了變化。⁷³

貳、動態的權力

權力構成政治分析的基礎，不掌握權力的概念，就無法進行政治學的研究。⁷⁴何謂

⁷³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65.

⁷⁴ Trevor Taylor, "Power Politics," in Trevor Taylor (ed.), *Approaches and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Longman, 1978), p. 124.

權力？韋伯（Max Weber）認為，權力指「一個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會行動中，甚至是在不顧其他參與這種行動的人進行抵抗情況下實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⁷⁵達爾（Robert Dahl）認為，權力是「使得其他人做其不願意做的事情的能力。」⁷⁶霍斯提（K. J. Holsti）認為，權力乃為「一個國家控制別國的能力。」⁷⁷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認為，權力是「人對他人的意志與行為的控制。」⁷⁸伯頓（Raymond Boudon）與柏瑞克（Francois Bourricaud）認為，權力涉及三個概念，包括「資源分配、運用這些資源的能力、以及戰略特性。」⁷⁹可見，何謂「權力」的問題是眾家各持己見。

就權力轉移理論而言，其把權力定義為「強迫或說服對手遵守我方要求的能力。」（the ability to impose on or persuade an opponent to comply with demands）⁸⁰在該理論中，權力的組成有三個要素，分別為人口（population）、生產力（productivity）與相對政治力（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⁸¹此三個關鍵因素可衡量權力的大小，每一個因素對權力有不同的影響時期。人口數量在短期內是比較固定且難以改變的；生產力，也就是經濟成長，其改變速度較快，對權力的影響是中期；最後，政治力是可以在短時間內高度運作並對國家力量造成影響。基於上述，該理論中的權力換算公式可如下：⁸²

$$\text{權力} = \text{人口} \times \text{生產力} \times \text{政治能力}$$

本文的權力概念乃採用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即「強迫或說服對手遵守我方要求的能力。」下文乃說明權力轉移理論所提到之人口、生產力與政治能力之概念。

一、人口

⁷⁵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Chicago: Free Press, 1947), p.152.

⁷⁶ 原文為“A has power over B to the extent that he can get B to do something that B would not otherwise do.”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R. Bell, D.V. Edwards and R.H. Wagner (eds.), *Political Powe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80.

⁷⁷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2), p.164.

⁷⁸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7), p.26.

⁷⁹ Raymond Boudon and Francois Bourricaud,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 267.

⁸⁰ Tamman and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p. 8.

⁸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15.

⁸²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ote 8 in chapter 1.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人口是國家能夠透過經濟發展開始動員的潛在資源。沒有足夠的人口，一個國家不可能成為強權或超級強權。人口並非決定成為強權或超級強權的唯一因素，但是，如果需要運用到國家階層的生產力時，眾多的人口則可提供龐大的潛在資源。此外，人口因素在三個變量中是最不可能快速變化的。政府能夠藉由經濟的介入改變國家的生產力和政治能力的控制提升其相對政治能力，但是在短期間內，政府很難由政策來操縱人口成長率。⁸³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過去的法國、英國、德國之所以會成為強權國家，是因為當時其他國家沒參與工業革命。今天，這些國家已經不太可能個別地挑戰全球權力層級中具支配地位的國家。原因在於儘管他們的經濟生產力仍然相當高，他們的人口數不足和美國、俄國、中國、印度等國家的人口數競爭。在那些具有較多人口數的國家中，特別要觀察隸屬於開發中國家性質的國家，因為他們仍處於人口數量變遷時期，他們的人口如果繼續成長二十年，即能改變國家權力的層級。相對的，已開發國家已有穩定的人口數，要增加人口是相當困難的。⁸⁴總的來說，一個國家的權力發展潛力，最終是決定於人口多寡，「人口為強權國家必要條件」(population is the sine qua non for great power status)。⁸⁵雖然權力轉移理論強調人口多寡的重要性而較忽略人口素質，事實上，人口素質也是相當重要。人口素質包括了年齡分布、教育水準。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指出，雖然人口的數量非常重要，但是不可忽略其他因素，如年齡的分布。因為在其他情況相等時，一個擁有較多年輕人口(20-40歲)的國家，在國家強權上略勝於一個較多年老人口的國家。⁸⁶

二、經濟成長

眾多的人口並不同於強大的國力，其人口必須具有相當生產力才能促進經濟成長。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經濟成長的基本原則是因應現在和將來的資本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資本有效地反映國家收入和衡量每人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⁸³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18.

⁸⁴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19.

⁸⁵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18.

⁸⁶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 102.

Product, GDP)，然而國家 GDP 值有限，若加以人口龐大及缺乏政治能力，則國家極可能陷入「貧困陷阱」(poverty trap)，也就是生產小於消費。反之，當經濟成長開始，優質的勞動力及有效的政治能力則促使經濟快速的成長。然而經濟的快速成長，通常是集中發生在開發中國家之間，而已開發國家由於已達到相對高水準的資本累積和政治能力，致使經濟成長的力道會趨於緩和。⁸⁷

奧根斯基依國家階段發展特性，提出了內生成長理論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說明科技革命結合政治能力改善，會幫助已開發社會維持穩定成長速度，但是無法保證他們能持續位居迅速開發中國家之上。圖 2-3 說明不同國家的政治能力有著不同的成長軌跡，而國家不是朝向「貧困陷阱」(圖的左下方)就是維持經濟的成長(圖的右上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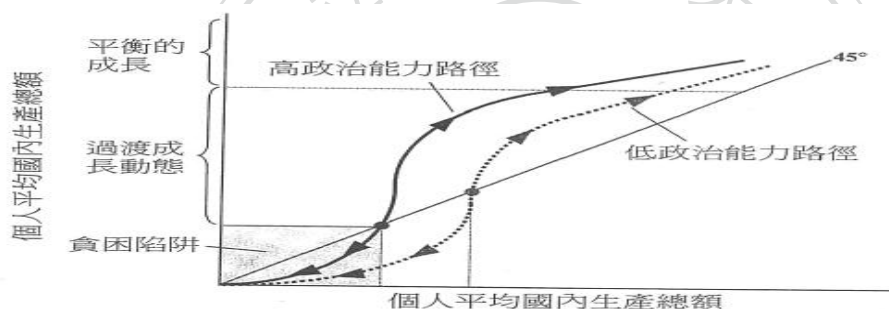


圖 2-3：內生成長曲線

資料來源：Ronald Tamman and Jacek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17.

權力轉移理論強調權力的轉移是屬於動態，在此狀況下將影響權力的穩定性。雖然國家權力的成長，不致受國際干預而產生急劇的變化，卻可能受到技術及 GDP 的聚合數量多寡影響。因此，處於經濟成長不同階段而人口數相似的國家間，其中一方會處於支配地位。而當他們處於相同的階段，且人口數相似時，就是一種均勢的狀態。從戰爭的觀點來看，均勢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引爆因素。換言之，當一個位於全球權力層級頂部，而人口較少但已達到經濟成長狀況的社會，被一個人口大很多，且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超越時，是國際體系中潛在最危險的狀況。這樣的超越增加戰爭的可能性。儘管已開發國家具有技術優勢，由於動態化的收斂性，具高經濟成長率的挑戰者在國際體系中會急速竄升。⁸⁸

⁸⁷ Tamman and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p. 16.

⁸⁸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17-18.

三、政治能力

國家權力最後一個組成要素是相對的政治能力，其係指「政府從其人民中擷取資源的能力」(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s to extract resources from their populations)。⁸⁹在政治上有能力的政府可相對地獲得較多資源，從而擴展其國家權力。依據圖 2-3 的描述，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因為個人精力多消耗在求取日常生活所需，要從其中獲取資源較為困難。然就國家發展而言，在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和經濟成長較高的國家中，國家獲取資源的能力有顯著的不同。在高強度政治控制的國家，能有效動員其潛在人口資源使國家的權力增強。以越戰為例，北越由於有效的政治控制，可從較少的人口中取得較高比例的資源；而南越雖然佔有經濟與人口的優勢，但因較弱的政治控制力而失敗，即使美國以大量援助和直接的軍事介入，仍然無法使南越獲得優勢。對具有眾多人口和生產力持續改善中的國家而言，相對政治能力為國家權力變化的關鍵變數。

參、滿意與不滿意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各國對全球或區域權力層級內規則之滿意度，決定了戰爭或和平。」(the motivation driving decisions for war and peace is relative satisfaction with the rules of global or regional hierarchy) 均勢的結構情況下最有可能發生戰爭，而企圖提升國家在權力層級中地位的想法會產生國家間的衝突對立。不滿現況的國家會去挑戰既有的權力層級；反之，滿意現況的國家則是尋求共同解決的方案來提升他們的經濟與安全利益。理論上，那些位居權力層級上端的國家，由於控制了大多數的財富與權力，並制定了相關的規則，相對於權力層級中較低階層的國家，前者對於權力分配的滿意度較高。其中，超級強權國家必定滿意現況，也是現況的捍衛者，特別是沒有公開國家挑戰其支配地位時；處於強權層級的國家大多數也是滿意並支持國際體系的現行規範。⁹⁰

然而，少數位居權力層級上端及許多位居底部的國家對現況感到不滿意，同時認為國際體系是不公平，其中有歷史、宗教、意識形態、文化差異等不同原因。圖 2-4 表示滿意度在權力層級中的分布狀況。

⁸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20.

⁹⁰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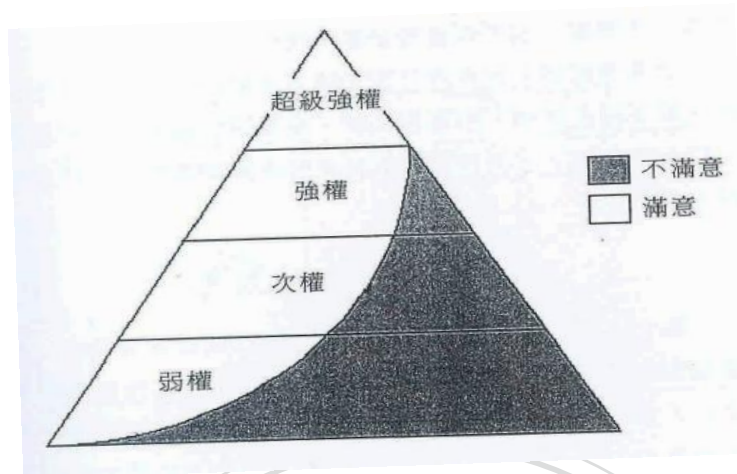


圖 2-4：滿意度在國際體系的分佈

資料來源：Ronald Tamman and Jacek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10.

此外，權力轉移理論也說明了滿意與不滿意國家間的互動關係，即雙方可能採取合作和不合作的互動模式，如表 2-1 所示。表中第一欄說明，在彼此均為滿意現況的國家中，雙方的互動是合作關係，如北約與美國，以及歐盟成員國間的經濟整合均屬之。如果合作程度惡化，即意味著某一國家也許會變得不滿意。如此雙方的關係將變為更具競爭性。

第二欄說明滿意與不滿意現況的國家互動情形，採取合作的方式會發生在滿意現況的國家預期另一個國家會變為滿意時，這個過渡時期應該是越短越好。而較為普遍的關係是雙方採取對抗性的競爭模式，若挑戰者對其在全球或區域權力層級的地位不滿，而企圖藉發動戰爭來重新排序的話，將會造成不合作的極端形式發生。

第三欄是兩個不滿現狀國家的互動關係，如果他們都希望改變現狀，其結果可能是兩國尋求合作的夥伴關係，來共同對抗滿意現狀國家所組成的聯盟。然而，如果兩國對現狀的不滿意係基於不同的原因，也許會造成對現況採取不同甚至徹底的改變，則彼此的關係將會是具有敵意，並有可能會訴諸於戰爭。

表 2-1：滿意與不滿意的動態

		滿意－滿意	滿意－不滿意	不滿意－不滿意
關係類型	合作	安全體系中的 經濟整合	競爭－改善	共謀性夥伴關係
	不合作	競爭－惡化	對抗式的競爭	階層重組戰爭 升高性戰爭

資料來源：Ronald Tamman and Jacek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11.

肆、超越與均勢

為什麼國際體系中會產生衝突？大部分的相關理論僅廣義的解釋國際體系「如何」及「為何」會出現衝突。然而，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其理論說明國際衝突的核心問題：時間（timing）、啟動（initiation）、代價（cost）、持續時間（duration）、和戰爭的結果（consequences of war）。⁹¹

有兩個定義架構條件的概念，大幅地增加戰爭的可能性。第一個是「均勢」。在權力轉移理論中，當一個強權國家的資源發展至超級強權國家資源的 80% 以上時，即為一個潛在挑戰者，並於國際體系中產生均勢的情況。當這個挑戰者的資源超過了超級強權 20% 時，此均勢情況即結束。

第二個概念為「超越」。當一個崛起的權力國家進入內生成長曲線的急遽成長部分且其經濟的發展比超級強權更為快速時，超越情況即產生。在超越過程中，崛起的國家是以生產力或政治能力的增加而與超級強權國家達到均勢，並依相對權力的大小，很自然的超越超級強權。

圖 2-5 乃權力轉移理論說明挑戰者和超級強權間的相對權力與時間的變動情形。實

⁹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21.

線是防禦者或超級強權國家的權力變動曲線，虛線式挑戰者的權力變動曲線。在變動初期，超級強權因成熟的經濟導致其權力的成長相對地落後新生的挑戰者，但超級強權對於潛在挑戰者仍有絕對的優勢，雙方亦有相同的認知。在這樣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發生戰爭，其結果是和平的。潛在挑戰者即使對其在全球或區域的權力體系中資源的分配不滿，在無足夠的能力改變現有的權力制度與規則時，它會選擇和平而非戰爭。

當挑戰者的高成長率使其與超級強權的相對權力間隙縮小時，它們趨近於均勢情況。儘管超級強權仍保有其優勢，但其影響挑戰者的能力已漸減少。在均勢的區間裡，挑戰者和超級強權都體認到「超越」情形將會發生。此時，如果雙方對於現況理解有不同看法存在時，尤其是挑戰者不滿意現況時，戰爭將可能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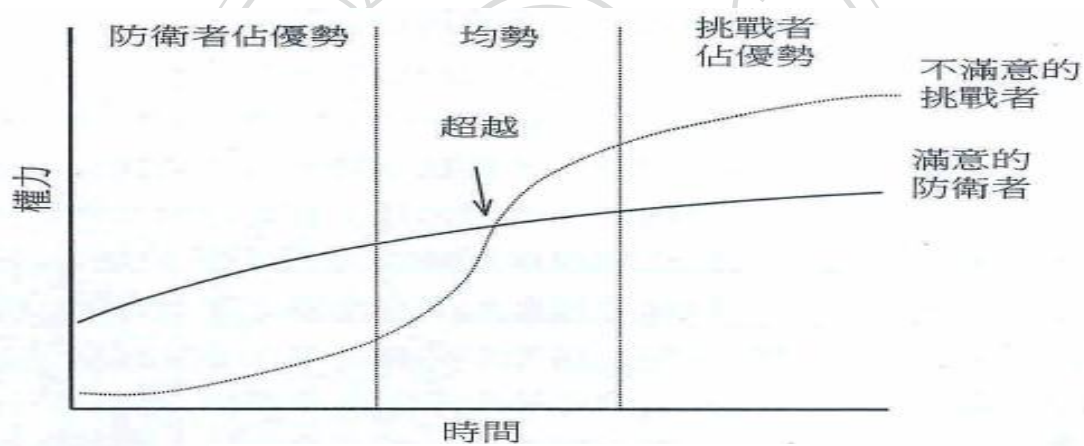


圖 2-5：挑戰者與防禦者的權力轉移過程

資料來源：Ronald Tamman and Jacek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22.

伍、超級強權對世界政治的經營

權力總是在變動當中，權力轉移理論對於超級強權如何維持其地位、如何管理世界政治乃提出建議。該理論的建議包括了對於結盟的管理（managing alliances）、國際組織的管理（manag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滿意度的管理（managing satisfaction）、權力的管理（managing power）、核武器的管理（managing nuclear weapons）、區域危機的管理（managing local crises）。

在結盟管理部份。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結盟的國家間對現況的評估結果相類似時，

聯盟是穩定的。穩定的聯盟不會因為一些事故而輕易改變。由超級強權組成的聯盟，係以滿意現況的國家中創造優勢地位的設計方式來加強系統的穩定性。一個成功的超級強權會吸引大量的強權和次強權及一些小國家支持其領導地位，各國參與超級強權即成為一個現況聯盟系統的一部份。⁹²

在國際組織管理部份。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組織為不滿意國家所能挑起的衝突提供解決爭執的環境和場所，而聯合國安理會即為了解權力轉移在經營國際組織時的有用機構。⁹³

在滿意度管理部份。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為了維持現有的權力體系狀況，超級強權和其最緊密的盟友的主要目標是在國際體系中擴充滿意度。超級強權必須小心，對爭執或認知絕不可有不公平處理而使系統中的不滿轉移至其他部分。至於經濟共同體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美北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歐盟（European Union, EU）等，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目的是提供經濟利益，以提升超級強權主導的聯盟內之滿意度。此聯盟系統中的利益再分配，目的在創造並保持高滿意度，並防止衝突時吸引較活躍的成員到主要聯盟。如果這些經濟共同體能刺激成長，則這個努力對增加滿意國家陣營的權力資源有其間接的利益。此外，超級強權必須不遺餘力地確保自己的聯盟成員對於領土的爭執不發生公開的衝突。⁹⁴

在權力管理部份。當經濟發展成熟時，經濟成長率會較緩，超級強權可能會發現一個快速成長的挑戰者在強權國家等級中竄升，而超級強權國家如何做才能維持優勢並避免超越情況的發生？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應該透過聯盟系統的擴展、經濟上的擴張，或者兩者兼具。聯盟系統的擴展係指，試圖吸納包括不滿意國家在內的新成員加入其主導的聯盟。每一個新成員加入聯盟即增加了聯盟的權力基礎。不過，在某些情況下，獲得新成員正式的結盟是不可能的、甚至不值得，因此可以透過經濟上的擴張，即以經濟協定（economic agreements）來加以約束。這些經濟協議能夠產生一個雙方自制為主的互

⁹²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33-34.

⁹³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35.

⁹⁴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35-37.

惠中心 (reciprocal center)，不需要其他的激勵就可以解決政治上的爭端。⁹⁵

在核武器的管理部份。在核武時代，安全競爭會因此而減少嗎？有兩派的說法。一派以麥克納馬拉 (Robert S. McNamara) 為主，認為「無論什麼條件下，核武器都達不到任何軍事目的，唯一用途是恫嚇敵人也放棄核武器。」⁹⁶換言之，核武器根本派不上用場，因此大國之間的安全競爭仍是存在。另一派認為，由於核武器的問世，使得大國擔心戰爭會由常規戰爭升級為核戰爭，所以根本不會以常規戰爭攻擊對方。如杰維斯 (Robert Jervis) 提到：

核武器像核革命理論所說的那樣具有影響力的話，大國之間就會有和平，危機就會極少出現，任何一方不會急迫地將討價還價的優勢推向極限，現狀就相對容易維持，政治結果就不會與核平衡或常規平衡緊密相連。雖然證據模糊，但是一般還是承認這樣命題。⁹⁷

有關這個議題的論戰，權力轉移理論的立場是，儘管擁有核子武器，當存在超越和不滿情況時，戰爭的可能性仍高，核子嚇阻是脆弱的。在面對竄升的不滿狀況的挑戰者時，核子武器的嚇阻效果並非是絕對的。由一個對現況滿意的防衛者所掌握的核子優勢可以確保和平，但對於一個不滿現況的挑戰者而言，核子均勢和核子優勢可能會導致戰爭。⁹⁸

在區域危機的管理部份。在挑戰者快速的成長率、超越、和不滿意的情況下，權力轉移理論預期會有許多區域性層級發生衝突並遍及全球。在此情況下，權力轉移理論認為，超級強權不應該未能檢視利益而介入任一衝突，應該集中注意力於關鍵的責任之上，就是維持和集中它的力量在全球層次，使它的聯盟內各自成員能滿意現況和處理可能的挑戰者。⁹⁹

⁹⁵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37-39.

⁹⁶ Robert S. Mc Namara, "The Military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62, No.1 (Fall, 1983), p. 79.

⁹⁷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5.

⁹⁸ Tamman and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hapter 4.

⁹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40.

第三節 英美權力轉移過程

19 世紀是美國崛起的世紀，在其崛起的過程中受到當時霸權國英國的關注，但最終兩國卻在 20 世紀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權力轉移。若從之前的例子來看，權力轉移總是伴隨著戰爭，而和平的權力轉移似乎不可思議。為什麼英美之間在權力轉移過程中沒發生戰爭？本文從權力轉移理論所提供的兩個變項：實力與滿意度來加以分析，並針對前述分析作出綜合評述。

壹、實力分析

英國前首相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曾說過，「需要謹記在心的關鍵...（是）一個國家的強大並不取決於它與自己過去的比較，而取決於它在世界中的相對地位」。¹⁰⁰ 我們試圖從經濟、人口、財富、能源、軍隊人數及戰艦噸位等方面來比較英、美之間在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實力。

首先，在 1873-1913 年間，美國經濟成長率以 5% 的速度發展，而英國的平均成長速度為 1.6%。在鋼鐵的產量（見表 2-2）、整體工業潛力（見表 2-3）、與在世界製造業產量中占有率（見表 2-4）方面，美國均領先英國。

表 2-2：1890-1938 年大國的生鐵與鋼鐵產量

國別	1890 年	1900 年	1910 年	1913 年	1920 年	1930 年	1938 年
美國	9.3	10.3	26.5	31.8	42.3	41.3	28.8
英國	8.0	5.0	6.5	7.7	9.2	7.4	10.5
德國	4.1	6.3	13.6	17.6	7.6	11.3	23.2
法國	1.9	1.5	3.4	4.6	2.7	9.4	6.1
奧匈帝國	0.97	1.1	2.1	2.6	—	—	—
俄國	0.95	2.2	3.5	4.8	0.16	5.7	18.0
日本	0.02	—	0.16	0.25	0.48	2.3	7.0
義大利	0.01	0.11	0.73	0.93	0.73	1.7	2.3

資料來源：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200.

¹⁰⁰ Quoted in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2.

表 2-3：1880-1938 年大國整體工業潛力的消長
(以 1900 年時的英國為 100)

國別	1880 年	1900 年	1913 年	1928 年	1938 年
英國	73.3	100	127.2	135	181
美國	46.9	127.8	298.1	533	528
德國	27.4	71.2	137.7	158	214
法國	25.1	36.8	57.3	82	74
俄國	24.5	47.5	76.6	72	152
奧匈帝國	14.0	25.6	40.7	—	—
義大利	8.1	13.6	22.5	37	46
日本	7.6	13	25.1	45	88

資料來源：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201.

表 2-4：1880-1938 年大國在世界製造業產量中占有率的消長

國別	1880 年	1900 年	1913 年	1928 年	1938 年
英國	22.9	18.5	13.6	9.9	10.7
美國	14.7	23.6	32.0	39.3	31.4
德國	8.5	13.2	14.8	11.6	12.7
法國	7.8	6.8	6.1	6.0	4.4
俄國	7.6	8.8	8.2	5.3	9.0
奧匈帝國	4.4	4.7	4.4	—	—
義大利	2.5	2.5	2.4	2.7	2.8

資料來源：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201.

其次，在從英美兩者財富與人口方面相比較，美國在 1900 年所佔世界財富相對份額的 38%，勝過於英國的 23%。1880-1900 年美國人口數從 5000 萬人增加到 7500 萬人，而英國則是從 3400 萬人增加到 4100 萬人（表 2-5）。

表 2-5：1800-1900 年之間英國與美國財富與人口之比較

占世界財富的相對份額					
國別	1800	1830	1850	1880	1900
英國	未知	47%	59%	45%	23%
美國	未知	12%	15%	23%	38%
人口數(千)					
英國	15,717	24,028	27,369	34,885	41,459
美國	5,308	12,866	23,192	50,156	75,995

資料來源：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 248.

第三，若從甘迺迪（Paul Kennedy）所說，能源消費（energy consumption）是衡量經濟實力的最佳指標來看，美國在 1890 年超越英國，到了 1900 年其能原消耗量超過德國、法國、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沙皇俄國、日本和義大利的總和（表 2-6）。

表 2-6：1890-1938 年大國能源消耗的比較（單位：百萬噸）

國別	1890 年	1900 年	1910 年	1913 年	1920 年	1930 年	1938 年
美國	147	248	483	541	694	762	697
英國	145	171	185	195	212	184	196
德國	71	112	158	187	159	177	228
法國	36	47.9	55	62.5	65	97.5	84
奧匈帝國	19.7	29	40	49.4	—	—	—
俄國	10.9	30	41	54	14.3	65	177
日本	4.6	4.6	15.4	23	34	55.8	96.5
義大利	4.5	5	9.6	11	14.3	24	27.8

資料來源：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 248.

第四，在海陸軍人數與戰艦的噸位方面，1880-1914 年，英國的實力都是勝過於美國（見表 2-7）。

表 2-7：英、美海陸軍人數與戰艦噸位之比較

海陸軍人數					
國別	1880 年	1890 年	1900 年	1910 年	1914 年
英國	367,000	420,000	624,000	571,000	532,000
美國	34,000	39,000	96,000	127,000	164,000
戰艦噸位					
英國	650,000	679,000	1,065,000	2,174,000	2,714,000
美國	169,000	240,000	333,000	824,000	985,000

資料來源：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203.

從上述幾個數據，可說明美國的經濟實力在 1900 年已超越了英國，而軍事實力仍不足以對抗英國。不過，權力轉移理論者以計量的方式加以分析，發現在 1875-1885 年期間美國整體實力與英國已呈現「均勢」的現象（見圖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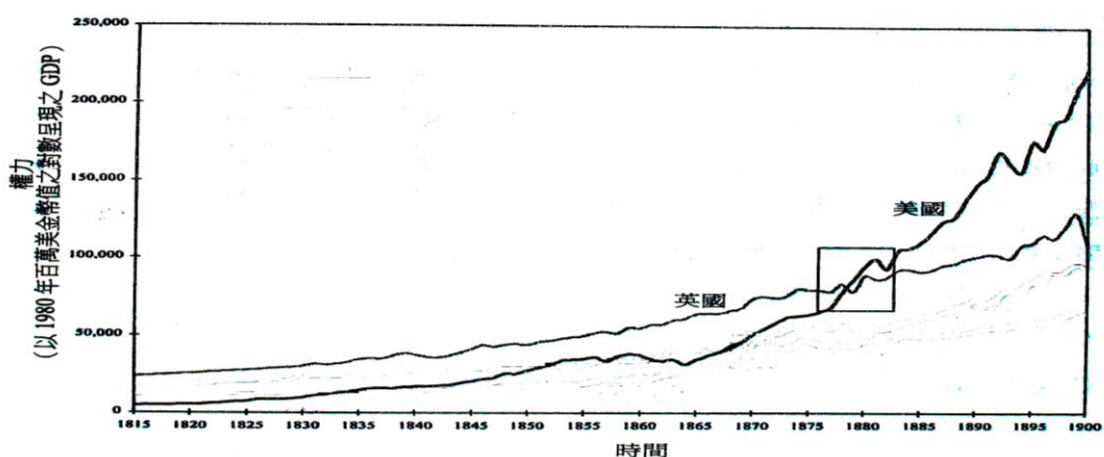


圖 2-6：英、美的權力均勢與轉移之時間

資料來源：Ronald Tamman and Jacek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p.49.

貳、滿意度分析

英美兩國在權力轉移過程中的滿意度為何？為了能比較完整與系統的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英、美兩國在美國建國之後至權力轉移這段約一世紀時間來看，因為英美兩國的滿意度在這段期間發生了從不滿意到滿意的明顯變化。從美國建國至 19 世紀初期，英美之間對彼此是不滿意的，亦即不滿意彼此的角色地位，因此軍事衝突不斷。19 世紀中期，英美之間的不滿意狀態下降，軍事衝突減少。19 世紀後期，英美之間是屬滿意狀態，兩者對於自己的角色地位與對方的角色地位均認同，因此不再發生軍事衝突現象。

一、1776-1814 年：雙方均不滿而導致戰爭

從美國建國到 1814 年 12 月英美《根特條約》(Treaty of Ghent) 的簽訂，英美兩國彼此不認同對方的角色地位，也就是不滿意對方。這種不滿意的結果造成了英美之間發生了兩次戰爭。

第一次英美戰爭是美國獨立戰爭。自英國開發海外殖民地以來，為了維護英國本土的壟斷利益，頒布了一些限制殖民地經濟發展的法令，例如《航海條例》(The Navigation Acts)。隨着北美殖民地自身發展，殖民地人民越來越希望減低對英國本土的依賴，尋求獨立發展其自身的經濟。然而，這卻引起了英國當局的不滿，因為英國當局希望北美殖民地能繼續充當其廉價的原材料供應地及商品傾銷的市場，因此，英國當局開始採取很多高壓政策以阻遏殖民地經濟的自由發展。英國當局首先頒布法令，不准殖民地居民向西開拓，並禁止其發行自己的紙幣，再對其課以重稅及解散其議會，這使得殖民地居民感到強烈不滿，並發動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然而，英國當局不但不作理會，更在 1773 年 3 月 5 日派駐北美英軍開槍射殺反抗英國當局暴政的波士頓居民，製造了「波士頓茶葉事件」，使得殖民地民怨沸騰。1774 年英國當局更頒布了 5 項「不可容忍的法案」，激化了雙方的矛盾，也導致了後來兩國之間的戰爭。¹⁰¹

第二次英美戰爭發生於 1812-1815 年，這是美國獨立後第一次對外戰爭。美國獨立

¹⁰¹ 李劍鳴，*美國通史 1 卷* (1585-1775)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 503-586。；張友倫，*美國通史 2 卷* (1775-1860)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 7-44。

戰爭結束後，英美之間的主權之爭並未停止。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省，人口稀少，防禦鬆懈。美國欲向北擴張，並且期待加拿大居民將美國軍隊視為解放者。1812年，美國卸任總統傑斐遜說：「今年將加拿大地區兼併，包括魁北克，只要向前進，向哈立法克斯進攻，最終將英國勢力徹底逐出美洲大陸。」¹⁰²美國必須控制整個北美洲大陸的信念後來被稱為美國的天定命定。但是英國也有戰略優勢。在聖勞倫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邊界地區，北岸的加拿大人口密度和基地設施比南岸的美國高出兩倍。美國聲稱英國在以下三個方面侵犯其主權：¹⁰³

(一) 英國不遵守美國獨立戰爭後雙方 1783 年達成的《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拒絕移交西部地區軍事要塞，並且武裝印地安人，威脅美國的西部邊陲地區。

(二) 英國皇家海軍攔截美國商船追捕逃兵，強征美國海員入伍——這些人雖然出生於英國，但已歸化為美國公民。

(三) 英法之間的拿破崙戰爭導致的貿易禁運，使上百艘美國商船被英國皇家海軍扣押，美國的中立國地位未被尊重。

1811年，美國眾議院的鷹派議員鼓動戰爭。1812年6月18日，麥迪遜總統向國會發表演講後，國會投票宣戰。1814年12月24日，英美雙方簽訂《根特條約》，宣布解除敵對狀態。¹⁰⁴

二、1814-1871年：不滿意度降低

英美《巴黎條約》及《根特條約》的簽訂，代表英國正式承認美國作為主權實體的存在地位，放棄了佔領美國的企圖；美國則放棄了對加拿大侵犯的企圖。最低限度安全（生存）認同的達成，說明了兩國已經開始降低彼此間的不滿意。

儘管兩國已經開始降低彼此間的不滿意，並不意味著兩國真正放棄使用武力、或放棄威脅使用武力來解決雙方的爭端。從 1814 年到 1871 年《華盛頓條約》(Treaty of Washington) 的簽訂，英美兩國還是存在衝突的危機，甚至威脅使用武力來解決爭端，

¹⁰² “War of 1812: Overview, Origins and Course of War,”

<http://encyclopedia.stateuniversity.com/pages/23281/War-1812.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3月13日。

¹⁰³ Kate Caffrey,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British vs America 1812-1815*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7), p. 56-58; p. 101-104.

¹⁰⁴ 張友倫，*美國通史 2 卷*（1775-1860），頁 115-122。

慶幸的是，最終在雙方克制之下，並無爆發真正的武裝衝突。下文舉出四個案例來說明。

首先是「卡羅琳號」事件 (the Caroline affair)。1837 年，加拿大發生反英國的叛亂，邊界局勢開始動盪不安。部分效忠於英國的加拿大人越過爭議邊界，燒毀為加拿大起義者運送物資的美國船隻「卡羅琳號」，並殺死一名美國人，美國隨後逮捕加拿大籍的殺人犯麥克勞德 (Alexander Mcleod)。英國為此感到不滿，要求美國立即釋放麥克勞德，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 (Lord Palmerston) 威脅說：「如果處決麥克勞德，將會引起一場立即開始，而且性質可怕的戰爭，因為它是一場施行報復和懲罰的戰爭」。¹⁰⁵但是這種戰爭的信號，由於美方的克制，而很快地得到抑制，美國國務卿韋伯斯特 (Daniel Webster) 決定和平解決紛爭，避免激發英美軍事衝突，最後釋放了麥克勞德。

其次，幾乎發生在卡羅琳號事件的同時，緬因 (Maine) 邊界爭端問題又突顯出來。美英東段有爭議的邊界地區為 12 萬平方英里，加拿大拘捕了進入爭議地區的美國緬因州的土地局越界官員，從而引發了邊界爭端。雙方都在邊界增加了軍事力量，東北邊界大戰幾乎一觸即發。但美國不願同英國展開一場戰爭，同樣，英國無意擴大事態使得剛剛建立起的雙邊關係惡化。由於雙方的克制，最終選擇了談判，於 1842 年簽訂了《韋伯斯特-阿什伯頓條約》(Webster-Ashburton Treaty)，確定了這一區域的邊界劃分。¹⁰⁶

第三，俄勒岡 (Oregon) 問題。俄勒岡位於落磯山脈到太平洋，位於北緯 42° 與 54° 40' 之間的一大片土地，面積約有 50 萬平方英里。早在 19 世紀初葉，英國商人在此建立許多貿易站，美國商人也設置據點，但兩國從未劃定明確的邊界線。1818 年達成一項協議，以北緯 49° 為界線，位於落磯山脈以西的俄勒岡在十年內由美英共同佔有，對兩國人民自由開放。1827 年雙方又達成協議，決定延長共同佔有期限，如果一方要求結束共同佔有，必須於一年前通知對方。隨著移民的增加，美英兩國爭奪俄勒岡的鬥爭也激化起來。在美國，有人要求以北緯 54° 40' 為美英兩國邊界，高喊「要麼 54° 40'，要麼就是戰爭。」1844 年的總統大選中，俄勒岡問題成為一項政治性議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波爾克 (James Polk) 主張美國人應該擁有俄勒岡與德州，因而得到中西部各州的支持，獲得

¹⁰⁵ Samuel Eliot Morison, 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Vol.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520-521.

¹⁰⁶ Samuel Eliot Morison, 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Vol.1*, p. 522-523.

最後勝選。當時美國的注意力在於準備發動與墨西哥戰爭，一方面派代表與英國協商以北緯 49° 為國界，一方面總統強硬表態終止美英對俄勒岡的共同佔有，宣稱美國對北緯 54° 40' 以南的整個俄勒岡佔有是無庸置疑。美國的主要意圖是透過強大壓力迫使英國接受北緯 49° 為邊界線的建議。英國朝野不願意為遙遠的俄勒岡而真正與美國交戰，外交大臣阿伯丁勳爵 (Lord Aberdeen) 看出美國的心態，因此把一份妥協的條約草案送交美國，以北緯 49° 為美國北界，海岸線以西的國界則是在大陸海岸與溫哥華島 (Vancouver Island) 之間，並且保證哈得孫灣公司 (Hudson's Bay) 能夠自由航行於哥倫比亞河 (Columbia River)。這個提議為美國總統所接受，並送交參議院討論後通過此草案。兩國於 1846 年 6 月正式簽訂，美國參議院亦正式批准俄勒岡條約，爭論多年的俄勒岡問題終告解決。¹⁰⁷

第四，美國的內戰問題也是引發英美衝突的潛在區域。英國在內戰中傾向於南方，林肯對應採取退讓政策，即時釋放了導致兩國危機的「特倫特號」事件 (Trent Affair) 中兩名南部聯盟的使節，使英國失去了對美宣戰的藉口，新的英美戰爭並未形成。但由於內戰中，英國建造的「亞拉巴馬」(Alabama) 號船艦交給南部同盟使用，造成北方慘痛的損失，美國為此向英國提出賠償要求。經過漫長的談判，1871 年 5 月簽訂《華盛頓條約》，英國正式向美國道歉，賠償美國 1,550 萬美元。¹⁰⁸

在 1814-1871 間，美英確定了兩國在北美的邊界問題。儘管雙方在互動過程中潛藏衝突危機，但也由於雙方克制，以談判方式而不是訴諸武力來解決紛爭，大大降低兩國對彼此角色與地位的不滿意。

三、1871 之後：雙方均滿意

美國內戰後，英美兩國對於彼此的角色地位進入滿意時期。滿意的特徵是除了不再使用戰爭或戰爭威脅的暴力方式來解決彼此間問題外，還視彼此為朋友，在朋友需要時鼎力相助。

¹⁰⁷ Ray Allen 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74), pp. 431-452.

¹⁰⁸ W. Stewart Wallac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Canada*, Vol. VI (Toronto: University Associates of Canada, 1948), pp. 259-260.; Perkins, 1993, pp.224-229.

例如，在 1890 年代所發生的委內瑞拉危機中，英國表明英國不使用武力解決紛爭，以及英美兩國是朋友的立場。當時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J. Chamberlain）指出，「我們不貪圖美洲的一英寸領土。兩國之間發生戰爭不僅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而且是一種罪過。...兩個國家是聯結在一起的，而且在情感上和利益上比地面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¹⁰⁹ 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Robert Salisbury）也表示，如果英美發生戰爭是一種「兄弟之間的相互仇殺」，他希望今後「米字旗與星條旗能夠一起飄揚」。¹¹⁰ 在阿拉斯加邊界爭端的問題上，同樣的，英國也表示友好。阿拉斯加邊界爭端的地區是阿拉斯加海岸約 30 英里寬的一個狹長區域，引起爭議的原因是發現金子。加拿大要求英國代表加拿大同美國進行談判，英國做出了讓步，不顧加拿大的憤怒而將大部分的土地仲裁給了美國。¹¹¹ 英國駐美國大使龐斯福特（Julian Pauncefote）表示，「美國似乎是我們現在僅有的朋友，與之相爭是很糟糕的。」¹¹² 這表明英國認同美國做為其朋友的一個身份。

當然，英國對美國採取友善的最佳表現是從西半球大規模的撤軍。自 1890 年代中期開始，英國陸續從美洲撤軍，限制自己在美洲的政治利益。¹¹³ 1904 年，英國決定從牙買加、百慕達群島等地撤出所駐紮的軍隊。1906 年，最後一批英國正規軍離開了加拿大土地。¹¹⁴

做為互動的一方，美國也竭力在一些敏感的問題上對英國形成友好呼應，避免與英國發生對抗，最主要是向英國表達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願與其發生戰爭的想法。1905 年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對一名英國的外交官說，「你永遠不會被兩大英語民族之間可能發生戰爭的夢魘所困擾，即便是在繼續為可能的戰爭作準備的時候，我也從未考慮過同英國發生戰爭，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¹¹⁵

¹⁰⁹ Samuel Flagg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enry Hot, 1955), p. 418.

¹¹⁰ Charles S. Chubb, J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865-199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p. 213.

¹¹¹ 吳克燕、張一民，「美加阿拉斯加邊界衝突」，*社會科學論壇*，9 卷（2005 年），頁 29-32。

¹¹²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4*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 165.

¹¹³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6.

¹¹⁴ Kenneth Bourn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tates, 1967), p. 389.

¹¹⁵ Emanuel Ald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兩國除了表達因朋友的立場而不願發生軍事衝突外，還彼此相互援助。例如，英國支持美國吞併菲律賓，具體的作為乃借給美國海軍登陸艇使其得以順利佔領菲律賓，並公開拒絕西班牙提出的列強共佔菲律賓的要求。¹¹⁶同樣，美國也對英國發動的布爾戰爭（Boer War）給予支持。羅斯福向英國表達，「這場戰爭完全符合兩國的利益，也符合文明世界的利益。」戰爭期間，美國向英國提供大量軍事物資，負擔部份英國戰爭的花費。¹¹⁷

四、英美滿意度變遷的原因

滿意度的轉變是透過互動過程所得出的結果。本文認為英美兩國在文化同質性、戰略克制、及英國需要美國奧援以對付德國等因素，在英美滿意度轉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同質性

英美之間存在顯著的文化同質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英美享有共同關於民主與自由的政治文化。這種一致感尤其在 1832 年英國改革法案（Reform Act）出爐後得到了加強，這一法案擴大了有選舉權的選民人數，增加下議院的權力，從而增加兩國政治認同的基礎。美國人阿伯特（Lyman Abbott）曾積極倡導並鼓吹英美聯盟，「對於自由和民主、民權、民智（popular intelligence），對於人類進步事業以及一個自由而現實的基督教而言，誰能衡量出建立這樣一個聯盟會給我們在這些方面帶來好處呢？」¹¹⁸當時，英美社會中存在這種思想，反映民眾對兩國同質政治文化的認知。

其次，英美「種族血親關係」（racial brotherhood）。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的年代裡，許多英美菁英都認為他們共同持有的種族身分超越了其他世界民族，「白人負擔」（white man's burden）論的流行說明的這一點。他們一致認為，作為白人的代表，他們在道德上被賦予神聖的使命去拯救世界，來使世界變得更好。在 1814 年《根特條約》

342.

¹¹⁶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4*, p. 33-50

¹¹⁷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93.

¹¹⁸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55.

簽訂後，這種「同源同種」的認同得到強化，也就是他們需要彼此合作，極力避免衝突的發生。

(二) 戰略克制

戰略克制在英美之間從不滿意到滿意的轉換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從 1812 年以後，英美雙方進入了戰略克制的調整期，兩國對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進行談判，特別在涉及領土爭端的議題上（如緬因、俄勒岡、阿拉斯加邊界爭端）表現出克制，最終達成和解，消除長期以來一直困擾兩國關係的一系列嚴重衝突。隨著美英雙方自我戰略克制，使得雙方得對彼此越來越滿意。1905 年，美國羅斯福總統曾說過，「我認為英美之間的糾紛引起的所有危險都已經結束了，而且永遠結束了...同其他大國相比，英國對我們的友好感更加真誠。」¹¹⁹

(三) 英國需要美國奧援

18、19 世紀，英國歐洲政策是保持歐洲列強相互制衡的均勢政策，避免出現一個危及它的利益國家。英國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個至關重要的籌碼，一旦歐洲大國權勢的天秤發生傾斜，它將力量加到弱勢一邊，使力量對比符合英國利益的需要。¹²⁰19 世紀中後期，除了美洲的美國迅速崛起外，歐洲的德國也在崛起。以當時英國的軍力無法同時對付兩個崛起的大國，必須從中選擇。當時英國軍方曾建議：「在一場未來的戰爭中，德國將是英國最可能的對手。」¹²¹因此，英國在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考量下，選擇了德國。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英國與德國實力的正式較量。戰爭前期，德國擊敗俄國並重創英、法。當整個戰局不利於協約國時，美國於 1917 年 4 月參戰。美國派遣兩百萬大軍赴歐洲參戰，同時援助大量的武器、工業產品、糧食給協約國。由於美國的參戰，最終由協約國贏得戰爭勝利。同樣，1939 年 9 月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

¹¹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172.

¹²⁰ 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大外交* (台北: 智庫文化, 1998 年), 頁 116-117。

¹²¹ John Gooch, "The Weary Titan: Strategy and Policy in Great Britain, 1890-1918," in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s, States, an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90.

因為美國後來的參戰才使同盟國最後獲勝。由於英國需要美國的奧援，特別是在抵禦戰爭上，使得英美關係得以更密切。誠如 1935 年英國首相包德溫（Standley Baldwin）所說，「我一向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論是歐洲或東方，抵禦戰爭最大的安全將是由大英帝國與美利堅共和國密切合作。」¹²²

參、綜合評述

為什麼英美之間在權力轉移過程中沒發生戰爭？這個問題現在可以回答。權力轉移理論告訴我們，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發生較高戰爭機率的要件主要有二：一是均勢、二是不滿意度。¹²³英美之間在 19 世紀末已達到均勢狀態，不過卻無呈現不滿意狀態，因此英美的權力轉移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之間的滿意度是隨著時間與互動而增加，非一開始就對彼此滿意。在 1812 年戰爭發生之前，英美之間可說處於不滿意狀態。1814 年《根特條約》簽訂後，雙方即便潛藏衝突危機，但也由於雙方克制，以談判方式而不是訴諸武力來解決紛爭，因此英美之間的不滿意度降低。當美國內戰結束後，英美進入所謂滿意階段，視彼此為朋友，且相互援助。當然，另一項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英國需要美國奧援以對付德國，20 世紀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若非美國的援助，相信國際局勢的發展會有所不同。

美國的崛起過程是有階段性。在建國成立之後至 19 世紀末，美國首要目標是成為美洲地區的霸權國。美國不斷的向外擴張領土，提升工業化程度，並且有著大西洋這個極佳的天然環境阻隔與歐洲大陸為鄰，使得美國在 19 世紀末最終達成「門羅宣言」的意涵。

20 世紀是美國成為全球霸權的世紀。美國想成為全球霸權國，需要走出美洲的「實力」與「機會」。這兩項條件要素在 20 世紀前期形成，「實力」的部份以經濟與工業潛力為基礎，具體表現在軍事力量上，尤其是海軍力量的壯大；「機會」的部份則落實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面對美國的崛起，英國積極的採取因應措施，包括了從 19 世紀初期的軍事衝突到

¹²² 季辛吉，*大外交*，頁 808。

¹²³ Tamman and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p. 26.

19 世紀末期的默認與援助。這種轉變取決於雙方滿意度的增加。而滿意度的增加又源自於雙方文化同質性(政治文化、血緣關係)、戰略克制以及英國需要美國的奧援。雙方滿意度的增加使得即便兩國在 1880 年代已產生了權力均勢，卻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戰爭來進行權力轉移。

第四節 權力轉移理論與相關理論之比較

現實主義作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主要典範已久，常被運用來解釋國際政治或者是遭受批評的對象。我們發現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與現實主義脫離不了關係。現實主義隨著時代的改變，其內部間對於一些傳統論點出現分歧，導致形成不同的分支派別。儘管權力轉移理論者宣稱，其理論不屬於現實主義，而是理性主義者 (rationalist)。¹²⁴然而，在一些學者看來，它仍是現實主義家族的一份子，因為它的許多觀點與現實主義相近。¹²⁵

在現實主義中，與權力轉移理論相近的理論主要有霸權周期論 (theory of hegemonic cycle)、霸權穩定論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攻勢現實主義 (offensive realism) 等三個，因為這些理論所要探討的乃圍繞在霸權、戰爭、以及國際體系穩定等相關議題之上。本節之目的為簡要論述此三個理論的內容，並於最後與權力轉移理論做比較。

壹、霸權周期論

霸權周期論，強調由霸權主導的國際體系存在一定的周期性，此理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為莫德斯基 (George Modelski)。他根據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 (Nikolai Kondratieff) 的長波論 (long cycle)，¹²⁶從技術革新對經濟社會政治的影響角度來深入研

¹²⁴ Tamman and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2000, p. 6.

¹²⁵ 多爾蒂 (James Dougherty) 與普法爾茲格拉夫 (Robert Pfaltzgraff) 曾在國際關係理論分類中，把權力轉移理論與現實主義歸為一類。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th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1), chapter 7.

¹²⁶ Nikolai Kondratieff 在 1926 年的一篇文章中考察了 1780-1920 年間世界生產與價格的變動，從中分析出 3 個周期與 6 次起伏，此論點被西方學者稱之為「康式周期」。Joshua Goldstein, "Knodratieff Waves as War Cyc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19 (December 1985), p. 411-444.; Richard Rosecrance,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Spring 1987), p. 283-301.

究。在對 1495 年以來國際衝突和領導權（霸權）模式進行考察之後，發現霸權循環周期大約是 100 年。¹²⁷

在每次周期中，整個國際體系要經過四個不同階段，分別為第一，宏觀決定階段（macrodecision），即全球戰爭階段（global war），其特徵是大範圍嚴重的暴力，並解決了誰是「霸主」與領導權的問題；第二，執行階段（implementation），即世界權力階段（world power），其特色是某個國家有實力成為全球領導者並執行新的計畫；第三，議程設置階段（agenda setting），即權威喪失階段（delegitimization），其特色是提出了世界領導者的合法性問題，新的問題進入了全球議程；第四，同盟階段（coalitioning）或為分裂階段（deconcentration），其特徵是世界領袖的權力衰落到低點，一個或多個挑戰國組織新的同盟來挑戰既有領導者的地位。¹²⁸

每次周期都有一個領導者，它們是 16 世紀的葡萄牙、17 世紀的荷蘭、18 與 19 世紀的英國、20 世紀的美國。全球戰爭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世界領導者會支配一個單極體系，而這個體系是所有體系最穩定的體系。但這種穩定的體系不會持續下去，而會讓位於兩極體系，並最終讓位於多極（分散的）體系，而多極體系卻是最不穩定的。¹²⁹自 1500 年以來，先後成為挑戰國的國家有西班牙、法國、德國與蘇聯，而這些國家不惜發動戰爭來奪取世界領導權。然而，在國際關係史上，還沒有一個挑戰國曾贏過全球戰爭的勝利，相反的，新的霸權國通常是前一個霸權國的同盟或合作者。¹³⁰表 2-8 說明莫德斯基提出的霸權周期情況。

¹²⁷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87).

¹²⁸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Thomp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Manus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 24.

¹²⁹ *Ibid.*, pp.28-29.

¹³⁰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No. 2, (1978), p. 214-238.

表 2-8：1495 年以來霸權周期的過程

全球性戰爭	世界領導大國	霸權喪失的過程	
		權威的喪失	挑戰國
1495-1516 年 義大利戰爭和印度洋戰爭	1516-1539 年 葡萄牙霸權	1540-1560 年	1560-1580 年西班牙
1580-1609 年 西班牙荷蘭戰爭	1609-1639 年 荷蘭霸權	1640-1660 年	1660-1688 年法國
1688-1713 年 路易十四戰爭	1714-1739 年 英國第一次霸權	1740-1763 年	1764-1792 年法國
1792-1815 年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	1825-1849 年 英國第二次霸權	1850-1873 年	1874-1914 年德國
1914-1945 年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	1945-1973 年 美國霸權	1973-2000 年	2000-2030 年蘇聯

資料來源：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87), p.40.

此外，莫德斯基還論述了成為「世界大國」（霸權國）的若干條件，分別為第一，從地理環境來看，世界大國必須是有「安全剩餘」（surplus security）島國或半島。比如葡萄牙地處伊比利半島前半部、荷蘭擁有許多小島、英國以直布羅陀海峽為屏障，而美國則是一個巨大的島國。第二，要能維持海軍力量等全球性政治和戰略組織，集中擁有占世界整體一半以上的海軍力量。第三，必須是主導經濟（leading economy），這不是指單純的經濟規模和富裕程度，而是以經濟創造能力為中心的綜合經濟實力。最後，國內政治是開放和穩定的，即便有偶爾的內亂或政局不穩等國內問題，也不足以削弱其對外領導作用。¹³¹

貳、霸權穩定論

¹³¹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33-434。

「霸權穩定論」是金德爾柏格 (Charles Kindleberger) 所創，¹³² 吉爾平 (Robert Gilpin) 則是對於「霸權穩定論」做了比較完整的論述。¹³³ 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所提出的「後霸權主義」是對「霸權穩定論」的修正，¹³⁴ 但在理論上與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有很大的差別。¹³⁵ 一般而言，「霸權穩定論」的主要內容為霸權帶來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霸主提供公共財 (public good)、霸權必衰弱、以及霸權喪失導致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穩定等方面的論述。

首先，霸權帶來穩定。所謂霸權國，是指軍事、政治、經濟、及自然資源等方面實力遠遠超過其他國家，能夠強行推行並在一定時期實現其意志的大國。由這種國家主導下建立的國際秩序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認同。霸權國與國際體系穩定之間存在正相關，正所謂「由一個霸權國主宰的霸權結構非常有益於強大的國際體系的發展，這個體系的運行規則比較明確，霸權國既能夠也願意建立和維持自由經濟秩序的規章和條例，自由國際體系因此能夠和得充分的發展。¹³⁶」能夠是指實力，願意是指霸權國恪遵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並願意為國際體系的穩定承擔相應的責任。

其次，霸主提供公共財。開放的貿易體系、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等是霸權國建立霸權體系而必須提供的公共財。儘管知道有人會搭便車，霸權國還是毫不猶豫地去進行諸如擴大自由貿易體制、開放本國市場等努力。對霸權國而言，這並非是生產性投資，而是本國經濟的一種消耗。為了彌補這種消耗，霸權國必須抱持強大生產能力以擁有充分的「經濟剩餘」(economic surplus)。¹³⁷

第三，霸權必衰弱。霸權國家對國際秩序的控制是以經濟上有剩餘為基礎。然而，為維持秩序而付出的成本又是不斷的上升。比如為了維持和平而不得不保持高水準的軍

¹³²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¹³³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6-92;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the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¹³⁴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¹³⁵ Gilpin 認為，霸權國國力的強弱影響國際體系的穩性與否。不過，Keohane 認為，即便霸權國國力衰退，並不一定會導致國際體系的不穩定，因為到了「後霸權時代」，維持體系的穩定可透過多國合作與協商的方式來進行，不再需要由一國來決定。

¹³⁶ Robert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cited in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 p. 72.

¹³⁷ 樊勇明，「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現代國際關係*，9 期 (2000 年 9 月)，頁 21。

費開支和技術研發費。又如為了維持自由貿易體系而不得不開放本國市場和對外轉讓技術從而使本國的經濟優勢和技術優勢逐步喪失。同時，「經濟剩餘」因邊際效用遞減法則和經濟結構的軟性化而越來越少，最後終歸於完全消失。在負擔越來越沉重而國際社會中搭便車者經濟迅速壯大的情況下，霸權國提供國際公共財的能力和意願逐漸減弱，以致最後完全喪失。¹³⁸

最後，霸權喪失導致不穩定說。一旦霸權國的國力衰竭，國際社會馬上會出現政治不穩定和自由貿易體制的瓦解，隨即出現為了爭奪世界統治者寶座而爆發的霸權國與挑戰國之間的霸權戰爭（hegemonic war）。吉爾平提到：

世界上所知的每一個國際體系都是霸權戰爭之後領土、經濟和外交重新結盟的產物。一次霸權戰爭之後最重要的後果就是它改變了這個體系，以適應新的國際權力的分配；它帶來了對該體系基本組織部份的重新安排。...戰爭決定了誰將統治國際體系，誰的利益將在新的國際秩序中獲得優先照顧。...總之，霸權戰爭是演變過程中能夠起作用 and 必要的組成部分，是國際體系的動力。¹³⁹

參、攻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強調，一個國家只有成為霸權國，才能降低自身的安全受到其他國家威脅的可能性。攻勢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性人物包括拉伯斯（Eric Labs）、施韋勒（Randall L. Schweller）、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以及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其中以米爾斯海默最具代表性。他不僅提出多篇眾所矚目的文章，而且在理論的詮釋上也構成比較完整的系統。¹⁴⁰2001年出版的《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書便是完整闡述其攻勢現實主義理念的代表著作，此書被喻為「繼1979年華爾茲（Kenneth Waltz）《國際政治理論》一書後對國際政治中現實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¹⁴¹華爾茲更認為此書是「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威之作。¹⁴²

¹³⁸ 樊勇明，「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頁21-22。

¹³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98.

¹⁴⁰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42卷2期(2003年3-4月)，頁6。

¹⁴¹ Sean M. Lynn-Jones, "Books Reviews o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8, No.2 (April, 2002), p. 365-366.

¹⁴² 參閱「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之封底，數位重要學者對該書的評價。

攻勢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是，由於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都具備某些進攻的軍事力量（offensive military capability）、國家永遠無法掌握其他國家的意圖（intentions）、生存（survival）是國家的首要目標、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rational actors），所以國家會追求權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只有當國家成為霸主，它才會停止權力的追求，轉而維持權力，成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¹⁴³圖 2-6 則簡要地說明攻勢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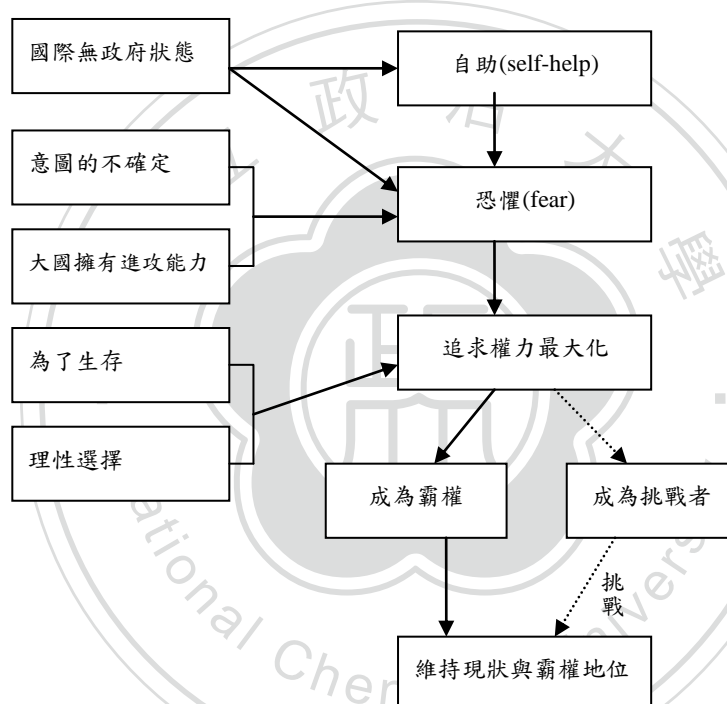


圖 2-7：攻勢現實主義的邏輯架構

資料來源：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
問題與研究，42 卷 2 期(2003 年 3-4 月)，頁 6。

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如何快速獲取權力？攻勢現實主義認為，主要包括了戰爭、訛詐（blackmail）、誘捕（bait and bleed）與坐觀血腥廝殺（bloodletting）等方式。¹⁴⁴所謂訛詐，即是國家以犧牲對手的方式為自己獲取權力，而無須與對手發生戰爭，使用強制或脅迫而不是實際的武力產生所期望的結果。誘捕，即是設法造成兩個對手投入持久

¹⁴³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apter 2.

¹⁴⁴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147-155.

戰，使彼此耗盡能力，而本身卻旁觀，完好無缺地保持軍事力量。坐觀血腥廝殺，即是對手獨立地參加戰爭，而旁觀者只關心促使對手彼此力量消耗，本身則置身於戰爭之外。至於戰爭，在攻勢現實主義的眼裡是有意義的冒險，因為統計 1815 年至 1980 年間發生 63 場戰爭中，發現那發動戰爭的一方贏了 39 次，勝利的機率高達 60%。¹⁴⁵

不同於其他大國不斷增強權力，以及不斷等待機會對霸權地位的追求，既有霸權國所追求的即是維持霸權地位，避免其他大國崛起所可能造成的挑戰。基於此，霸權國應擔任「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 的角色，即維持其他區域的權力平衡，阻止有一個崛起大國成為另一區域霸權國的可能。¹⁴⁶對「離岸平衡者」而言，所追求的不是一開始便積極的介入維持兩股力量的均衡，而是當力量明顯出現失衡時，不得不介入以平衡崛起中的國家。如果平衡的局面未被顛覆，「離岸平衡者」的作為應該是「推卸責任」，由該區域的其他國家試圖維持該區域的平衡。推卸責任的迷人之處在於推卸責任者不必非要與侵略者交戰，甚至透過觀望的態度來增強權力。¹⁴⁷

肆、權力轉移理論與三個理論之比較

權力轉移理論與上述三個理論有何相似與差異性？可以從國際層級體系、權力的認知與分析、均勢與戰爭、核武器與戰爭、滿意度與戰爭等多方面來加以比較分析。

一、國際層級體系

包括權力轉移理論在內的四個理論都認為國際體系存在著一個領導者、支配者或是霸權國。這個支配國的權力勝過於其他國家許多，由此國家來維持國際秩序是最能創造國際體系的穩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攻勢現實主義並不認為存在全球性霸權者，至多僅是區域霸權，這與其他三個理論在霸權的認知上有很大的差別。攻勢現實主義指出：¹⁴⁸

霸權意味著對體系的控制，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為對整個世界的統治。不過，

¹⁴⁵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39.

¹⁴⁶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chapter 7.

¹⁴⁷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267.

¹⁴⁸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40-41.

我們可以狹隘地使用體系中的這一概念用它來描述一些特定地區，如歐洲、東北亞、西半球。因此，人們可將支配世界的『全球霸主』和統治某一特定地區的「區域霸主」區別。...事實上，除非一個國家可能獲得明顯的核優勢，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成為全球霸主。統治世界主要障礙在於，國家要跨越世界海洋到是競爭對手的大國領土上謀求權力非常困難。

在攻勢現實主義的眼中，大國能得到最好的結果是成為區域霸權，並可能控制在陸地上與之毗鄰或易於達到的另一地區。取得區域霸主的國家，常常試圖阻止其他地區的大國繼續向外擴張。區域霸主之所以試圖阻遏其他地區出現有野心的霸主，是因為他們擔心一個控制本地區的大國將是一個特別強大的敵人，事實上，後者能在前者的後院自行其是的製造麻煩。區域霸權寧願其他地區至少出現兩個大國，因為兩個大國接近的地理位置迫使它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身上，而不會關注遠處的霸主。¹⁴⁹

二、權力的認知與分析

同樣身為現實主義家族的一份子，四個理論對於權力的定義卻不盡相同，例如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權力是一種「強迫或說服對方遵守我方要求的能力」，而權力的構成要素包括了人口、經濟成長、政治能力等。以吉爾平為代表的霸權穩定論，認為權力是「一國的經濟、軍事以及與之相關方面的能力。」¹⁵⁰至於在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攻勢現實主義眼中，權力「不過是國家所能獲得的特殊資產或物質資源。」¹⁵¹更進一步指出，在國際政治中，一國的有效權力是指「它的軍事力量所能發揮的最大作用，以及與對手的軍事實力對比的情況。」¹⁵²儘管這些權力概念不同，但可清楚地被理解，這是由於在學術上為了研究而對概念採取操作型定義。

嚴格說來，四個理論對於權力概念使用的差別在於分析權力的方式，亦即採取量化研究或是質化研究。霸權周期論與權力轉移理論屬於前者，而霸權穩定論與攻勢現實主義屬於後者。

¹⁴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p. 41-42.

¹⁵⁰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31.

¹⁵¹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57.

¹⁵²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55.

三、均勢與戰爭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支配國與崛起大國實力之間實力的接近是最為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此論點在其他三個理論中也可看到。霸權穩定論認為，隨著相對權力的增加，一個新興國家會企圖改變調整國際體系的規則，改變勢力範圍的劃分，最重要的是，改變領土的國際分配。作為對此的反應，支配國家通過改變其政策以努力恢復體系的平衡來對付這種挑戰。如果這樣的努力失敗，這種失衡就只有依靠戰爭來解決。¹⁵³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權力結構可區分為兩極、不平衡的多極（unbalanced multipolarity）、平衡的多極（balanced multipolarity）三種型態，其中不平衡的多極是最不穩定的結構，最容易爆發戰爭。原因是，該結構出現潛在霸權國（崛起強權），企圖成為區域霸權。這種國家不僅可能使該區域體系中的所有大國都捲入戰爭，而遠處的既有區域霸權則必須抱持著隨時介入戰爭的準備。¹⁵⁴霸權周期論指出，歷史告訴我們全球性戰爭的爆發，最主要是霸權國實力的衰退以及挑戰國實力的增強，而全球性戰爭的發生也決定了下一個霸權的誕生。¹⁵⁵

四、核武器與戰爭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即便在核武嚇阻時代，仍無法阻止戰爭的爆發。霸權穩定論與攻勢現實主義對於此觀點也做出相同的論述。霸權穩定論指出，核武器的出現並沒有完全解決戰爭的問題與完全排除核戰爭的可能性。¹⁵⁶同樣，攻勢現實主義也認為，雖然「核子武器降低了大國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但是並不能因此而保證不會發生核戰爭。常規戰爭仍然存在，安全競爭仍然存在。在「相互保證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時代，美國總統與蘇聯領導人都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在相互保證毀滅的世界裡非常安全，無須過多關注其邊界所發生的一切。」兩國即便各自擁有巨大的核武庫，雙方也投入大量資源在常規力量方面，並極度關注歐洲和全球其他地區的地面和空

¹⁵³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187.

¹⁵⁴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337-347.

¹⁵⁵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Thomp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Manus Midlarsky (ed.), pp. 23-54.

¹⁵⁶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213-219.

中力量均勢。¹⁵⁷

五、滿意度與戰爭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衝突與戰爭除了因為權力增長所造成的之外，還有「不滿意」是另一個主因。根據他們對於區域戰爭與衝突的研究，發現當「均勢」與「不滿意」兩個因素同時存在時，戰爭或衝突產生的機會大於僅有單一因素時的好幾倍。如表 2-3 所示，當權力均勢和不滿意同時存在時，戰爭可能性提高 5 至 10 倍。在區域層級中，相對較低的戰爭發生率（7.8%-19.4%）仍然顯示權力均勢和不滿意是危險的。在強權國家的例子，發現權力均勢與不滿意使兩個國家發生戰爭的機率是這兩個因素都不存在的 6 倍。

表 2-9：區域戰爭的機率

	強權	非洲	遠東	中東	南美洲
未達均勢、滿意	7.9	0.8	2.2	1.4	1.2
均勢、滿意	14.8	1.5	4.2	2.7	2.3
未達均勢、不滿意	32.0	4.0	10.7	7.1	6.1
均勢、不滿意	48.6	7.8	19.4	13.3	11.6

資料來源：Ronald Tamman and Jacek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72.

有關於「均勢」與「滿意度」兩個因素同時對戰爭產生影響的研究，在其他三個理論的論述中並不明確，甚至沒有，因而突顯出權力轉移理論的特質與學術價值。

¹⁵⁷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132.

第三章 超級強權全面管理：美國的戰略布局

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出現了權力真空，經濟上又成為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區域，於是美國開始將全球戰略重心多元化，實施歐亞並重。而且，原有亞太戰略一圍堵蘇聯勢力也開始調整。就美國而言，其冷戰後的亞太戰略目標非常明確，即是確保市場與原料的供應、阻止霸權的出現、以及維持和平與穩定。¹⁵⁸經過多年的經營，美國亞太新戰略已成為一個包含政治、經濟、軍事、人權、民主與自由為一體的全方位戰略，其具體作為有三。其一、以軍事安全為立足點，這部份為建立前沿部隊以及以美國為主導的雙、多邊安全體系。美國在亞太地區分別與日本、南韓、澳洲、菲律賓及泰國有著雙邊軍事同盟關係，這些條約都是冷戰時期的產物，用以圍堵蘇聯與中國等共產國家向外擴張。冷戰結束後，美國仍願意維持與這些國家的雙邊關係，因為這些條約提供美國以軍事介入亞太事務的基礎，強化美國在此地區的軍事影響力。¹⁵⁹儘管如此，美國仍強調維持這些條約「不是針對任何特定國家，而是符合所有亞太國家的利益，因為他們能從地區的安定與安全中獲利。」¹⁶⁰

其二、經濟利益為優先。美國前副國務卿塔波特(Strobe Talbott)曾指出：「大國之間的軍事對抗容易發生於一個或更多大國放棄其對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和開放社會的承諾，並退回威權政治與統治經濟之時。」美國很清楚，蘇聯瓦解而自己卻能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強權的主要原因之一，乃實施資本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經濟實力。如果美國要維持與增強經濟實力，就必須要擴大自由市場經濟。由於亞太地區擁有廣大市場，有利於美國的出口與就業，增強經濟實力。鑒於此，美國一方面透過雙邊談判，迫使亞太各國開放其國內市場。倘若各國不能配合或違反雙方所達成的協議及國際貿易規範，則訴諸美國法律採取單方面制裁措施，如「301條款」或「超級301條款」加以施壓。另一方面，透過多邊協商機制，如亞太經合會(APEC)與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¹⁵⁸ James Steinberg, "Preventive Force in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urvival*, Vol.47, No.4 (Winter 2005), p. 55-72; Todd Schmidt,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raming an Authentic Preemptive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Military Review*, Vol.86, No.5 (Sep/Oct, 2006), p. 75-83.

¹⁵⁹ Dong Sun Lee, "Democratization and US-South Korea Alliance," *Journal of East Asia Studies*, Vol.7, No.3 (Sep/Dec 2007), pp. 469-499.

¹⁶⁰ William S. Cohen,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97), p.19.

WTO) 的談判，加速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與經濟合作。¹⁶¹

其三、民主人權作為與外交之手段。民主與人權已成為世界基本價值，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雷克 (W. Anthony Lake) 曾指出：「民主國家彼此傾向不打仗或支持恐怖主義。它們在外交上比較可以信賴，並在尊重其國民的人權上表現較佳。」¹⁶²美國前國務卿克里斯多福 (Warren Christopher) 也表示：「通過追求民主，我們不僅在實踐我們的最高價值，而且在對我們國家安全進行戰略投資。」因為，「歷史顯示更多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是一個更安全的世界。」¹⁶³鑒此，冷戰後，美國鼓勵亞太地區非民主國家對外開放，接受外國資訊與觀念。同時，與這些國家進行政治與人權對話，促其改善國內人權狀況。

164

在美國亞太戰略中，有許多的跡象顯示，美國最擔心中國崛起後挑戰其霸權地位。1997 年美國國防部第一次公佈「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Report of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認為在 2015 年以後，可能會有一個能與美國匹敵的區域性強權或全球性同級對手出現，而中國與俄羅斯被視為最具有成為此對手的潛力。¹⁶⁵2001 年，美國經歷「911」事件之後，國防部第二次公布「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摒除了俄羅斯而直接「暗指」中國是一個「擁有極豐富資源的軍事競爭國」(a military competitor with a formidable resource base)。¹⁶⁶2006 年，美國第三次公佈「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中再次提到，中國是主要崛起的大國，國防支出的增加與軍事現代化的結果，將使得中國具有「強大的潛力」(the greatest potential) 與美國在軍事實力上競

¹⁶¹ 李瓊莉，「當前美國亞太政策中的經濟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4 期 (1997 年)，頁 15-28；鄧中堅，「美國貿易政策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發展」，*理論與政策* (1994 年)，頁 38-46；林郁方，「美國提升亞太經合會議地位之動機」，*美國月刊*，第 8 卷第 7 期 (1993 年)，頁 12-22。

¹⁶² Anthony Lake,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Assistance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Address at th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September 21, 199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4, No.39 (September 27, 1993), p.659.

¹⁶³ Warren Christopher,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4.

¹⁶⁴ David P. Forsythe and David Beetham,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Two Level, Two Worlds," *Political Studies*, Vol.43, No.1 (1995), pp.111-130; Julie Mertus, "Raising Expectations: Civil Society's Influence on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3, No.1 (March 2004), pp.21-40.

¹⁶⁵ "Report of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 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14 日。

¹⁶⁶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2001.pdf>, 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14 日。

爭。¹⁶⁷2010年8月16日，美國第4次公布「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增加了對中共軍力發展的正面評價，該「報告書」稱，中共逐漸增加各種「非戰爭」軍事任務在解放軍軍事行動、武器添購與訓練中的角色與比例，其中許多都與國際安全合作有關，而且亦不涉及敏感的軍力平衡議題，例如2009年中共派遣海軍支隊前往東非亞丁灣（Gulf of Aden）參與聯合國國際聯合護航、打擊海盜任務和反恐能力。中共軍隊也應對中國境內越來越頻繁發生的大型天災救援能力，以及其他國際維和任務與人道協助等。「報告書」也稱讚中共在軍事透明程度方面有適度的改善，儘管仍離西方國家的標準很遠。美國對於中共軍方在這些方面的能力改善抱持歡迎的態度，因為這些行為都有助於使中共朝向美國所希望的「負責任大國」的方向發展。¹⁶⁸

美國對中國所採取全面性的戰略布局，主要可分為軍事、經濟與外交等三個層面。在這三個層面上，美國都兼具軟、硬措施，採取前者是希望中國能慢慢融入既有國際秩序；採取後者是讓中國清楚地了解，美國已做好萬全準備。

第一節 軍事層面

冷戰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布局，在軍事方面有幾個明顯的作為。首先，美國全球軍事戰略重心從歐洲調整到亞太地區。其次，強化與日本軍事同盟的關係。第三，積極與中國進行軍事對話及交流。

壹、軍事戰略重心的轉移

二次大戰後，當蘇聯躍居潛在霸權國地位至1990年蘇聯崩潰的這一段時間，美國的軍事戰略重心總是以歐洲為主、亞洲等其他地區為輔。但是，當蘇聯瓦解後，這種「重歐輕亞」的戰略設計有所改變，最大的原因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歐洲不存在威脅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衝突，美國面臨的主要潛在威脅在亞太。其中，中國的崛起將會產生一

¹⁶⁷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www.defenselink.mil/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檢視日期：2011年3月15日。

¹⁶⁸ 丁樹範、王俊評，「美國『2010年中共軍力報告書』內容分析與其戰略意涵」，*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9期，2010年9月。

系列的挑戰。¹⁶⁹

美國面對中國的崛起，在太平洋區域的軍事戰略做了某種程度的調整與增強，主要包括維持一定數量的駐軍，以及軍事演習規模的擴大。

一、在亞太地區維持一定數量的駐軍

駐軍對於霸權國而言是一種維持區域穩定的方式。¹⁷⁰美國與蘇聯對抗的時期，為了避免蘇聯勢力向外擴張，在世界各地駐紮著大量的軍隊。在亞太地區，美國主要駐軍地點為日本與南韓。日本的美軍兵力達 47,000 人之多，分別部署在本州島、九州島以及琉球的大小基地，其中橫須賀（Yokosuka）海軍基地以及琉球的嘉手納（Kadena）空軍基地是最主要的。橫須賀海軍基地有航空母艦駐守，嘉手納空軍基地的第 18 聯隊則是美軍在其本土之外最大一個空軍基地。南韓的美軍兵力達 36,000 人，包括第 8 集團軍和第 7 航空隊。

蘇聯瓦解後，美國對於在亞太的駐軍做了若干的調整，但仍保持著一定數量的存在。基本上可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 1990-1994。美國政府曾經做出裁減駐亞太美軍決定。另一方面，亞洲國家也要求關閉美軍基地、撤出美國的軍事力量。美軍在亞太的駐軍人數減至 100,000 人，且關閉如菲律賓蘇比克海軍基地以及克拉克空軍基地。¹⁷¹

第二階段從 1995-1997 年。克林頓政府終止裁減駐亞太美軍，決定將該地區駐軍維持與歐洲同等的水平，即兩個地區都保持 10 萬駐軍。到 1990 年代末，美國在亞太的駐軍還是集中在日本與南韓。這一階段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關鍵是確保美國在亞太軍事存在的戰略核心地位。美國國防部在 1995 年公佈的《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中特別指出，長期保持美國在亞太軍事存在的目的和重要性，即依靠前沿部署美國軍事力量，增強美國對該地區事務的影響

¹⁶⁹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Policy) 1999 Summer Study Final Report: Asia 2025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9) .

¹⁷⁰ Mark S. Sheetz, "Exit Strategies: American Grand Designs for Postwar European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8, No.4 (Summer, 1999) , pp. 1-43.

¹⁷¹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A Report to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2).

力，保證對危機做出迅速和靈活的反應，阻止出現地區霸權主義。¹⁷²

第三階段從 1998 年開始。這段期間，美國相繼公佈一系列有關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文件，包括克林頓時期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New Century*)、《美國軍事戰略》(*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25 的亞洲》(*Asia 2025*)、《1998 年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 1998*)。小布希時期的《2001 年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美國國家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這些報告共同的重要內容之一，並不是爭論裁減在亞太的駐軍數量的多寡，而是明確的強調在 21 世紀前 15 年的「戰略機遇期」，美國軍事戰略的重心應向亞太地區傾斜(也被稱為「戰略東移」)，維持一定數量的駐軍則是關鍵環節所在。

二、軍事演習規模的擴大

軍事演習是一種訓練的驗收，也是針對戰時的狀況而模擬演練。美軍在亞太地區軍事演習並不因為蘇聯的瓦解而有減少的趨勢，相反的，演習數量與規模都有增強。一般的認知，除了因應未來亞太地區任何局勢的變化外，最主要的仍針對中國崛起。¹⁷³

美國所進行的軍事演習，主要包括以下幾項：1)美國與澳洲每兩年舉行一次的 *Talisman Sabre* 演習。2)美國與泰國的 *Cobra Gold* 演習。3)美國與菲律賓的 *Balikatan* 演習。4)美國與日本的 *Keen Sword* 演習。5)美國與南韓的 *Team Spirit* 演習。6)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多國 *Rim of the Pacific* 演習，在 2000 年，參與的國家有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南韓、智利與英國。上述六種演習是美國與亞太國家所舉行的例行性軍演，當然還有其他非例行性軍演，如 2004 年 6 月至 8 月以西太平洋為中心所舉行的「夏季脈動」(*Summer Pulse*)。

2004 年 6 月 2 日，美國國防部向外宣稱，將在未來兩個月內舉行一場海軍的聯合軍演。該演習同時動用七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向世界展示「美國、盟國和盟軍具備向全球

¹⁷²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 1995*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5).

¹⁷³ 「妄圖稱霸亞太地區，建構圍堵中國鎖鏈，美軍在中國周邊搞演習」，*環球時報*（北京），2001 年 6 月 1 日，版 1。

五大戰區同時投放可靠戰力的能力，遂行作戰，最終取得勝利的能力。」¹⁷⁴演習地點將以西太平洋為中心，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等全球水域，其中最引人注目是7月中下旬，七個航母戰鬥群集聚在西太平洋水域。在此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大規模的航母聚會，是波灣戰爭後的1992年5月，因為海上任務驟減，有六艘輪休的航母停靠在美國諾福克海軍基地（Norfolk），當時曾被新聞界稱為「航母派對」。但這次大派對的數量是七艘，而不是六艘，不是輪休，而是軍事演習。

雖然這一次的演習，官方的說法是檢驗2003年公佈《21世紀海軍戰略》（*Navy Sea Power 21 Strategy*）的實施能力。但是許多學者都認為美國是針對中國崛起而來。例如柏克萊大學前任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詹森（Chalmers Johnson）以「美國軍力嘲笑中國」（U. S. Military to Taunt China）為題在「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撰文，認為美國這次行動是前所未有，明顯是針對中國而來。¹⁷⁵軍控與防擴散中心（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研究員赫爾曼（Chris Hellman）也認為，「在太平洋地區舉行任何的演習而無『認知』中國的存在都是一種天真的說法」。¹⁷⁶此外，美國智庫布魯金斯（Brookings Institution）有位研究員指出，「雖然外交官會否認，但是軍事戰略家的確在擔心長遠角度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崛起。對「夏季脈動」行動感到警惕的中國人有一部分擔心是對的，當美國人想到亞太地區時，誰都自然地會想到中國。這是因為中國是下一個十年中這一地區唯一可能真正挑戰美國的國家。」¹⁷⁷

貳、強化與日本的軍事聯盟

美日軍事聯盟建立在《美日安保條約》（*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之上。《美日安保條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為了對抗蘇聯的產物，從1951年安保條約簽訂以來，經歷包括1960年、1978年以及1996-1997年三次主要條約修正與調整，之後又針對其內容部份做若干小修訂，目的在於使條約能夠

¹⁷⁴ “Summer Pulse,”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summer-pulse.htm>，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3月2日。

¹⁷⁵ “U. S. Military to Taunt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5, 2004.

¹⁷⁶ “U. S. Summer Pulse 2004 and China’s Rise as a Sea Power,” *Washington Observer*, No.89 (July 7, 2004).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en/070704CN89-summer.cfm>，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3月6日。

¹⁷⁷ *Ibid.*

適時地反應兩國利益所需。

蘇聯瓦解，基於對抗蘇聯而建立的《美日安保條約》理應廢棄不用，但是，很明顯，美日兩國並無如此，且進一步的修正。有許多理說明《美日安保條約》存在的必要性，最主要的還是為了對抗另一個崛起的強國－中國。¹⁷⁸1996年到1997年之間，美日雙方的國防官員與外交官密切協商溝通，先在1996年4月柯林頓訪問日本時，雙方公佈《美日安保共同宣言》（*U. S. – 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21st Century*），¹⁷⁹然後新修正的《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The Guidelines for U. S. –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of 1997*）在1997年9月出爐。¹⁸⁰

1996年發表的《美日安保共同宣言》九點宣言中，首先肯定美日安保在冷戰時期對亞太地區安全保障的貢獻，並分幾個部份說明，包括對區域的檢視，雙邊的合作，區域性的合作以及全球性的合作。宣言明確指出將會重新檢討1978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隔年，即1997年9月，美日公佈修訂後的《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並且開宗明義指出主要目的包括三個部份：1)美日平常時候的合作（*normal circumstances*）；2)日本遭受軍事攻擊而「有事」時的合作（*an armed attack against Japan*）；3)「日本周邊事態」的因應（*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其中，「周邊事態」是最受關注。有關「周邊事態」內容的重點為，「日本周邊事態」是一種事態概念，而非地理範圍；當日本周邊預期有事的共同作為；針對任一政府活動的合作；日本支援美國部隊活動等部份。

針對「周邊事態」，日本進一步在1999年5月通過《和平安全保障之日本周邊事態法》（簡稱周邊事態法）（*Law Concerning Measures to Ensure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Japan in 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對於「周邊事態」列舉六種情況，包括了第一、日本周邊武力紛爭迫在眉梢；第二、日本周邊發生武力紛爭；第三、日本周邊地區武力紛爭終告停止，但是秩序尚未能恢復、維持；第四、某國發生內亂、內戰，而可能擴大為國際問題；第五、某國因政治體制紊亂等而出現大量難民，且可能流入日本；

¹⁷⁸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pp. 49-78.

¹⁷⁹ *U. S.-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21st Century*, April 17, 1996.

¹⁸⁰ *The Guidelines for U. D. –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Joint Statement U. S. – 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eptember 23, 1997.

第六、某國的行動經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為破壞和平的侵略者，而為經濟制裁的對象。¹⁸¹但是，對於「周邊事態」的適用範圍，是不是一種地理名詞，仍保持模糊的解釋。儘管如此，《周邊事態法》已使得日本自衛隊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為根據該法，例如第 11 條規定，自衛隊在執行任務時，為了保護自己與一起執行任務的人，可以使用武力。說明了日本自衛隊已由「防禦型」轉變成「攻擊型」。在《周邊事態法》通過後，日本在 2001 年 5 月於新成立的防衛廳辦公室設立「美日軍聯合司令部」，意在對付日本發生戰事和周邊事態。之後，美日又建立安全和防衛問題的「協調機制」，稱為「美日安全諮詢會議」(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該機制由美日外交與國防方面的部長組成，其目的就是美日擴大軍事合作，應付「周邊事態」等進行協商。¹⁸²

「美日安全諮詢會議」又稱「2+2」會議，自 2002 年開始每年定期會晤商討安全事宜，並且對外發表聲明。「2+2」會議在 2005 年所發表的聲明最受關注，其主要原因是，雙方針對亞太區域提出 12 項共同戰略目標 (common strategic objectives)，而「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明列為美、日共同戰略目標之一。¹⁸³在 2005 年「2+2」會議的會後，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高島肇久 (Takashima Hatsuhisa) 召開記者會，並回答記者們詢問有關美日安保條約是否涵蓋台灣地區的問題。有別於過去日本官方對外的模糊態度，高島肇久清楚地表示，美日安保條約含蓋的範圍不只是日本，還包括朝鮮半島、台灣與北太平洋。¹⁸⁴

2006 年 5 月，美、日軍方公佈《實現美日同盟重新編整路線圖》(US-Japan Roadmap for Realignment Implementation)，確定駐日美軍調整的具體計劃，包括調整美軍在琉球與橫田空軍基地的駐軍、重新部署美軍航母空軍聯隊、以及重新配置美軍訓練設施，提升美軍在亞太地區的機動性與打擊力。¹⁸⁵在 2007 年的「2+2」會議聲明中，其共同戰略

¹⁸¹ 陳世昌，「日內閣通過實施周邊事態法案」，聯合報，1999 年 8 月 14 日，版 11。

¹⁸² 「日本再為軍事發展鬆綁」，解放軍報網，

http://www.pladaily.com.cn/pladaily/shichuang/2001108/gb/2001108001252_dongtai.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5 日。

¹⁸³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 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ebruary 19, 2005.

¹⁸⁴ “Questions Concerning Statement Following the Japan-U.S.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eeting Regarding Taiwa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ebruary 22, 2005, <http://www.mofa.go.jp/announce/press/2005/2/0222.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5 日。

¹⁸⁵ “US-Japan Roadmap for Realignment Implementation,” May 1, 2006.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cc/doc0605.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5 日。

目標雖無提及台灣問題，但要求中國改善軍事透明度，並維持它在政策聲明與實際行動之間的一致性。此外，也針對《實現美日同盟重新編整路線圖》給予肯定，認為這些計畫內容將會提高雙方對安保同盟的支持。¹⁸⁶

2007年「2+2」會議在共同戰略目標中無提及台灣問題，並不代表美日聯盟對台灣問題的不重視。該聯合聲明在列舉11項「共同戰略目標」之前，就開宗明義肯定2005年2月所確認的共同戰略目標，雙方也再度確認這些共同戰略目標的承諾。¹⁸⁷也就是說，儘管沒有明文提及台海問題，但這次的戰略目標乃是以2005年的基礎成立的，所以台海議題當然還是美日同盟的共同戰略目標之一。況且，2005年「2+2」的共同戰略目標，第一條就是「保障日本的安全」，2007年所列的共同戰略目標並無此項，難道美日同盟就不再保障日本的安全嗎？持平而論，美日2007年的11項共同戰略目標，是屬新增加的部分。

參、與中國的軍事對話及交流

有別於美國軍事戰略重心從歐洲轉至亞太、美日同盟的強化等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措施，美國對中國也採取軍事對話與交流的柔軟措施，其目的是希望能夠達到：

第一、將中共整合進入美國所領導的全球不擴散機制，使中國不危害既有的全球政經秩序及安全，減少美國維持此一秩序的成本。

第二、緩和美中雙方的對峙關係，促成雙方整體關係的良好，減輕美國軍事負擔，以全力發展經濟、恢復美國的國力。

第三、改變中國軍方的想法，減少對美國與外界的敵意、遏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協助美國穩定亞太地區的緊張情勢。

第四、增進雙方對彼此軍事的了解，減少觀念的歧異。

第五、展現美方的軍事實力，讓中國有所顧忌，以達嚇阻的目的。¹⁸⁸

美國對中國進行軍事對話與交流並不是在1990年代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出現才

¹⁸⁶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lliance Transformation: Advancing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May 1 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cc/joint0705.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3月5日。

¹⁸⁷ *Ibid.*P113.

¹⁸⁸ 王高成，*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戰略*（台北：五南出版社，2005年），頁227-228。

開始，實際上從 1970 年代初期，美國已逐步與中國進行軍事對話與交流。¹⁸⁹ 1990 年以後，美中雙方的軍事對話比之前更密切，所涵蓋的議題範圍更廣。1993 年 11 月，美國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訪問北京，與中國達成在軍事上合作的四個項目，包括高層官員間的戰略對話、將中國軍方的武器工廠轉為生產民生用品的合作、雙方同等級部門間訪問（working-level visits between functional units）、鼓勵中國軍方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專業技能的合作。五角大廈的目的之一，是試圖了解中國解放軍的戰略目標，包括其核武政策的發展，進一步來達成當中美發生衝突危機時，能夠有預防措施。¹⁹⁰

1994 年 10 月，美國國防部長斐瑞（William Perry）訪問北京，與中國達成軍轉民用和改進中國軍事控制的空中管制系統（China's military-controlled air traffic control system）的合作協定。並且向北京提供以電腦模擬的方式，達到實際上軍事核爆的技術。¹⁹¹ 1995 年以及 1996 年的台海危機，導致雙方軍事對話暫時中止。但不久美國又重新開始美中戰略對話。1996 年年底，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問華盛頓，雙方就廣泛的軍事合作日程達成協議。1997 年，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訪問北京，並與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長會面。1997 年 10 月美中的領導人互訪期間，達成高級官員交流的制度化，創立《美中防務協商會談》（US-China Defense Consultative Talks），希望通過每年會晤進行戰略對話來提高相互在軍事方面的透明度。

1997 年 12 月，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訪問華盛頓，參加第一次《美中防務協商會談》開幕會議。1998 年 1 月，美國國防部長柯恩（William S. Cohen）訪問北京，並與中國簽署《海洋軍事安全協定》（Military Maritime Safety Agreement）。強調未來美國與中國在軍事方面的合作將經歷三部曲：1) 加強現有的合作（deepening our current joint efforts）；2) 適度擴展新的領域（modestly broadening them into new areas）；3) 從建立信任走向實質性的國際合作（advancing from confidence-building to real world cooperation）。¹⁹²

¹⁸⁹ Jeffrey T. Richels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History to Engagement, 1960-1998,"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nsarchive.chadwyck.com/ch_essay.htm, 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10 日。

¹⁹⁰ Robert S. Ross, "Engagement in US China Polic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ement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p. 198.

¹⁹¹ *Ibid.*, pp. 198-199.

¹⁹² William S. Cohen, "Address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July 13, 2000.

2000年7月，美國國防部長柯恩繼1998年後第二度訪問中國。此行的目的除了與中國就美國建立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進行討論外，還包括了中國援助巴基斯坦飛彈計畫、核武擴散與台海問題與中國高層進行交換意見。在這次訪問過程中，柯恩與遲浩田簽署一項有關軍事環境維護的信息交流協議，稱之為《環保研發信息交流協議》（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Exchange Agreement）¹⁹³2003年10月，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訪問美國，這是2001年4月美中撞機事件以來，中國國防部長首次訪問美國。¹⁹⁴雖然雙方無簽署任何重要的軍事協議，但說明美中之間再次開啟軍事高層級的對話管道。小布希時期被視為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強硬派代表之一的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自從2001年擔任國防部長以來一直到2005年10月才正式訪問中國，這位被稱為「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在訪問北京時表示，中國隱瞞增加軍備的真實數字，引起全球懷疑中國的軍備企圖。¹⁹⁵雖然倫斯斐對中國的不友善在此次訪問中表露無疑，不過對於美中軍事的對話與交流也是具有正面的意義。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彭光謙表示，倫斯斐訪問中國是「增信釋疑之行」，因為有疑慮和問題才需要交流，以求得理解和信任，這對中美兩國軍事互信是必需的。¹⁹⁶

在中美軍事對話與交流中，雙方建立軍事熱線是另一項重大成果。2003年雙方就建立軍事熱線進行協商，歷經五年後於2008年2月雙方國防部簽署了軍事熱線的協議。對中國而言，這是首次與外國在國防部層面設立的熱線。¹⁹⁷2008年4月，美國國部長蓋茲（Robert Gates）與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進行美中第一次軍事熱線的通話，梁光烈利用這個機會要求美方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停止對台軍售與美台軍事合作。蓋茲則重申了美國政府在台灣議題上的原則與立場，表示美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¹⁹⁸雖然建立熱線不一定代表著雙方軍事將朝向合作的方向前進，但在某種程度上，可提升彼此間軍事互

<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press/release/2000/cohenndu.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3月10日。

¹⁹³ “Cohen’s China Visit Highlights Mutual Interests,” *American Forces Information Service*, http://www.dod.gov/news/Jul2000/n07122000_20007122.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3月15日。

¹⁹⁴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Leaves for US Visit,” *People’s Daily*, October 25, 2003.

¹⁹⁵ 「軍費不透明，倫斯斐質疑，曹剛川反駁」，*聯合報*，2005年10月20日，版13。

¹⁹⁶ 「北京學者：倫斯斐訪問中國將增信釋疑」，*中央社*（北京），2005年10月20日。

¹⁹⁷ “China, US Agree to Set up Military Hotline,” http://www.china.org.cn/china/military/2008-02/29/content_11175537.htm，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3月15日。

¹⁹⁸ 「首次軍事熱線，中促美停止對台軍售」，*自由時報*，2008年4月12日。

信。例如，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建立軍事熱線，明顯地不是在軍事合作，而是在加強雙方的溝通，避免發生誤判的情況。

表 3-1：1997-2009 美中防務協商會談

美中防務協商會	時 間	地 點	與 會 代 表
第 1 次	1997 年 12 月	華 盛 頓	中國副總參謀長熊光楷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 Walter B. Slocombe
第 2 次	1998 年 10 月	北 京	熊光楷、Walter B. Slocombe
第 3 次	2000 年 1 月	華 盛 頓	熊光楷、Walter B. Slocombe
第 4 次	2000 年 11 月	北 京	熊光楷、Walter B. Slocombe
第 5 次	2002 年 12 月	華 盛 頓	熊光楷、Douglas Feith
第 6 次	2004 年 2 月	北 京	熊光楷、Douglas Feith
第 7 次	2005 年 4 月	華 盛 頓	熊光楷、Douglas Feith
第 8 次	2006 年 6 月	北 京	總參謀長助理章沁生少將、美國國防部長助理 Peter Rodman
第 9 次	2007 年 12 月	華 盛 頓	副參謀總長馬曉天、美國國防部長助理 Eric Edelman
第 10 次	2009 年 6 月	北 京	副總參謀長馬曉天、美國國防部副部長 Michele Flournoy

資料來源：“China and US hold military talks,” <http://news.bbc.co.uk/2/hi/8114210.stm>.; “US and China to Hold Defense Consultative Talks ,” <http://www.defenselink.mil/advisories/advisory.aspx?advisoryid=566>; “U.S.-China Consultative Talks Under Way in Pentagon,”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news/2007/12/mil-071203-afps06.htm>. ; “China, U.S. to hold 10th defense consultations,” http://big51.chinataiwan.org/sy/yw/200906/t20090623_926823.htm。

第二節 經濟層面

開放市場與自由貿易是當前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也是美國維持霸權地位的經濟手段之一。冷戰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戰略布局採取兩種方式同時進行，一方面以雙邊對話方式，要求中國市場更開放、貿易更自由化；另一方面以多邊方式，也就是透過國際組織，希望對中國進行約束。

壹、與中國的經濟對話及實踐

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對話及實踐包括了貿易不平衡、紡織品的輸出配額、農產品問題、電信金融服務業，以及智慧財產權等。美國的立場，是希望與中國的經濟對話來獲取經濟利益，或者至少扳回過去「美中」經貿失衡的局勢。

一、化解美中不平衡貿易

化解美中之間貿易不平衡是美國首先要做的。若從美國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美中之間的貿易失衡相當嚴重。(表 3-2) 這是因為中國對許多進口產品增加關稅，對進口的執照採取緊縮控制，然而對出口的產品的基本原料則增加分配，並增加對出口部門的信用貸款，以製造有利於己的貿易順差。¹⁹⁹美國為解決這一現象，同對日本的貿易赤字作出的反應一樣，要求中國開放其國內市場。美國商務部長戴利 (William Daley) 就不斷引用美中的貿易赤字做為中國市場不夠開放的證明。²⁰⁰1992 年，華盛頓威脅，若北京不同意對其貿易體制做出實質性的改革，美國要征收懲罰性的關稅，北京在最後一刻同意做出廣泛的變革，中美簽訂《市場准入備忘錄》(Market Acces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²⁰¹兩年後，即 1994 年，美國貿易代表曾表示，中國在商業法規的透明和解除非關稅貿易障礙方面確實遵從 1992 年的協議。1995 年，美國政府審計局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 GAO) 報告，中國已經「採取步驟遵從這一協定的大多數條款，但是其他行動還相當緩慢。」²⁰²1997 年 10 月 24 日，在江澤民訪問美國之後，柯林頓在「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應該更積極開放外國商品與勞務進入中國市場。²⁰³1999 年 3 月美國貿易代表與中國總理朱鎔基和外經貿部長石廣生會談，美國代表還是強調要求中國儘速降低貿易與投資的障礙，進一步開放市場。²⁰⁴

¹⁹⁹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 (1989-1997)*，(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 年)，頁 166。

²⁰⁰ Nicholas R. Lardy, "China's WTO Membership," *Policy Brief # 47* (April 1999), p. 2.
<http://www.brookings.org/comm/policybreifs/pb047/pb047.htm>，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16 日。

²⁰¹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ing Market Access*, October 10, 1992.
<http://www.tcc.mac.doc.gov/cgi-bin/doi.cgi?204:64:264821346:193>，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16 日。

²⁰²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 "U.S.-China Trade: Implementation of Agreements on Market Acces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tter report, January 25, 1995).
<http://www.gao.gov/archive/1995/gg95061.pdf>，上網檢視日期：2010 年 12 月 5 日。

²⁰³ "Visit by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Long on Symbolism, Short on Result,"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ctober 24, 1997, *Foreign Policy Bulletin*, Vol.9, No.1 (January/February, 1998), p. 38.

²⁰⁴ 「白茜芙晤朱鎔基，入會無共識」，*中央日報*，1999 年 3 月 5 日。

要求中國的市場開放在中國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後達到關鍵性的時刻，因為根據國際貿易組織的規定，中國對於國內市場的開放勢在必行。但是我們從 2002 年之後雙方貿易順逆差的數字來看，美中之間的經濟失衡狀態並無明顯的改善。如果中美之間的經貿赤字是美國要求中國開放市場的手段，那美國是成功的。如果縮短經貿赤字是目的，那短期內要達成或許對美國來說是一種苛求，因為美國也是經歷漫長的時間才縮短美日之間的經貿失衡。就長期而言，美國是可以期待扳回經貿失衡的劣勢。

表 3-2：1990-2009 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順差

(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 項目	出口	進口	順差
1990	4,806.4	15,237.4	-10,431.0
1991	6,278.2	18,969.2	-12,691.0
1992	7,418.5	25,727.5	-18,309.0
1993	8,762.9	31,539.9	-22,777.0
1994	9,281.7	38,786.8	-29,505.1
1995	11,753.7	45,543.2	-33,789.5
1996	11,992.6	51,512.8	-39,520.2
1997	12,862.2	62,557.7	-49,695.5
1998	14,241.2	71,168.6	-56,927.4
1999	13,111.1	81,788.2	-68,677.1
2000	16,185.2	100,018.2	-83,833.0
2001	19,182.3	102,278.4	-83,096.1
2002	22,127.7	125,192.6	-103,064.9
2003	28,367.9	152,436.1	-124,068.2
2004	34,427.8	196,682.0	-162,254.3
2005	41,192.0	243,470.1	-202,278.1
2006	53,673.0	287,774.4	-234,101.3
2007	62,936.9	321,442.9	-258,506.0
2008	69,732.8	337,772.6	-268,039.8
2009	61,213.1	269,901.1	-208,688.0

資料來源：U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in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2006>，上網檢視日期：2010 年 2 月 1 日。

二、保護智慧財產權

美國政府與民間企業認為，外國政府未能有效保護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任由仿冒品在國外市場氾濫及大量輸出，是造成經貿赤字的一個

主因。²⁰⁵中國是被美國認定侵犯智慧財產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美國與中國的智慧財產權之爭始於 1991 年，當年美國以中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力，將中國列為「特別 301」(Special 301)條款的優先觀察名單。²⁰⁶1992 年 1 月，中美之間簽署有關「智慧產權的備忘錄」(U.S.-Chin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要求「兩國提供於其國內及邊境有違知識產權的預防措施及解決辦法，即阻止更多的侵犯知識產權活動出現」。²⁰⁷1995 年 2 月，中美雙方簽訂《保護智慧財產權協定》(IPR Enforcement Agreement)，主要重點在於加強仿冒品刑事罪起訴與撤銷營業執照的處罰，並且希望中國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法令及執法方面更確實。²⁰⁸在美國的要求與壓力下，中國採取的一些措施：

1)修改相關的法令。雖然中國早在 1982 年 8 月通過《商標法》，1984 年 3 月通過《專利法》，1990 年 9 月通過《著作權法》，但是這些法律條文並不周延，並且無法符合西方國家對智慧財產權的嚴格要求，因此在美國壓力下做了條文的補強，包括 2000 年 8 月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新修改的《專利法》與實施細則於 2001 年 7 月 1 日實施；²⁰⁹2001 年 10 月通過對《商標法》以及《著作權法》的修正。

210

2)關閉仿冒工廠以及對增加違反智慧財權者的刑期。例如 1996 年，中國關閉 15 家仿冒工廠。²¹¹1997 年，中國法院對於違反智慧財產權者判以重刑。²¹²

如果根據「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網站所公佈的訊息來看，與過去相比，中國在

²⁰⁵ 王高成，「柯林頓的中共經貿政策」，*美歐月刊*，第 11 卷第 2 期（1996 年 2 月），頁 9。

²⁰⁶ “Bush to Cite 3 N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91.

²⁰⁷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January 17, 1992. <http://www.tcc.mac.doc.gov/cgi-bin/doi.cgi?204:64:264821346:191>，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17 日。

²⁰⁸ Paul Kull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nforcement Agreement Commits China to Strong Measures to Curb Piracy,” *Business America*,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52/is_n1_v117/ai_18023691，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17 日。

²⁰⁹ 2000 年 8 月 25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17 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

²¹⁰ 2001 年 10 月 27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24 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的決定」以及《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

²¹¹ 楊國華，「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的影響及啟示」，*國際經濟合作*，第 7 期（1998 年），頁 62。

²¹² “China Appears to Crack Down on CD Pirati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7, 1997), p. 12.

取締仿冒工廠與加重刑罰方面有所努力。但是，美國認為中國在維護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努力還是不夠。美國貿易代表官員指出，以 2004 年為例，在美國查獲的仿冒品達 1 億 3,400 萬美元，其中 2/3 是中國製造。美國希望中國能確實遵守《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協定》(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IPs) 的規定，能更加落實在維護智慧財產方面所執行的司法公權力。²¹³根據美國貿易代表 (USTR) 辦公室歷年來所公佈的「特別 301」報告，中國總是被列為「優先觀察名單」，也就是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實行上仍十分落後。即便 2008 年報告也是如此。該報告指出，美國出口至中國有著作權產品 85% 到 95% 被盜版，美國在邊境扣押的智慧財產權侵權產品高達 80% 比例源於中國。²¹⁴美國貿易代表官員表示，據智慧財產權擁有者的報告，由於中國政府各部門和各機構之間缺乏協調、地方保護主義和腐敗、對刑事案件進行調查和起訴的門檻過高，培訓不足和有關程序不完備不透明等原因，中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尤其是在地方層級，難以順利開展。整體而言，中國當局有必要更有效地建立並維持對智慧財產權的積極主動、具有嚇阻力的保護。²¹⁵

美國在處理與中國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上，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雖然幾乎每年把中國列為「特別 301」優先觀察名單，但真正給予中國經濟制裁的案例不多。事實上，美國是最會採行經濟制裁的國家。根據統計，在 1914-1990 年間的 116 件經濟制裁中，77 件是由美國發起，而在後冷戰時期所增列的 50 多個經濟制裁案件中，美國也佔了 36 個以上。²¹⁶在冷戰時期，美國長期地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也曾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不過，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美國對中國更小心謹慎的使用經濟制裁，尤其在智慧財產權方面。美國主要考量是更為廣泛的經濟與政治利益，避免因為經濟制裁而導致全面經貿大戰的爆發。²¹⁷

貳、透過國際經濟組織對中國的約束

²¹³ Emma Barraclough, "US Threatens China with WTO Action,"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150 (June, 2005), p. 8

²¹⁴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08 Special 301 Report*, April 25, 2008.

²¹⁵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Weak in China, U.S. Says," <http://usinfo.state.gov/eap/Archive/2006/Jun/08-493108.html>, 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18 日。

²¹⁶ Kimberly A. Elliott, "Economic Sanctions," in Peter J. Schraeder (eds.), *Intervention into the 1990s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2), p. 97.

²¹⁷ 王高成，*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戰略*（台北：五南出版社，2005 年），頁 283-293。

除了與中國雙邊經濟接觸外，美國也藉由國際經濟組織的方式與中國進行多邊接觸，希望中國能融入既有的國際組織架構，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一般而言，國際經濟組織可分為全球性與區域性。全球性的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貿易組織等等。區域性經濟組織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近期當中，美國運用國際經濟組織的方式與中國進行接觸的例子莫屬世界貿易組織，而且中國在加入多種國際經濟組織的過程中，也以關稅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及世界貿易組織歷時最久，長達 15 年。1993 年 12 月烏拉圭回合談判後，各國達成協議，決定將關稅貿易總協定組織化，於 1995 年成立世界貿易組織。共產黨在 1949 年於中國建立政權後，對於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存在排斥心理，認為此為西方工業國家為自己利益所組織的富國俱樂部。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後，為了解決經貿問題，中國改變之前排斥的心態，轉為積極尋求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1986 年 7 月 10 日，中國正式向關稅貿易總協定提出恢復會籍的申請，希望恢復中國在關稅貿易總協定的會籍，並享有創始會員國的特別待遇，而在 1995 年 7 月，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觀察員。2001 年 11 月 10 日，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 143 個會員國。²¹⁸

中國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及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美國是一個關鍵因素，因為取得全球經濟地位主導者美國的同意，對於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及世界貿易組織將更順利。美國對於中國加入國際經濟體制之中抱持審慎與積極的態度，期盼中國能夠受國際經貿環境影響，帶動中國國內經濟改革，改變其計畫性市場的體質，符合自由化的公平原則以及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為了避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經貿造成傷害，美國必須先採取措施，所以在與中國談判的過程中，對中國開放市場、智慧財產權等方面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必須退讓。²¹⁹

當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對於中國是否有產生制約的作用？如果根據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達成的協議來看，將對中國造成某種程度的制約效果，

²¹⁸ Li Tieying, "The WTO and China," *Far Eastern Affairs*, Vol. 30, No.3 (2002), pp. 87-96.

²¹⁹ Hongyi Harry Lai, "Behind China'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S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2, No.2 (April 2001), pp. 237-255.

包括了農業、工業等多方面。(表 3-3)

表 3-3：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條件

項目	主要內容
農業	1. 中國對國內農產品補助不超過其農業總生產值的 8.5%。 2. 農產品的稅率應該降至一個合理範圍，並且開放小麥、稻米、棉花等進口。
工業	1. 2005 年工業產品平均關稅降至 9.4%。 2. 中國承諾入會 3 年內開放民營企業可擁有進出口經營權。
汽車	中國承諾在 2006 年將汽車進口關稅降至 25%。
電信	國內電信服務業於入會後 5 年開放外資經營。
銀行	中國入世 5 年後，允許外資銀行吸收中國居民人民幣存款；外資銀行與中國國有企業進行的人民幣業務將不受地域限制，權利與中國本土銀行相同。
紡織	紡織品配額於 2004 年 12 月取消。2008 年以前，WTO 成員得援引防衛機制抑制中國產品進口以避免市場混亂。
油品	入世後 3 年開放零售油通路，入世 5 年將完全開放油品零售市場。
旅遊	入世後將允許外資持有旅館酒店過半數的股權，並於 4 年內全面開放外資擁有其所有權。

資料來源：「中共加入 WTO 承諾」，中國時報，2001 年 9 月 18 日。「中共加入世貿的代價及其影響」，中國時報，2001 年 7 月 4 日。

實際上，基於短期內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處於磨合階段，具體的成效還是有限。例如，從 2002 年至 2008 年間，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 向國會報告的《中國履行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中不難發現，美國對中國在履行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上還是相當不滿意。²²⁰ 值得注意的是，2007 年 4 月，美國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告中國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力，認為第一，中國著作權法並不保護不符合中國「內容審查」標準的作品；第二，許多商品雖然違反智財權經中國海關查獲，但仍在移除仿冒標籤及特徵後，流入中國市場。第三，中國刑事訴訟與懲處的門檻太高，許多蓄意仿冒和盜版行為都被排除在法律適用範圍之外。同年 9 月，世界貿易組織成立爭端解決小組加以審查，初步判決結果為中國敗訴。²²¹ 這是美國首次透過世界貿易組織來解決美中之間智慧財產權問題，也說明未來相似的模式將屢見不鮮。

²²⁰ 美國貿易代表署依據 2000 年美中關係法第 421 條，每年就中國執行 WTO 入會承諾及美中雙邊承諾，向國會提出報告。

²²¹ 「美中智慧財產權爭端，WTO 判中敗訴」，自由時報，2009 年 1 月 28 日。

就長期而言，透過像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國際經濟組織對中國進行制約是可期待，因為有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前車之鑑。Robert Ross 曾指出，在中國成為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的成員之前，許多分析家說，中國共產黨官僚將會削弱這些機構致力於建立一個很好的國際規範的努力。但是恰恰相反，中國成為多邊機構的成員促進政策制定者和機構之間不言而喻的聯合，加強中國政策制定中改革官僚的力量。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地位能夠創造類似的效果。²²²

雖然國際組織能產生制約作用，但並不表示會員國一定會遵守規定。各成員國不遵守國際經濟組織的規章制度的實例有很多，1971 年美國單方面退出布列敦森林體系導致經濟體系的瓦解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過去經驗，中國也曾經背離過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儘管一般而言都遵守規定。皮爾森（Margaret M. Pearson）曾指出，1980 年中國沒有按照要求通知國際貨幣基金，擅自決定國內匯率，使得該組織官員非常不滿。另外，中國一直試圖繞過國際貨幣基金的借貸條件限制，通常只借貸條件限制較少的部份。至於在世界銀行方面，中國經常就貸款的約束條件與該組織發生爭辯，相較其他國家更激烈。不過這種激烈爭辯的現象到了 1990 年代已有所改善。²²³ 未來，中國果真如美國所願，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的規範，說明美國將會繼續主導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如果事與願違，中國背離國際經濟組織的規範，它將傳遞一種訊息，即中國不滿國際經濟秩序的現狀，將會創造屬於有利於己的國際經濟秩序。

第三節 外交層面

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布局，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推動雙邊領導人的互訪，此乃屬柔性的外交作為。其二，要求中國遵守人權規範，此乃屬強硬的外交作為。

壹、推動雙邊領導人的互訪

²²² Robert S. Ross, "Enter the Dragon," *Foreign Policy*, No.104 (Fall, 1996), pp. 18-25.

²²³ Margaret M. Pearson, "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ement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216-217.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開啟美國推動與中國領導人互訪的大門。美國一位官員曾說過，美中之間存在分歧，透過高層次的對話來交換意見，建立共識，能助於化解彼此間的分歧。²²⁴中美雙方的領導人在不同的場合經常見面，例如G8高峰會、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領袖非正式會議，或者某國總統就職典禮。但是，如果雙方能就國事問題進行訪問，更能凸顯此方面的意義。後冷戰時期，美中之間領導人有著多次的互訪，下文將針對互訪的內容進行說明。

一、柯林頓時期的美中領導人互訪（1993年至2000年）

柯林頓時期美中領導人互訪發生在1997年以及1998年。1997年10月26日，江澤民受邀前往美國訪問，29日與柯林頓會晤並發表《中美聯合聲明》（Joint U.S.-China Statement）：²²⁵

「兩國元首決定，中美兩國通過增進合作，對付國際上的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雙方同意，從長遠的觀點出發，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基礎上處理兩國關係。

聲明中還規定：

- （一）兩國元首定期訪問對方首都。
- （二）內閣和次內閣級別官員定期互訪，就政治、軍事、安全和軍控問題進行磋商。
- （三）在北京與華盛頓之間建立元首熱線，以便利直間聯繫。
- （四）在加強能源和環境領域的合作。
- （五）採取積極和有效的措施擴大中美貿易和經濟關係。
- （六）在和平利用核能領域進行合作。
- （七）在防擴散方面繼續努力。
- （八）本著和平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通過在政府與非政府級別的對話討論人權問題。
- （九）促進兩國間的法律合作。

²²⁴ “Senior U.S. Official Discusses Chinese Vice President Hu’s Visit,” April 30, 2002.

<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press/release/2002/43a-cheneyhu.htm>，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3月18日。

²²⁵ *Joint U.S.-China Statement*, October 29, 1997.

(十) 在打擊國際有組織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製造未必和洗錢等方面加強合作。

(十一) 就建立海上軍事安全協商機制達成協議。

(十二) 擴大兩國教育和文化交流。

在兩國元首聯合記者會之後，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 (Madeleine K. Albright) 曾發表聲明，高度評價兩國元首的會談，認為會談是中美關係的「全面交往」，使兩國關係的許多方面都獲取重大的進展。²²⁶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謝淑麗 (Susan Shirk) 也指出，「使我們高興的是，通過此次會談，為同中國合作推進美國各方面的利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雙方在相當廣泛的領域取得了具體進展，也為兩國關係奠定了一個全面定義和框架，從而為未來合作立下良好基礎。」²²⁷

1998 年 6 月 25 日，柯林頓受邀前往中國訪問，這是對 1997 年 10 月江澤民訪美的回訪，是美國總統自 1989 年以來首次對中國的訪問，也是第一位訪問中國的在任民主黨總統。27 日，雙方領導人會晤並發表三項聯合聲明：《關於「生物武器公約」議定書的聯合聲明》、《關於殺傷人員地雷問題的聯合聲明》以及《關於南亞問題的聯合聲明》。30 日，柯林頓在上海公開聲明由「一個中國」所衍生的對台灣「三不政策」(Three No's Policy) — 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與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這是美國總統首次在公開場合中，表示美國的「三不政策」。在「三不政策」表達完之後，白宮與國務院官員強調，總統僅是重述過去 20 年來美國一慣的中國政策，對台政策也沒有改變。然而對中國而言，「三不政策」是北京長久以來的立場，過去儘管美國官員曾經表示過，但此次由總統親自做出宣示的意義是不同。²²⁸

二、小布希時期的美中領導人互訪 (2001 年至 2008 年)

2001 年 10 月在上海舉行的 APEC 會議上，美國新任總統小布希第一次與江澤民會面。2002 年 2 月 21 日至 22 日，小布希訪問中國。與江澤民會面後隨即召開記者會，表達了這次會面的成果，包括了雙方同意加強高層的戰略對話以及各級別、各部門之間的

²²⁶ “Albright/Burger Briefing on U.S.-China Summit,” October 29, 1997, *Bulletin*, October 30, 1997, pp. 17-23.

²²⁷ Susan Shirk, “The Wrap up of the Jiang Zemin Visit,” *Bulletin* (November 17 1997), pp. 16-22.

²²⁸ Michael Y. M. Kau, “Clinton’s Three No’s Policy: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6 No.2 (Summer/ Fall, 1999), pp. 15-21.

交往，積極展開經貿、能源、科技、環保、愛滋病的防治、執法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同意充實兩國中長期反恐交流與合作機制。當然，雙方仍存在歧見，尤其是對台灣問題。江澤民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希望美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小布希強調，台灣問題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美國繼續支持《台灣關係法》。²²⁹對於此次小布希的訪問，中國新華社引述美國駐中國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 Jr.）的看法，認為「美中兩國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進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another milestone in U.S.-China Relations）。²³⁰路透社（Reuters）報導指出，對於小布希的訪華，中國的媒體高度讚揚。²³¹但是，外國媒體不盡然對此次「布江會」表示正面的態度，英國《金融時報》指出，此次除了實質性的議題沒進展外，布希與江澤民之間的互動不如柯林頓訪問中國那麼熱絡。²³²

2002年10月22日至25日，江澤民訪問美國。期間，與小布希會面並討論國際局勢的發展，包括北韓核武發展計畫、伊拉克和反恐合作、銷毀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後並到墨西哥參加第十屆APEC領袖非正式會議。對於此次的美國行，江澤民自認很成功，在參洛杉磯舉行的宴會上，江澤民讚揚他上週與小布希的會談「非常成功」，呼籲中美兩國更緊密合作。²³³但是，不像前一次受柯林頓之邀前往美國訪問，這次會面並無簽署任何文件，或發表共同聲明。

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原本計畫在2005年9月首次以國家主席名義出訪美國。但是鑒於美國遭受颶風災害，美國將重新安排「布胡會」。儘管無法達成正式的領導人會晤，布希與胡錦濤雙方也在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於紐約進行短暫的會面，各自表達對國際局勢的看法。²³⁴事實上，在此之前，胡錦濤曾於2002年4月27日至5月3日以

²²⁹ “Remarks by President Bush and President Jiang Zemin in Press Available,” The Great Hall of People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21,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2/20020221-7.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0月3日。

²³⁰ 「美駐華大使雷德：布希訪華是中美關係又一里程碑」，新華網，2001年2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2-02/19/content_282185.htm，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0月3日。

²³¹ “Chinese Media Cheer Bush Visit,” *Reuters*, February 23, 2002.

²³² 「布江不來電，實質問題無進展」，*工商時報*，2002年2月22日。

²³³ 「江澤民認為美國之行非常成功」，*南華早報*，2002年10月30日。

²³⁴ “Bush, Hu Continue U.S.-China Dialogue at United Nations,”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September 13, 2005.
<http://usinfo.state.gov/eap/Archive/2005/Sep/14-476098.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1月14日。

國家副主席名義訪問，並且把此次訪問定位為「認知之旅」。訪美的過程中，胡錦濤會見錢尼與小布希，並且針對台海問題表達了中國早已定調的立場，他呼籲美國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三個公報」的承諾。²³⁵對於胡錦濤此次的訪美，可被解讀為在未接班的情況下，胡錦濤的美國行不求「突破」之有功，但求「交待」之無過，讓西方政界與媒體多一個機會，預先了解下一任中國領導人。²³⁶

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小布希在胡錦濤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之後正式訪問中國。這次「布胡會」的主要議題包括了經貿、地區性與全球性問題。在20日雙方領袖的會晤中，胡錦濤提出五點建議：²³⁷

（一）保持兩國高層積極交往。兩國領導人可通過多種方式，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保持密切溝通和磋商。雙方還應加強其他級別的對話和交流，以及兩國議會的友好交往。

（二）共同開創中美經貿合作的新局面。雙方應堅持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不斷拓展合作領域，實現互利共贏。努力在發展中逐步實現兩國貿易平衡。通過對話和協商妥善處理兩國經貿合作中出現的摩擦和問題。

（三）加強兩國在能源領域的互利合作。雙方可就能源戰略加強磋商。鼓勵和支援雙方企業在油氣資源勘探和開發領域開展合作。共同開發清潔能源，妥善應對能源和環境挑戰。

（四）加強兩國在反恐、防擴散、防控禽流感問題上的合作。在雙向互利基礎上深化反恐合作。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礎上，繼續開展在防擴散問題上的建設性對話與合作。兩國有關部門應儘快落實雙方關於加強禽流感防控雙邊合作的共同倡議。

（五）擴大兩國在人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雙方應積極擴大文化交流，探討建立中美文化合作對話協商機制。進一步發揮中美科技聯委會的作用。鼓勵兩國政府主管部門、科研機構和產業界加強科技合作。

²³⁵ 「胡錦濤訪美強調台灣問題是核心問題」，人民日報（北京），2002年5月3日。

²³⁶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胡錦濤訪美為接班鋪路」，聯合早報，2002年4月22日。

²³⁷ 「中美元首達成廣泛共識」，中國網，2005年11月21日。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5-11/21/content_6035672.htm，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1月21日。

對此，小布希與以正面回應，強調中國是重要國家，對於經貿領域，雙方認為要從戰略層面看待目前的經貿摩擦，不要因一時一事動搖雙方繼續合作的信心；對於共同關心的地區性及全球性問題，如北韓核問題、禽流感防治、反恐合作等，雙方均表達高度的共識。尤其在禽流感防治上，雙方簽署了《中美禽流感共同行動倡議概念文件》，²³⁸象徵此次「布胡會」有著具體的成果。

2006年4月18日至21日，胡錦濤完成原訂去年9月就應該完成的以新任國家主席身份訪問美國。20日小布希與胡錦濤進行會晤，會談的內容與去年小布希訪問中國時相似，主要表達在經濟、軍事、科技等多方面進行交流對話，並針對促進區域穩定展開合作。²³⁹在此次訪問期間，胡錦濤會見了許多中美關係中的元老級人物，包括季辛吉、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布里津斯基，前貿易代表希爾斯（Carla Hills）和前國防部長斐瑞等人，他認為在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方面，兩國專家學者大有可為，希望雙方多往來、多交流、多建言，為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發展繼續作出貢獻。²⁴⁰此外，胡錦濤也發表題為「全面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演講，強調此次目的就是同美方加強對話，擴大共識，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全面推進 21 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並提出六點發展中美關係的主張：1)增進了解，擴大共識，構築長期穩定的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2)把握機遇，開拓思路，鞏固和擴大經貿合作基礎。3)恪守原則，履行承諾，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妥善處理台灣問題。4)密切磋商，迎接挑戰，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與協調。5)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不斷加強兩國人民的友好交流。6)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正確看待和處理彼此之間的差異。²⁴¹

三、歐巴馬時期的美中領導人互訪

²³⁸ 「中美禽流感共同行動倡議概念文件」，中共外交部，2005年11月20日。

http://www.gov.cn/zwjw/2005-11/20/content_104598.htm，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1月20日。

²³⁹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ush Meets with President Hu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 April 2006,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6/04/20060420-1.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0月21日。

²⁴⁰ 「胡錦濤會見中美兩國專家學者」，中共外交部，2006年4月19日。

<http://www.mfa.gov.cn/chn/ziliao/wzzt/hjtcf200604/hjtcf200604usa/t247322.htm>，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0月20日。

²⁴¹ 「全面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中共外交部，2006年4月20日。

<http://www.mfa.gov.cn/chn/ziliao/wzzt/hjtcf200604/hjtcf200604usa/t247778.htm>，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0月21日。

2009年1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經由參加於新加坡舉行 APEC 非正式領袖會議之機會，進行上任後的第一次亞洲行程，期間訪問日本、中國與南韓等三國。此行主要目的在加強和亞太國家的關係，議題涵蓋經濟復甦與均衡成長、亞太地區經濟整合、防止核武擴散、反恐戰爭、防止氣候變遷等諸多領域的合作。²⁴²訪問中國期間，17日歐巴馬與胡錦濤見面，進行「歐胡會」，並發表聲明。該聯合聲明主要有五大點：²⁴³

第一，中美關係雙方認為，兩國領導人保持密切交往對確保中美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至關重要。雙方認為兩國元首的會晤和兩國其他重要雙邊交往加強了兩國關係。胡錦濤受歐巴馬之邀請於2010年訪問美國。兩國領導人將繼續通過互訪、會晤、通話、書信等方式保持密切溝通。

第二，建立和深化雙邊戰略互信。雙方認為，21世紀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對和平、發展與合作的需求增強。中美在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

第三，經濟合作和全球復甦。雙方決心共同努力，推動全球經濟實現更加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為此，雙方注意到彼此強有力和及時的政策措施有助於遏制全球產出下降和穩定金融市場。雙方同意延續現有舉措以確保強健、可持續的全球經濟復甦和金融體系。雙方重申將繼續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加強對話與合作。雙方承諾履行在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20國集團峰會和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中作出的所有承諾。

第四，地區及全球性挑戰。雙方認識到，在當前國際形勢發生複雜深刻變化的情況下，中美在合作應對地區和全球安全挑戰方面擁有共同責任。雙方強調中美在亞太地區擁有廣泛共同利益，支持構建和完善開放、包容、共贏的地區合作框架。雙方將努力推動亞太經合組織在促進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以及東盟地區論壇在促進地區安全合作方面發揮更有效作用。

第五，氣候變化、能源與環境。雙方就氣候變化問題進行了建設性和富有成效的對話。雙方強調氣候變化是我們時代的重大挑戰之一。雙方認為應對這一挑戰需要強有力

²⁴² 「歐巴馬亞洲行傳達訊息 美也是亞太國家」，**聯合報**，2009年11月13日。

²⁴³ 「歐胡會「中美聯合聲明」全文」，**聯合報**，2009年11月17日。

的回應，國際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雙方相信，應對氣候變化應該尊重發展中國家把經濟和社會發展作為優先事項，並相信向低碳經濟轉型是促進所有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機會。

貳、要求遵守人權規範

美國是一個相當注重人權的國家，促進人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要項。1989年6月4日，中國的「天安門事件」，在美國人的眼中是一種對民主、人權的踐踏。美國對中國政府做出制裁的動作，包括了在1993年以「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鉤的對中政策。但是，隔年此一政策被放棄，因為它是一種「孤立中國的作法，並不能真實的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更重要的是，「安全與經濟問題上的進展不應該被當作強制解決人權問題的籌碼」。²⁴⁴放棄經濟制裁並不代表美國對中國人權的放任，美國還是緊盯中國政府對人權的改善。美國透過與中國的人權對話（human rights dialogue）以及國務院每年發表的《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方式要求中國遵守人權規範。

美國與中國人權對話開始於1990年，到了2002年12月共舉行13次對話。之後，雙方在人權議題上出現分歧，導致中斷人權對話長達6年之久。2008年5月，雙方重新恢復對話。²⁴⁵在14次的對話過程中，雙方對於人權議題的分歧多過於共識，許多時間都是在各自表述人權觀。

如果中美人權對話是一種較溫和的人權外交，那麼美國國務院每年提交國會的《人權報告》即是一種強硬的人權外交，它更能突顯美國對中國人權發展的監督。《人權報告》由美國國務院下屬的「民主人權勞工局」（th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所起草，第一份報告是1977年季辛吉領導下的國務院向國會提交，其根據《對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第116（d）條款與502（b）條款的規定，國會要求國務院報告有從美國得到援助的國家和聯合國成員國的人權狀況。雖然《人權報告》不

²⁴⁴ Warren Christopher, “American Interest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ddres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May 17, 1996), p. 34.

²⁴⁵ 「中美人權對話中斷六年恢復，美方高度評價」，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年5月26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6/5/8/6/10065864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658640>
，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11月10日。

是僅僅針對中國的人權發展所提出的報告，但是中國的人權狀況自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已成為每年《人權報告》關注的焦點。

在《人權報告》中，詳盡說明中國政府對人權的迫害，以及是否有所改善。從 1993-2008 年的每年報告中，發現負面報導中國的人權狀況佔據極大多數。以 2008 年的《人權報告》為例，批評中國政府對新疆與西藏少數族裔進行「嚴厲的文化與宗教鎮壓」，擴大對異議份子與陳請者的拘禁與騷擾，對於使用網路與言論自由也嚴加管制，並沒有達到在申辦北京奧運前對於改善人權的承諾。²⁴⁶美國國會根據《人權報告》的內容，常常要求行政部門對中國政府忽視人權的現象應該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包括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譴責中國的人權政策，迫使中國簽署有關人權的國際條約，還有必須釋放持不同政見者。

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達成某些符合美國要求的人權目標，例如，1997 年柯江的華府高峰會前夕，中國於 1997 年 10 月 27 日簽署《關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並且在 2001 年 3 月 27 日，批准該公約。另一個《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在 1998 年柯江的北京高峰會之後，中國於 1998 年 10 月 5 日簽署。同時，魏京生、王丹等人也被釋放。2003 年 6 月 27 日，中國正式向聯合國提交履行《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的首份履行約定報告。至於《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依據 2005 年 10 月中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表示，一旦條件成熟國務院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該公約。

²⁴⁷2008 年 1 月，約 14000 位中國人民連署，敦請人大批准該條約。連署者認為：

中國自 1998 年 10 月 5 日簽署該公約至今，跨入第 10 年，仍未啟動全國人大審議與批准該公約的程序，...有損中國國際聲望，...難以面對鄰國友邦的信任，辜負國際社會的殷切期待。...中國既然已經批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²⁴⁶ 2008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ebruary 25, 2009.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8/eap/119037.htm>，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2 月 25 日。

²⁴⁷ 中國國務院，「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2005 年 10 月 19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9/content_3645619.htm，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20 日。

國際公約》，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批准，當是應履之義。²⁴⁸

不過，截至 2009 年止，中國全國人大仍未批准該條約。

第四節 小結－權力轉移理論的比較分析

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 20 世紀 50 年代末期針對有關解釋戰爭，特別是大國間戰爭的學術論述。它解釋大國間權力關係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戰爭與和平間。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強國之間的權力關係變化，從而引發戰爭的最主要原因是彼此實力的接近。特別是當強國之間的權力分配出現「權力均勢」(power parity)趨勢時，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最高。²⁴⁹它也認為國際秩序之所以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其原因不是強國之間不能形成的權力平衡，而是因為各國人口、政治結構和工業力量都處在快速的變化和發展之中。其可能的結果是，「一群新來者正在不斷的挑戰世界政治的現有領導者，如果這些挑戰者一旦成功，將意味著權力結構從一群國家向另一群國家轉移。這是新的國際秩序的開始。」²⁵⁰

基於上述理論假設，當今全球霸權地位的美國認為有些中小國家在權力增加之後，即便在全球的系統層次上不挑戰主導國家，卻會在區域層次上挑戰區域內的強國。²⁵¹因此，美中是否會發生「權力轉移」理論所強調的霸權爭奪戰爭，其可能性一直存在，戰爭與否的關鍵取決於美國是否能夠在現有體系中兼容中國，並且對中國力量發展性質的關注應該高於對其規模的重視。權力轉移理論對於超級強權如何維持其地位、如何管理世界政治乃提出建議。該理論的建議包括了對於結盟的管理 (managing alliances)、國際組織的管理 (manag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滿意度的管理 (managing satisfaction)、權力的管理 (managing power)、區域危機的管理 (managing local crises)。

在結盟管理部份。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結盟的國家間對現況的評估結果相類似時，

²⁴⁸ 「14070 位中國公民敦請人大批准人權條約」，新紀元網，2008 年 1 月 2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8/1/2/n1962413p.htm>，上網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20 日。

²⁴⁹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Chapter 1.

²⁵⁰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183.

²⁵¹ Douglas Lemke and Jacek Kugler,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pp. 3-33.

聯盟是穩定的。穩定的聯盟不會因為一些事故而輕易改變。由超級強權組成的聯盟，係以滿意現況的國家中創造優勢地位的設計方式來加強系統的穩定性。一個成功的超級強權會吸引大量的強權和次強權及一些小國家支持其領導地位，各國參與超級強權即成為一個現況聯盟系統的一部份。因此美國在外交層面的作為，不斷的透過雙方領導人的會晤，保持兩國密切交往以確保中美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並可建立和深化雙邊戰略互信，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

在國際組織的管理部分，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組織為不滿意國家所能挑起的衝突提供解決爭執的環境和場所，而聯合國安理會即為了解權力轉移在經營國際組織時的有用機構。²⁵²而國際組織代表一國融入國際秩序的程度，加入這些國際組織可證明是否接受國際規範。因此，美國積極不斷的利用各種作為將中國納入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的管理機制中，並認為在當前國際形勢發生複雜深刻變化的情況下，中美在合作應對地區和全球安全挑戰方面擁有共同責任。雙方強調中美在亞太地區擁有廣泛共同利益，支持構建和完善開放、包容、共贏的地區組織合作框架。

在滿意度管理部份，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為了維持現有的權力體系狀況，超級強權和其最緊密的盟友的主要目標是在國際體系中擴充滿意度。換言之，美國必須小心，對爭執或認知絕不可有不公平處理而使系統中的不滿轉移至其他部分。特別在經濟利益方面，美國必須提升超級強權主導的聯盟內之滿意度，因此，美國對中共滿意度的管理，一方面以雙邊對話方式，要求中國市場更開放、貿易更自由化；另一方面以多邊方式，也就是透過國際組織，希望對中國進行管理，以創造並保持高滿意度。

在權力管理部份。當經濟發展成熟時，經濟成長率會較緩，美國發現中國一個快速成長的挑戰者不斷竄升，而美國如何做才能維持優勢並避免超越情況的發生？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應該透過聯盟系統的擴展、經濟上的擴張，或者兩者兼具。聯盟系統的擴展係指，試圖吸納包括不滿意國家在內的新成員加入其主導的聯盟如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其次，也可透過經濟上的擴張，即以經濟協定（economic agreements）來加以約束。這些經濟協議能夠產生一個雙方自制為主的互惠中心（reciprocal center），

²⁵²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35.

不需要其他的激勵就可以解決彼此政治上的爭端。

在區域危機的管理部份，在挑戰者快速的成長率、超越、和不滿意的情況下，權力轉移理論預期會有許多區域性層級發生衝突並遍及全球。在此情況下，權力轉移理論認為，超級強權不應該未能檢視利益而介入任一衝突，應該集中注意力於關鍵的責任之上，就是維持和集中它的力量在全球層次，使它的聯盟內各自成員能滿意現況和處理可能的挑戰者。²⁵³因此美國面對中國的可能挑戰，首要目標乃避免霸權地位受到挑戰。美國最擔心中國崛起後挑戰其霸權地位。在軍事方面，首先，美國全球軍事戰略重心從歐洲調整到亞太地區。其次，強化與日本軍事同盟的關係。第三，積極與中國進行軍事對話及交流。美國運用上述作為，以避免區域可能產生的為機與衝突。



²⁵³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p. 40.

第四章 崛起強權的全面挑戰—中共的戰略布局

對中共而言，自 1990 年代開始即面對著「中國威脅」和「和平崛起」的機遇與挑戰，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提出所謂的「新安全觀」，以因應當前的世界新局。在江澤民時期，即於 1997 年 4 月訪問俄羅斯時，與葉爾欽總統發表聯合聲明，並首度宣示「新安全觀」的立場。²⁵⁴江澤民復於 2002 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²⁵⁵為中共提倡的國家新安全觀作出更進一步的指導方針，足見中共對於推動此政策之積極和殷切。此外，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必須站在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的高度，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並以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及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²⁵⁶

由於全球化之後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特別是美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且對中共的國家利益影響也最大。²⁵⁷無可諱言地，自 1990 年代初期以來，許多美國戰略研究者即針對中國將成為未來美國安全和區域性利益最大的挑戰者和威脅者等問題而爭論不休。²⁵⁸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周邊國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國對於中國崛起是否會帶來威脅充滿疑慮。中共最擔心的問題從過去自身安全受到威脅，轉變為世界主要大國和亞洲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是否會帶來威脅產生疑慮。此外，中共認知無法自外於全球化的衝擊與挑戰，一方面受限於國際體系的制約；另一方面，中共對於世界經濟依賴的程度亦逐步加深，使得中共必須重新思考其新的國家安全政策。²⁵⁹基於此種背景，促使中共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型安全觀，而此新安全觀

²⁵⁴ 「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北京），1997 年 4 月 24 日，第 1 版。

²⁵⁵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6。

²⁵⁶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全文」，*文匯報*（香港），2007 年 10 月 15 日，<http://news.wenweipo.com/2007/10/15/IN0710150091.htm>，檢視日期：2011 年 3 月 21 日。

²⁵⁷ Judith F. Kornberg and John R. Fau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Policies, Processes, Prospect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5), pp. 288-294.

²⁵⁸ Thomas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5-40;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5-41

²⁵⁹ 朱蓓蕾，「全球化與中共安全觀：轉變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 46 卷第 6 期（2003 年 11 月 1 日），頁 89-90。

是與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相互呼應。²⁶⁰在新安全觀的架構之下，不僅強調國家安全的外部性變革（如擴大到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等非軍事領域），也擴大到政治昌明、社會安定等國內安全，代表著中共在安全問題與國際認同的深化，也體現出防禦性現實主義的思想。²⁶¹

從 2009 年兩度的聯合軍演之後，美國與南韓兩國決定繼續舉行代號為「關鍵決斷」(Key Resolve) 和「禿鷹」(Foil Eagle) 的聯合軍演。這次聯合軍事演習的假想狀況是「北韓劇變」和「共軍進入朝鮮半島」等情況。儘管美韓從去年中開始就不斷的在朝鮮半島周邊海域舉行聯合軍演，但中共卻改採「東守西攻、北穩南進」的戰略，用以因應美韓的咄咄逼人之勢。

中共採取「東守西攻、北穩南進」的戰略最顯著之處，主要有二：一是、伊朗宣布與中國大陸簽署總額高達 130 億美元的鐵路建設合約，由中國大陸為伊朗承建總長度超過 5300 公里的鐵路網；另一則是新疆宣布下月開工興建通往中亞和西亞的首條高速公路，由喀什至吉爾吉斯交界的伊爾克什坦口岸，全程 200 多公里，2013 年 9 月竣工。這兩項工程若完工，將使中共的戰略縱深跨越到西南的伊朗和西部的中亞地區，破解美國對中共的「C 型包圍」態勢。

從去年開始，中國大陸的戰略學者就不斷的提出美國將對中共建立「C 型包圍」的戰略格局，這是指美國的戰略佈局，是構築在過去「新月形包圍圈」的圍堵戰略基礎上逐步完成的，即從中國大陸東北部的韓國、日本島鏈、台灣、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泰國、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到建構起了對中國的「C 型包圍」態勢，這種佈局是美國在印巴次大陸、西亞、中亞的新佈局後完成的思考，大陸的戰略學家認為目前美國已經建構成這個新的戰略態勢。

為了應付美國「C 型包圍」的戰略，中共於是提出「東守西攻、北穩南進」的新戰略，亦即在東方採取守勢，儘管美韓不斷舉行聯合軍演，中共也僅止於採取守勢的作為，

²⁶⁰ Michael E. Marti, "China: Making the Case for Realistic Engagement," *Strategic Forum*, No. 185 (Sep 2001), pp. 1-4.

²⁶¹ 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10-15；唐世平，「國際政治理論的時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4 年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40-150。

並未強烈的進行抗爭。而北方的俄羅斯，中共也以穩定為主，不和俄國交惡。

至於「西攻」，則除了鞏固「上海合作組織」的軍事功能之外，也開始從新疆修建高速公路跨越中亞、西亞，如果中共被美國完全封鎖，便可以由此取得應有的戰略資源。

「南進」則是找尋最有效的突破口，中共戰略學家認為應該在巴基斯坦、緬甸、阿富汗這三個方向上思考，其中尤以通過阿富汗到達伊朗，可以獲得伊朗的石油，也可以通過伊朗到達印度洋。這也是中共願意為伊朗修建鐵路網的緣故。

從中共決定幫伊朗修建鐵路網，以及從新疆修建高速公路通往中亞的作為來看，去年被中共戰略學家炒得沸沸揚揚的美國「C型包圍」戰略，似乎已經催生出中共的新戰略。所以美國越是在中國大陸東方為了北韓問題，不斷的和南韓進行聯合軍演，就越推進中共向西、南躍進。所以美國的戰略是否正確，恐怕還有待美國戰略學家好好的思考。

第一節 軍事層面

2010年英國「詹氏防衛週刊」(Jane's Defense Weekly)公布「2009年世界最新軍力」排名前5名分別是：美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大陸、英國。而中國大陸位居第4的原因，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的波灣戰爭後，中共逐步增加軍費投入，引進很多先進軍事技術，現已取得不少成果。太空技術與導彈技術領先歐洲，軍隊又加緊進行資訊化建設，核導彈技術具有一定實力。²⁶²中國大陸公布2009年的國防預算，以2位數百分比持續成長，列出國防預算為4806.86億人民幣(約702.76億美金)，約佔國內生產總額(GDP)的14%，較2008年增長14.9%。²⁶³如表4-1。

²⁶² 「詹氏防衛週刊：美法俄中英居世界軍力前名」，中央社(北京)，2009年9月14日。

²⁶³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98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9年10月)，頁50-51。

表 4-1：中共公布近 10 年國防預算統計表（2000 年至 2009 年）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份	國防預算總額	國防預算增長%	財政總支出	占財政總支出%
2000	1207.54	12.15%	15879	7.60%
2001	1442.04	19.42%	18844	7.65%
2002	1707.78	18.43%	21113	8.03%
2003	1907.87	11.70%	24649	7.74%
2004	2172.79	13.89%	29362	7.72%
2005	2474.28	13.88%	33709	7.34%
2006	2979.31	20.40%	40213	7.40%
2007	3509.21	17.80%	46789	7.50%
2008	4182.04	17.60%	62427.03	6.07%
2009	4806.86	14.90%		6.0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98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9 年 10 月），頁 51。

儘管人民解放軍在諸多方面的表現仍不完全符合西方國家對於專業化的定義，然而在時勢所趨之下，解放軍日益走向正規化、年輕化、現代化與專業化則是不爭的事實。²⁶⁴早在 1990 年代初期，國際社會適逢後冷戰時期的轉型階段，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之下，開始探索新的國家安全觀念，並從積極啟動軍事改革著手，其主要的目的乃在於依據新的世界局勢，進行軍隊現代化建設和軍事準備，以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為了呼應此項改變，江澤民在 1991 年 7 月 1 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70 周年的講話中，首先提出了軍隊建設的「五句話」總要求。那就是「我們要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軍事訓練，使全軍部隊做到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努力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

²⁶⁵此外，江澤民在十四大的報告中再度重申「五句話」（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

²⁶⁴ 丁樹範，**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2002 年），頁 96-119。

²⁶⁵ 人民解放軍，**中共軍隊高中級幹部理論學習讀本**（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頁 820。

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重要性。揆諸江澤民的「五句話」相較於毛澤東時代，強調了軍事現代化和正規化的要求，而與鄧小平提出的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總方針是一致的。

十六大之後，江澤民於 2002 年 12 月 15 日接見了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出席十六大的全體代表，再次要求建立鞏固的國防和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2004 年 9 月名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和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由胡錦濤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除了對江澤民的軍隊現代化方針做出高度的評價，並調整中共中央軍委組織成員，進一步指明了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胡錦濤時期更確立了中共國防和軍事建設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²⁶⁶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江澤民國防和軍事建設思想，堅持新時期軍事建設方針，積極推動國防和軍事現代化進程。²⁶⁷

胡錦濤時期，中共希望未來解放軍將重心置於建軍本務方面，落實「科技強軍」的理念，減少軍隊對政治的干預，並考慮與西方大國以平等協商的方式進行交流與合作。在處理與美國關係時，也將兩軍關係作為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促成兩國軍方在人道主義救援、軍事環境保護、以及互派人員觀察對方軍事演習等方面展開合作。解放軍在毛澤東時代是一支政治力量，現在這種色彩在下降，而其國家武裝力量的色彩在增加。作為國家武裝力量的解放軍，對國家的安全政策有一定的影響。²⁶⁸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更強調開創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全面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堅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把科學發展觀作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加快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做好軍事鬥爭準備，提高軍隊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為維護世界

²⁶⁶ 所謂「三個代表」是指「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三個代表主要內容的實踐活動，藉以吸收社會各方面先進分子，增強黨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參閱《中國大陸綜覽》(台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年)，頁43。

²⁶⁷ 「2004年中國國防白皮書」，人民網。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8221/51758/51931/51935/3626059.html>，檢索日期：2011年3月24日。

²⁶⁸ 林麗香，「解放軍政治角色轉變之研究」，《中共研究》，第39卷第11期(2005年11月)，頁82-101。

和平貢獻力量，²⁶⁹由此樹立了中共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是統一的整體。

綜而言之，在國際格局以美國為首的現況下，中共所面臨的威脅是美國為維持其現有地位，而企圖在中國周邊建立霸權控制。為因應此一隱憂，中共必須持續貫徹其現代化的建軍思想。尤其在中共新安全觀的戰略思維中，為因應可能的外在威脅，經濟發展結合軍事發展乃是厚植中共綜合國力與建立一個大國地位的手段。在軍事上，中共的軍力仍會逐步地實現正規化、現代化的目標，並以平等協商的方式與西方大國進行交流與合作。

2010年8月16日，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2010年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以下簡稱「報告書」)。該「報告書」整體而言，增加了對中共軍力發展的正面評價，「報告書」稱，中共逐漸增加各種「非戰爭」軍事任務在解放軍軍事行動、武器添購與訓練中的角色與比例，其中許多都與國際安全合作有關，而且亦不涉及敏感的軍力平衡議題，例如2009年中共派遣海軍支隊前往東非亞丁灣(Gulf of Aden)參與聯合國國際聯合護航、打擊海盜任務和反恐能力。中共軍隊也應對中國境內越來越頻繁發生的大型天災救援能力，以及其他國際維和任務與人道協助等。「報告書」也稱讚中共在軍事透明程度方面有適度的改善，儘管仍離西方國家的標準很遠。美國對於中共軍方在這些方面的能力改善抱持歡迎的態度，因為這些行為都有助於使中共朝向美國所希望的「負責任大國」的方向發展。

「報告書」認為中共的大戰略還是依照「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鄧小平遺訓，以維持區域內外的穩定國際環境，俾使中共能持續高速發展經濟為主軸，畢竟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最大基礎。但「報告書」舉出七項可能改變這一大戰略主軸的內外因素，以支持其對中共內部目前存在的未來戰略走向分析。這包括中共敏感的民族主義、為了持續發展經濟而必須面對的資源因素、國內政治壓力、人口問題、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變動性甚高的臺海議題和區域領土糾紛。這七項因素已開始在中共內部引

²⁶⁹ 「開創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新華網，2007年10月15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10/20/content_6913002.htm，檢索日期：2011年3月24日。

發針對未來戰略方向的辯論，目前出現兩種對立的新戰略主軸：加強與美國合作，以及在國際議題上採取以中共利益為核心考量的強硬態度並避免遭到美國的圍堵。

壹、軍事力量的投射

中共未來軍事戰略路線的辯論，也影響到中共軍隊的軍種戰略和建軍努力。根據美國國防部「報告書」認為解放軍的主要軍事戰略，仍是以積極防禦為主，雖然整體戰略目的是防禦性，但其作戰性質則越來越朝向攻勢化，並著手發展多種不同運用層次的攻擊武器及多軍種協調作戰能力，以實現其「反介入」（anti-access）和「區域拒止」（area denial）兩項主要作戰。這兩項作戰的地理範圍遠超過中國周邊海域，以太平洋兩島鏈地區為主，並要求海軍水面艦隊能在離岸 1,000 浬（1,852 公里）處與敵艦隊交戰，最主要的目標則是臺灣與美國海空軍。為了達成此一目標，解放軍預計運用的武器主要包括：傳聞許久的「反艦彈道飛彈」（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能夠攜帶新式反艦巡弋飛彈（Anti-Ship Cruise Missile, ASCM）的基洛級（KILO）、宋級柴電潛艦及元級與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包括現代級在內可攜帶長程防空與反艦飛彈的飛彈驅逐艦，以及能夠攜帶反艦巡弋飛彈的 FB-7、FB-7A、SU-30 MK2 戰機。

另外，中共軍隊的裝備發展並不以解放臺灣為最終目標，許多發展中的裝備都是以能夠支援在第二島鏈範圍外的「延伸作戰能力」（Extended Operational Reach）為主要目的。海軍是整個延伸作戰能力的核心，特別是當中共對中東、非洲、北美的原油及天然氣依賴已經超過整體需求的一半以上（預估在 2015 年，外國能源進口量將達到中國能源需求的 2/3，到了 2030 年則將高達 80%，而且即使中共所有擬議中的跨國油管、輸氣管均興建完成，且達到設計運輸目標，也無法有效降低這種依賴程度），使得中共海軍保衛中國海外利益與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的呼聲日益升高，中共將越來越需要一隻擁有航艦與遠洋作戰能力的強大海軍來應付保衛海上交通線、護衛中國海外利益，以及在南海領土爭議中作為不可或缺的軍事依靠。中共未來可能的延伸武力投射地區，將包括印度、俄國、中亞、南海等地，其中又以南海是最有可能的目標。

再者，中共在太空戰與網路戰的努力，亦是一項軍事發展重點。太空科技對於增強

中共軍隊飛彈的打擊精確度與 C4ISR 能力等具有高度重要性，美軍便是經由其綿密的衛星網路才得以在冷戰結束後的歷次大小武裝衝突中以精確打擊順利擊敗對手。高解析度與完整的衛星網路對中共軍隊依賴遠距精準攻擊武器實施「反介入」與「區域拒止」作戰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但除了完善自己的部署，另一個方法是同時降低敵人在這方面的可靠度，鑑於美軍已經高度仰賴衛星和網路化、電子化等作戰手段，若能設法使美軍的衛星、網路與電戰設備無法使用，對中共軍隊必然大有助益；中共軍隊在 2007 年 1 月試射一枚反衛星飛彈擊落太空中的老舊衛星即帶有這種意涵。此外，中共也已成立特殊部隊準備實施網路戰，長期以來，網路戰已經被中共視為第一波的攻勢主力，而且是「不對稱」作戰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貳、戰略嚇阻能力發展

在核武的競逐中，部份國家認為核武的「有效嚇阻」及「確保相互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有助於改善國家整體安全，並期盼能在戰略利益與保衛實質利益間取得平衡。且傳統的嚇阻模式認為，核子均勢與世界的穩定是結合在一起的。而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則暗示核子均勢會導致不穩定，因為由一個對現況滿意的防衛者所掌握的核子優勢可確保和平，但對一個不滿現況的挑戰者而言，核子均勢或核子優勢卻可能會導致核子戰爭。²⁷⁰ 基此，許多西方學者或研究報告，對中共這個擁有一些核子武器的集權政體崛起，對其核武的控制或技術的管制，並未抱持過多樂觀的想法。並預言，中共擁有一些核武，將增加其與強權對抗的籌碼，例如由美國國會所指定的寇克斯(Cox)委員會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共在追求西方分析家所稱的「最低程度的嚇阻能力」，就是希望依賴少量的核子武器，在遭受敵人的首波核武攻擊後，有能力以此等核彈頭展開報復，並造成敵方無法承受的損害，從而對敵人構成嚇阻作用。就中共的觀點而言，如果能讓敵人相信其對中共進行核子攻擊將會遭到中共報復，則敵人就不會以核子武力來嚇阻或威脅中共。²⁷¹

²⁷⁰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ti, Brian Eford and A.F.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LLC., preface 2000), P. 82.

²⁷¹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高一中譯，*中共崛起構成的挑戰：亞洲觀點*，(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 38。

中共在 1950 年代尚未擁有核子武器，因此在軍事戰略上，主要強調傳統武力的重要性。至 1957 年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同意援助中共核技術。但 1959 年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共遂決心自力研製原子彈。及至 1964 年中共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次年，轟炸機空投的核試爆成功後，使中共開始成為擁有實際核武的國家。自 1960 年代起，中共的核武戰略主要係以防衛、生存為主，並將核武視為保衛國家安全、嚇阻強權威脅中國的利器。²⁷²因此，「積極改善和提昇有限但有效的核子報復力量」遂成為中共核武的戰略構想，由於中共認為戰略核武為「國家」安全防禦的重要力量，亦為推行對外擴張政策與爭奪世界霸權不可缺少的工具，故其積極發展核武器的目的，除為確保民族自尊、恢復民族地位外，亦有打破美、俄、英、法等國「核壟斷」，及防止超級大國對其可能發動的核武襲擊的企圖。

中共的核武政策在 2000 年所公布的國防白皮書當中明確的宣示：

第一，核大國放棄核威懾政策，擁有最大核武庫存的國家繼續大幅度的削減其核武器。
第二，所有核武器國家都承擔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義務，都承諾無條件地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地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並儘早就此締結國際法律文件。

第三，所有在國外部署核武器的都將這些武器全部撤回本國，所有核武器國家都承諾支持建立無核武區的主張，尊重無核武區的地位，並承擔相應的義務。

第四，各國不發展、不部署外太空武器系統和破壞戰略安全與穩定的導彈防禦系統。

第五，各國談判締結關於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國際公約」。²⁷³

另外，中共「中國 2002 年國防報告書」亦重申其核武一貫立場為倡導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化學武器、生物武器及核武器，承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時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故簽署了《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並認真履行兩公約規定的各項義務。²⁷⁴雖然中

²⁷² 陳文賢，「國際環境對中共核武政策發展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1999/2），頁 3-4。

²⁷³ 「中國 2000 年國防白皮書」，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44325.htm>，檢索日期：2011 年 3 月 20 日。

²⁷⁴ 「中國 2002 年國防白皮書」，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44325.htm>，檢索日期：2011 年 3 月 20 日。

共的國家戰略以及核武政策不斷宣示其「防禦性」，但是隨著印、巴兩國相繼試爆核彈成功、美國倡導「戰區飛彈防禦」(TMD)與「全國家飛彈防禦」(NMD)及經過波斯灣戰爭以及科索沃危機等國際局勢發展後，中共的核武戰略構想已逐漸轉變為「積極防禦」。其目前成果為具有攻擊美國本土及亞洲核武國家能力的「東風 5 型」及「東風 31 型」陸基洲際導彈，並積極發展潛射「巨浪 2 型」彈道飛彈，使中共核武具有多方位發射能力。

由於中共國力不斷的提昇，加以核武技術的精進及擁有強大核武的事實，若只強調其核武政策的防禦性，仍不足以去除周邊國家及強權國家對其核武企圖的疑懼。尤其相關國家並非只擔心中共核武數量，對其防止核能力擴散的誠意，仍多所質疑，如 2003 年自利比亞發現的核武設計文件顯示，中共是世界核武擴散的源頭之一，中共提供巴基斯坦發展核武的技術，目前也已擴散到其它亞洲國家和中東地，即是明證。²⁷⁵而動態的權力轉移認為，核子擴散並非是一個無害的決定，且核子擴散在戰爭與和平間，是具有密切的關連，一但出現不滿現況的挑戰者，使其害怕毀滅是不足以嚇阻戰爭的，反而是當其在階層體制中接近超越點時，核子擴散即可能造成戰爭。因此，中共更要積極從核武管制及防止核擴散等方面，作出實際的成效，才能有效消除周邊國家及強權國家對其核武企圖的疑懼，並真正成為其口中所說「和平崛起為負責任大國」的宣示。由於中共仍然視美國為全球最重要的國家，中共限武有助於發展對美關係，也有助於建立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有助於中共經濟現代化，符合中共戰略利益。

中共的戰略性核子武力，即將面臨汰換冷戰時期所布署的單一彈頭、使用危險液態燃料、射程較短的老舊 CSS-4 型發射陸基洲際彈道飛彈 (ICBM) 與「巨浪 1 型」潛射洲際彈道飛彈 (SLBM)，改以能搭載多彈頭獨立自返載具 (MIRVs)、使用較安全且能儲存較久的固態燃料，且可以發射車搭載提高第一擊之後生存率的東風 31、東風 31A 型洲際彈道飛彈以及 CSS-5 型中程彈道飛彈。至於其海軍新式 094 級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SSBN) 使用的「巨浪 2」型潛射洲際彈道飛彈，則遇到技術上難以克服的問題而暫時無法服役。

²⁷⁵ 「利比亞核武文件，赫見漢字」，中國時報，2004/2/16，第 A13 版。

雖然其核武發展有這些進展，但中共的戰略性核子武力仍面臨數量太少以及複雜的管制問題。而且，其核武政策（不首先使用、也不對無核武國使用或威脅使用）似乎也正面臨適用上的新挑戰；例如，假使某國在被北京稱為領土之處從事核武試爆，北京是否將以核武回擊？更嚴重的是，某些中共軍官公開表示應該明文規定哪些情況下使用或不使用核武。這些問題都將對中共的新戰略嚇阻能力構成挑戰，因為中共的核武器數量較少，而且較落後，其戰略模糊是為了對美國和俄國維持一定的戰略嚇阻能力，如果選擇明確化，可能會降低中共的戰略嚇阻能力，特別是美國與俄國刻正積極發展與部署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更可能因此降低中共戰略嚇阻的可信度。

參、積極參與戰略協商與國際維和行動

一、戰略協商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趙青海教授指出，戰略協商可以發揮兩方面的作用：一是鞏固現有雙邊關係，促進戰略合作，比如中俄戰略對話；二是通過對雙方最關切的戰略性問題進行坦誠交流，為解決分歧奠定基礎，確保雙邊關係長期穩定發展，比如中美、中日、中印戰略對話。戰略對話一般不設專門的議題，它的意義在於從更廣泛的角度闡明各自立場，進行充分戰略評估，從整體上更好地協調兩國關係。中國的戰略對話呈現三大特點：不針對第三方；議題廣泛；以增信釋疑、加深了解、推動合作為主要目的。²⁷⁶故中共冀望藉由各項對話與協商加強與各國間的單邊或多邊關係。

（一）防務磋商

近年共軍對外軍事交流與合作更趨務實，雙邊與多邊軍事對話及磋商極為活躍，與有關國家開展了多形式、多層次、多渠道的防務磋商與安全對話，以利宣傳中共外交和國防政策，並達到增信釋疑、促進合作的作用。期間除與美國、俄羅斯等大國舉行了防務與安全磋商外，並與日本、巴基斯坦、越南、泰國等周邊國家防務部門和軍隊進行了不同形式的安全磋商，為協調雙方立場，增進彼此信任。²⁷⁷對運作大國關係，建構周邊安全環境具正面意義。另冀圖加強推動與各國國防部副部長或相應級別之防務和安全官

²⁷⁶ 「戰略對話：中國與大國交往的新模式」，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3791272.html>，檢索日期：2011年3月21日。

²⁷⁷ 「國際輿論熱評中國軍事外交」，**解放軍報**，2006年12月27日，第5版。

員對話，增進與各國互信合作關係。迄今為止，中國先後與美、俄、日等 22 個國家建立防務安全磋商對話機制。

經統計，2002 至 2008 年，中共與各國進行的各項防務磋商以俄羅斯計有 13 次最多，其中雙方主要以戰略磋商、軍事合作會議為主，會談內容則以國際和地區安全形勢、簽署軍事技術合作與採購等方面為要項，期間 2002 年雙方首次舉行「邊防工作聯合會議」，就鞏固雙方邊界接壤地區之穩定進行磋商，2005 年並達成「和平使命」軍演，後續希望建立每隔二年舉辦一次之固定機制聯合軍演，顯示中共致力擴大與俄國之間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持續增加軍事技術合作領域，以加速軍事現代化進程。

美國部分亦高達 12 次，其中主要以國防戰略磋商為主，會談內容大多以強化雙邊軍事交流、反恐、對台軍售、朝鮮核武問題及中共軍事透明度等為主，其中以達成軍事熱線的協商，首次雙邊海軍的聯合搜救演練等成果，顯示中、美之間的交流已進入更務實的交流合作階段。

中共與日本間的軍事磋商從 2004 年起陸續恢復正常，其中又以 2006 年最為密集，達成了雙方軍事高層互訪的機制化建立，另亦開啟雙方海軍彼此間的互訪合作，顯示中共與日本雖因歷史情結、美日安保條約等因素，彼此間仍存有猜忌，然礙於中共日益的強大，及日本又為地區經濟強國，雙邊關係將更趨務實緊密。

另統計 2002 至 2008 年，中共與德國、英國、蒙古、越南、菲律賓、印度及芬蘭等國達成各項安全防務磋商，顯示中共仍持續深化與歐盟國家之友好關係，並冀望藉由與周邊國家建立各項定期磋商機制，除穩定地區和平外，亦持續強化自身在亞太地區之影響力。

（二）區域安全合作

中共軍事外交著眼於通過多邊區域安全合作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重點開展周邊區域安全合作，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研究員陳舟認為，東盟地區論壇和上海合作組織，一南一北，形成相互支持的良好區域安全合作局面，對於營造中共長期穩定的國際和周邊安全環境將發揮重要作用。²⁷⁸故中共積極參加東盟地區論壇等多邊框架下

²⁷⁸ 「中國軍事外交更趨務實」，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4-12/19/content_2354450.htm， 檢索日

安全政策對話。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成功開創了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區域安全合作模式，促進了地區安全與穩定。上合組織 2001 年成立之時，成員國 6 國元首在上海共同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成員國在安全、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的合作相繼展開。其中，加強聯合反恐演習，是上合組織在防務安全領域合作的重要內容。²⁷⁹2008 年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簽署「上合組織成員國國防部合作協定」，此為中共首次與外國簽訂多邊的安全領域的法律檔。對它來說它可以達到很多外交上的利益。另中共軍隊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安全政策會議，推動東盟地區論壇的防務安全合作。舉辦中共與東盟國家亞太安全研討班，強化中共與東盟在安全領域合作。²⁸⁰

二、國際維和

中共自 1971 年加入聯合國後，初期關注之焦點，在於反美反蘇時期，故指責聯合國假借維和之名，干涉他國內政；然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國際事務展現出高度的參與意願，積極參與各項國際維和任務。²⁸¹1988 年，中共加入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特別委員會。期間因外交政策的改變，逐步增加對聯合國事務參與程度，從 1990 年共軍首次派出軍事觀察員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1992 年正式派遣建制部隊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2001 年中共國防部成立「維和事務辦公室」，統一協調與管理共軍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工作。中國向聯合國派遣工兵、運輸、醫療、軍事觀察員、駐聯合國參謀軍官、民事警察，等維和部隊，以執行各地維和行動。²⁸²截至 2008 年 11 月底，中國有 1049 名維和官兵在聯合國 9 個維和任務區和聯合國維和部執行任務。其中，軍事觀察員和參謀軍官 88 人；赴聯合國剛果（金）特派團工兵分隊 175 人，醫療分隊 43 人；赴聯合國利比裏亞特派團工兵分隊 275 人，運輸分隊 240 人，醫療分隊 43 人；赴聯合國蘇丹特派團工兵分隊 275 人，運輸分隊 100 人，醫療分隊 60 人；赴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工兵分隊 275 人，醫療分隊 60 人；赴非盟／聯合國達爾富爾混合行動工兵分

期：2011 年 3 月 1 日。

²⁷⁹ 梁光烈，「與時代同行的中國軍事外交」，**中國外交月刊**，第 3 期（2009 年 3 月），頁 49-53。

²⁸⁰ 中新網，中國軍事外交活躍展示自信開放形象，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051215/12949764.html，檢索日期：2011 年 3 月 2 日。

²⁸¹ 劉宜友，「對中共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之研析」，**國防雜誌**，第 21 卷 5 期（2006 年），頁 195。

²⁸² 劉宜友，前引文，頁 195。

隊 315 人。²⁸³

中共現在正以聯合國「參與者、建設者、維護者」的身份，參與包括聯合國維和使命在內的一切活動，²⁸⁴2005 年 9 月 15 日，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會議上提出，樹立新安全觀，建立集體安全機制，與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倡議。更是凸顯了中共企圖主導和參與國際事務的決心。

中共鑑於國家安全利益主要係在周邊地區，長期以來，傾向與參與聯合國在亞太地區的維和行動，然基於國力提升、地緣戰略、經貿與能源等政策，現其維和行動已漸次向中亞及非洲地區擴大。中共之所以對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之所以抱持著積極參與的態度，在於可於行動中與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取得聯繫進而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符合中共對週邊和平國際環境的戰略需求與利益此外，參與維和行動是一種國力的展現有助於大國形象的塑造並提升中共的國際地位。²⁸⁵

肆、增加聯合軍演與軍艦出訪

一、聯合軍演

作為軍事訓練的最高形式，作為服從服務於國家戰略全局的軍事外交活動，軍事演習正逐漸成為加強中外務實軍事外交的重要交流平臺。²⁸⁶聯合軍演是反映雙方或多方軍隊關係密切的重要標誌，其作用超越人員互訪和技術交流的層次，它涉及到從指揮部到陸、海、空各軍種等各個層面的聯合合作，雙方軍隊在作戰思想、體制編制、武器裝備、人員素質等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公開，更直接促進雙方軍事互信，意味著彼此可以在安全和軍事領域中進行更緊密的合作。故聯合軍演可視為軍事訓練成果表現的最高形式。

中共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彭光謙說，聯合演習既是加深軍事安全互信的有效舉措，也是借鑒外軍有益經驗的良好途徑。中國軍隊通過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和相互觀摩演習等多

²⁸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2008 年中國的國防**（北京：國務院新聞辦，2008 年），頁 45。

²⁸⁴ 中國網，「中國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 15 年」，
http://big5.china.com.cn/book/zhuan/qkjc/txt/2007-05/15/content_8256864.htm，檢索日期：2011 年 3 月 8 日。

²⁸⁵ 劉飛濤，**21 世紀前期中國對外戰略的選澤**（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頁 417。

²⁸⁶ 中國新聞網，中國軍事外交日趨活躍 軍事演習成交流合作載體，
<http://www.cns.hk:89/gn/news/2008/07-29/1327576.shtml>，檢索日期：2011 年 3 月 8 日。

種途徑，增進了相互瞭解，推進了互信合作，促進了共同發展。²⁸⁷所以軍事演習正逐漸成為中共務實軍事外交的重要交流平臺，形成既定交往機制，貫徹新安全觀的大國形象。

從 2002 年開始，共軍開始有選擇地參加雙邊和多邊聯合軍事演習，同時邀請外軍觀察員觀摩共軍軍事演習，先後派員觀摩西太平洋地區海軍掃雷演習與潛艇搜救演習，美、泰、星「金色眼鏡蛇」聯合軍事演習，並與巴基斯坦、印度及法國海軍分別進行海上搜救聯合演習等。2003 年 8 月中共首次開放內蒙古「合同戰術訓練」基地，並邀請美、俄等 10 餘國的軍事觀察員，觀摹共軍裝甲部隊實兵對抗演練；同月份更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進行代號為「聯合 2003」的反恐軍演；另於 2005 及 2007 年與俄羅斯完成「和平使命」聯合軍演，2006 年首次獲邀參加美軍代號「英勇盾牌 06」軍事演習觀摩，持續於非傳統領域上，以參與者或觀察員身份與巴基斯坦、哈薩克、印度等國進行聯合反恐及搜救演習，以向國際展示其反恐力量與決心，故中共軍演從早期以反恐或蒐救為主軸之聯合軍演，提升至軍事層面軍演，以聯合軍演為代表的對外軍事合作交流正在從非傳統安全領域向傳統安全領域邁進，畢竟，中國面臨的安全問題是非傳統和傳統因素相互交織的，而後者才是國家根本的安全關切所在。²⁸⁸

二、軍艦互訪

艦艇互訪是軍事領域交流的一個重要項目，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標誌性。²⁸⁹中共在艦艇外交上亦極為活絡，除訓練中共海軍遠洋航行能力外，亦可宣揚國威、熟悉外軍事務及宣慰僑民，並藉以展示艦船配備之各型武器裝備及促銷武器，另可利用與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印尼及新加坡等國軍艦互訪時機，編組艦隊積極參與諸如聯合訓練與巡邏、搜索與救護、海上緝私和國際維和等非傳統安全領域行動，由單純相互參觀轉為海上聯合搜救軍演。自從 2003 年 10 月中國海軍艦艇首次與巴基斯坦海軍在東海海域舉行聯合演習後，中國海軍艦艇先後在中國領海和外國海域進行了「中巴友誼 2005」海上聯合搜救演習、「和平使命—2005」、中俄聯合軍事演習、「和平—2007」多國聯合

²⁸⁷ 中國新聞網，中國軍事外交日趨活躍 軍事演習成交流合作載體，
<http://www.cns.hk:89/gn/news/2008/07-29/1327576.shtml>， 檢索日期：2011 年 4 月 3 日。

²⁸⁸ 新華網，2004：中國軍事外交更趨務實，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4-12/19/content_2354450.htm， 檢索日期：2011 年 4 月 3 日。

²⁸⁹ 楊松河，**軍事外交概論**（北京：軍事文出版社，1999 年），頁 3。

軍事演習、中美海軍分兩個階段在聖迭戈附近海域和湛江附近海域聯合搜救演習等 20 多次雙邊或多邊海上演習。²⁹⁰顯示中共冀望藉由海軍的友好互訪進而提升至雙邊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更進而達到軍事演習的進展。

中共海軍艦艇編隊自 1997 年成功橫渡太平洋，首抵美洲大陸訪問美國、墨西哥、祕魯及智利等國，2000 年首訪非洲，2002 年 5-10 月共軍海軍艦隊更首次進行環球航行訪問訓練，航程遍行三大洲，共航行 3 萬餘海浬，訪問 10 個國家，²⁹¹2003 年更加大軍艦互訪程度，中共南海艦隊兩艘軍艦首訪美屬關島、汶萊、新加坡等三國，並參與新加坡舉辦之「2003 年亞洲國際海事防務展」、「西太平洋海事論壇」(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 WPNS)，²⁹²2004 年美國、巴基斯坦、印度、法國等國 10 餘艘艦艇亦陸續駛抵大陸訪問；2006 及 2007 年首度與美國、日本及韓國等各國分別進行海上聯合搜救演習；另分赴法國土倫港及澳洲與英、法、澳、紐舉行聯合搜救演習。整體而言，頻繁的艦隊互訪加深了中共與其他國家軍隊的瞭解和信任，不僅能合作打擊國際恐怖和海盜活動，亦可加強與各國海軍非傳統軍事安全合作，從而進一步維護其海洋權益。

從近期觀察，共軍已將台灣海峽列為可能爆發突發性衝突的首要地區；其次才是南中國海及南沙群島地區。最近，共軍領導幹部曾經特別指出，台灣的軍事戰略位置，對於中共意圖擴大建立一個「中國人的積極防禦區」而言，具有極顯著的重要性。許多西方的戰略觀察家認為，共軍針對台灣海峽所做的軍事戰略部署，並非企圖達成武力入侵佔領的目標，而是常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恐嚇脅迫台北接受北京的條件，與中國大陸統一。同時，共軍並意圖以強化其在台海地區的軍事部署，嚇阻美國對其處理「台灣問題」進行干預，或至少使美國感到其干預行為，將付出重大代價。針對應付台海突發衝突所需的戰備要求，共軍已經從俄羅斯處購得約 75 架蘇愷 27 型戰鬥機、四艘基洛級潛艦（有三艘已經交貨），以及兩艘現代級導彈驅逐艦。此外，共軍並已公開展示其曾在 96 年台海危機時，使用過的 M19 型導彈的改良配備。

²⁹⁰ 東北新聞網，中國軍事外交 30 年豐富務實 彰顯透明自信，<http://mil.nen.com.cn/military/284/3192284.shtml>，檢索日期 2011 年 4 月 2 日。

²⁹¹ 2002 年的中國的國防，<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44019.htm>，檢索日期：2011 年 4 月 2 日。

²⁹² 張永興、楊新鵬，「我海軍「深圳號」導彈驅逐艦訪問新加坡」，**解放軍報**，2003 年 11 月 11 日，版 5。

中共目前正逐步地增強其處理台海地區突發衝突事件的戰力需求。1996 年共軍的飛彈試射顯示，其確實有能力恐嚇台灣。對美國而言，想要防衛航空母艦戰鬥群，免於遭受基洛級潛艦及先進的巡弋飛彈攻擊，將遠比防禦老舊潛艦攻擊來得困難。此外，一架蘇愷 27 型戰鬥機也將比一架米格 21 型戰鬥機難對付。隨著共軍逐步地購置先進武器裝備，其戰力必將有所提升。這點是美軍必須隨時提高警覺的。

第二節 經濟層面

冷戰結束後，全球經貿安全問題，獲得各國政府的重視。一般說來，經濟全球化可解讀為發展經濟力量衝破國境藩籬。實施全球經濟及市場的一體化，其目標則在於重新配置世界整體資源，使其發揮最大的效用。²⁹³經濟全球化的目的在使資源配置合理化，使各項要素能發揮最大的效用；而創造公平且運作順暢的體制這需依靠經濟秩序的確立及有效運行，進而如何實現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以及全球經濟秩序之確立與管理。在冷戰時核武軍備競賽的過程中，強權國家把戰略手段當成戰略目的，忽視了經貿發展與經濟安全，在現今全球化的經貿發展，成為各國政府都無法迴避的基本戰略目的。冷戰結束後，兩個超級大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趨於瓦解，中共以經貿發展為核心的綜合國力之爭，已成為國家經濟戰略的主要特徵。

經濟的區域化、全球化加速了中共全球經濟的發展，進而帶動了中共在國家文化、教育、衛生等各方面的成就，但是也導致了一些經貿安全問題的發生。其次，就經濟學理論，市場經濟的特徵就是「開放」。隨著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中共與各國間相互依賴程度越來越深，這存在著政治經濟學中，世界體系「第三世界國家」的「依賴理論」所論述：「經濟發展處於有利態勢的一方，一但發生經濟利益衝突或對抗時，以經濟制裁對方的衝突就會發生。」中共經濟戰略分述如下：²⁹⁴

（一）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以及四項

²⁹³ 江丙坤，「經濟全球化及後坎昆時代 對台灣之衝擊與挑戰」，詳見，<http://www.taiwantrade.com.tw/tpt/cepa/cepa59.htm>，檢索日期：2011 年 3 月 28 日。

²⁹⁴ 曾復生，「亞太新情勢下的大陸國家安全戰略」，參見，<http://rs.edu.tw/military/publish/540-2.htm>，檢索日期 2011 年 3 月 28 日。

堅持為兩個基本點，全力發展生產力。

（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計畫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提高生產力才是最終目的。

（三）沿邊、沿江、沿岸、沿線，全方位經濟發展，因應區域經濟差距增加，防止東南地區坐大。

（四）確保 1997 年 7% 的經濟成長率，低於 3% 的通貨膨脹率，及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的三大定律。

（五）運用三年進行結構性經濟改革，其中包括：擴大國內基礎建設投資、將國有企業納入市場經濟體系、重整金融體系及市場、及精簡政府機構及人員。

中共的和平崛起是一個新型的發展戰略，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營造階段；主要是營造安全的周邊環境，這是一項維護型的戰略，強調主權領土不可分裂。第二，塑造階段；塑造對中共有利的安全環境，這是一項主動型的戰略，主要目標是收復失地；第三，經略階段；經略對中共有利且國際社會又能普遍接受的政、經新秩序，達成戰略平衡與穩定；中共現在處於第一階段。²⁹⁵ 中共「綜合國力」提升，很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自 1978 年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共的年平均經濟成長率是 9%。據估計如果中共繼續維持其在 1990 年代的成長率，中共的 GDP 到 2025 年時將達到 20 兆 2000 億美元，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中共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將達 11,752 美元。²⁹⁶ 另一項研究估計如果中共未來每年平均維持 7% 的成長率，則中共的 GDP 在 2025 年將達到 17 兆美元（62.3370 人民幣），而如果美國的平均成長率是 2.5%，則美國的 GDP 在 2025 年將達到 14 兆美元，次於中共。²⁹⁷ 因此，如果中共能夠維持穩定及維持目前的經濟成長率，則問題不在於中共是否可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而是何時的問題。²⁹⁸

²⁹⁵ Xiu-Chuan Kweng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Study Post* (Beijing),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xxsb/548118.htm>, 檢索日期：2011 年 1 月 6 日。

²⁹⁶ 據估計美國在 2025 年的國內生產毛額是 12 兆 8,000 億美元、人均 GDP 是 38,835 美元。中共與美國的數據是來自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quoted Steven Rosefielde, “Changing the Guard in the Asia-Pacific,”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46,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9), pp. 37-46.

²⁹⁷ Catherine Gelb, “Anyone’s Guess,”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 23, No. 3 (May/June 1996), pp. 12-15.

²⁹⁸ 胡勝正著，林正義主編，**2025 年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預估**（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1 年 4

2007年5月上旬第八屆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外長會中共在德國漢堡召開，特別就亞歐會議今後十年發展，建議應著重進行「推進多邊主義，加強政治對話與互信；深化務實合作，促進世界經濟平衡發展；加強夥伴關係，確保能源安全和有效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尊重多樣性，繼續推動文明文化對話」等四項合作。²⁹⁹美國國務院宣布6月20日在華府舉行辦年一次的美中戰略對話，就雙邊問題及東北亞安全、能源與環境、伊朗與蘇丹答佛區的衝突等議題進行討論。其中包括美國指控中共秘密擴軍、侵犯人權，以及中共人民幣匯率偏低問題。³⁰⁰中共「綜合國力」向上提升時，全球經濟安全戰略的考量因素，列舉問題分析如下：

第一、全球資源的有限性和強權國家為主體對資源的爭鬥：在逐漸形成的全球統一的大市場中，以主權國家仍然是賽場上利益競爭的基本單位，中共大國崛起主權國家與全球利益存在者巨大競爭與合作的矛盾，國家間的力量博弈，仍是分享資源的主要規則。例如，20年前中國大陸還是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國，惟自1993年開始，中共已成為石油的純進口國，其石油需求成長，約佔全球的30%。時至今日，中共每日消費700萬桶石油，石油、煤炭、天然氣等能源總消耗量高達22.25億噸，而其產量卻只有20.6億噸，落差高達1.65億噸。中共在全球各地，已經形成和各國「搶能源」的態勢。³⁰¹

為了提升自身的戰備石油，中國大陸自2003年開始，在鎮海、舟山、黃島、大連等四個沿海地區興建了第一批戰略石油儲備基地。根據規劃，這四處基地完工後，預計將有10多天的原油進口量，加上全大陸石油系統內部21天進口量的商用石油儲備能力，大陸總石油儲備能力將超過30天原油進口量。未來數年內中國大陸將逐步增加原油儲備，並在2010年增加至國際能源總署（IEA）建議的一個月進口量水準，2020年達三個月進口量水平。其次是戰略資源的運輸航道，亞太的經濟命脈海上航道，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海上貿易必預通過麻六甲海峽，對於與美國關係密切的盟邦，諸如日本與南韓的經濟而言，此地區至為重要。二次大戰與日本作戰的經驗：昔日身為亞洲強權的日

月)，頁32。

²⁹⁹ 中共推動亞歐合作，意圖消弭「中國威脅論」，2007年6月11日，**青年日報**，版4。

³⁰⁰ 美中高階官員華府戰略對話，2007年6月20日，**青年日報**，版5。

³⁰¹ 東北亞能源競合趨勢，值得我方關注，2007年6月11日，**青年日報**，版4。

本對於資源的渴望，就如同今日的中共。³⁰²中共進口石油 60% 來自中東地區，存在路線安全問題。中共的進口原油約 80% 是經過麻六甲海峽。誰控制麻六甲海峽，誰就扼制中共的能源通道。

中共在麻六甲困境包括：1. 目前麻六甲海峽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控制下，印度對該海峽也是觸手可及。2. 以中共目前的實力，根本無法控制這條海峽。3. 這條海峽是美國全球戰略必預控制的十六條重要水道之一，一旦美國勢力介入，任何國家也無可奈何。誰控制了麻六甲海峽，誰就控制了中共的能源通道，由於當前中共對這條水道過度亮賴，未來將給中共的石油安全帶來重大的潛在危機。³⁰³2007 年 9 月 9 日印度、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與新加坡等五國海軍，包括三艘航空母艦戰鬥群，約 30 艘戰艦與約 100 架戰機在印度東部孟加拉灣舉行歷來規模最大的「馬拉巴爾-07」聯合軍事演習。中共憂慮招致圍堵孤立，五國海上聯合軍演範圍涉及大陸往來印度洋的能源運輸航線，如果這項軍演有「敵意」那麼將來一旦印度洋、麻六甲至南中國海都會遭到五國海軍封鎖，將是中共取得能源的一大致命傷。³⁰⁴

為保護中國能源利益並為安全目標著想，中共珍珠鏈戰略計畫從中東到南海的航道沿海建立戰略關係。珍珠鏈戰略（圖 1）包括：1. 興建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並設電子監聽站。2. 加強與孟嘉的關係在邵大港興建貨櫃碼頭 3. 與高棉企劃興建一條從中國南部通向海洋鐵路線 4. 南海（Hainan）在南沙（Spratley）與西沙（Parcel）群島的設施，興建港口與機場跑道 5. 與泰國合作考慮出資興建克拉地峽造價兩百億美元的運河，使輪駁船隻避開麻六甲海峽 6. 緬甸興建 AKyab 海軍基地，設立情報蒐集中心。³⁰⁵一份美國國防部於 2005 年 1 月完成的報告，稱該計畫為中共的「珍珠串」(string of pearls) 戰略。質言之，此戰略係中共一箭「三」鵬之計。首先，中共正沿著通往中東的海運線建設一系列的海軍基地；其次，強化與該地區國家的外交關係；第三，中共此刻正快速建立其遠洋海軍、研發飛彈技術、部署新型潛艦，屯儲水下水雷以反制美海軍武力，並

³⁰² Lawrence Spinetta 著，吳晨輝譯，「斬斷中共的珍珠串」，**國防譯粹**，2007 年 1 月，頁 86。

³⁰³ 楊曉輝，中國石油戰略的西南佈局，**當代亞太**，2004 年，第 3 期，頁 10。

³⁰⁴ 五國「馬拉巴爾」軍演，中共密切監控，**青年日報**，2007 年 9 月 9 日，版 5。

³⁰⁵ Lawrence Spinetta 著，吳晨輝譯，「斬斷中共的珍珠串」，**國防譯粹**，2007 年 1 月，頁 84。

保障其自身能源安全。³⁰⁶中共在海外廣布軍事基地及武器擴散的作為，不僅升高了「中國威脅」論，也為此一地區埋下衝突的火種。「麻六甲困境」助長中共擴軍威脅，主因之一緣自中共對能源安全的重視，但中共對能源的獲取，表現出獨佔的性格，此一性格促使中共軍力投射至遠洋，建構「珍珠鏈」戰略，向海外部署軍事基地。³⁰⁷



圖 4-1：中共珍珠鏈戰略圖

據估計在未來二十年當中，中共能源的消耗將大為增加，至 2020 年時中共石油產量每天不夠五百二十萬桶，除非中共積極地尋找新油源，否則中共將面臨能源安全的問題，也因此中共目前已經非常積極地參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之石油及天然氣探勘計劃。³⁰⁸例如中國國家石油公司於 1993 年取得祕魯一處石油的租賃權(但尚不知是否可產油)、同年以 13 億美元向哈薩克購買該國最大油田 Uzen 的六成股份、1997 年 5 月以 10 億美元代價購買蘇丹 Hedlig 油田四成的權益、同年 6 月以 3 億 5000 萬美元的價格購買委內瑞拉兩處地方的採油權、同月又以 43 億美元的高價取得哈薩克 Aktyubinsk 油田的六成股份，而且中共經常以高出對手甚多的價格來爭取得合約，中共也投入 125 億美元來建造四條輸油管和天然氣管線連接中亞油田與中國大陸。由此可知中共對取得石油戰略的熱切心情。

第二、全球化經濟戰略與世界接軌，中共承擔大國責任提供公共財的義務：哈佛大

³⁰⁶ Lawrence Spinetta 著，吳晨輝譯，「斬斷中共的珍珠串」，*國防譯粹*，2007 年 1 月，頁 85。

³⁰⁷ 「馬拉巴爾」軍演凸顯價值同盟與中共擴軍威脅嚴重性，*青年日報*，2007 年 9 月 10 日，版 2。

³⁰⁸ Erica Strecker Downs, *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00).

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指出，冷戰之後只有美國擁有近乎絕對優勢的軍事、經濟、科技、資源、政治穩定、以及如意識型態的「軟性權力」（soft power）。³⁰⁹因此，現今國際社會是由美國獨佔超強地位的單極體系。亮據新現實主義者觀點，單極體系必定會引資新強權的崛起與挑戰，只是時間快慢的問題；而中共是新強權崛起，單極體系將會轉變為多極體系，因此美國現實主義學者無不集中討論在如何建構美國全球外交與安全戰略，以延長美國霸權地位的時間。³¹⁰

中國大陸經濟更加依賴出口，東協十國經濟部長與包含中共在內的六個對話夥伴經濟部長，於 2007 年 8 月 28 日在馬尼拉舉行經濟會議後，宣布將於 2013 年以前，與日本、南韓、印度、中共、澳洲、紐西蘭六個對話夥伴完成自由貿易協定（FTA）。³¹¹中共清楚認知到冷戰之後，傳統的地緣政治世界已經轉變成強調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的新紀元。亞洲開發銀行 2007 年 9 月 17 日，在北京發布「2007 亞洲發展展望更新」報告指出，增長強勁的出口和投資以及旺盛的消費，將促使大陸經濟今年增長 12.2%，高於原先預測的 10%。亞銀的報告指出，大陸經濟增長快於預期的趨勢，可能將延續到 2008 年。因此，亞銀將明年（2008 年）的大陸經濟增長率，由今年（2007 年）3 月的預測值 9.8%，上調至 10.8%。報告認為，大陸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第二產業，特別是鋼鐵、電力、化工和石油加工業。同時，企業較高的盈利能力、銷售的大幅提升以及持續較低的利率水準，促進了大陸投資的快速增長。³¹²

中共經濟的快速成長除了中共本身獲利之外，從全球化的角度觀之，與世界接軌的腳步越快。從經濟學得觀點切入得知，國際經濟秩序是全球各國都需要的公共財，這一

³⁰⁹ 所謂「軟性權力」是指非直接性的權力，亦即具有間接影響對方去作我們所希望他去做的事的能力，在國際政治層面，通常是指文化、意識型態、國際組織等，此外如國家威望等，也有可能使國家在某些議題具有軟性權力。詳見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 188 & p. 284, n. 25.

³¹⁰ 在面對 90 年代的一連串的新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批評之後，現實主義再次出發嘗試建構冷戰後的國際秩序的理論分析，詳見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p. 5-51; Michael Mandelbaum,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Spring 1997), pp. 49-88.

³¹¹ 東協秘書長王景榮表示，東協與南韓的自由貿易協定可望於 2018 年前完成，與中共於 2010 年前、與印度於 2011 年前、與日本於 2012 年前、與紐、澳則於 2012 年前，但東協希望於 2009 年前完成。成員包括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賴國與越南的東協，準備於 2015 年前成立統合的東南亞經濟共和體。東協六年內完成與對話夥伴完成 FAT，詳見青年日報，2007 年 8 月 28 日，版 2。

³¹² 大陸今年經濟成長 11.2% 通膨 4.2%，聯合報，2007 年 9 月 18 日。

公共財是由若干同類產品構成的系列，包括國際金融秩序、國際能源秩序、國際商品交易秩序等。在國際社會中公共財的特點是，其他國家可以免費享受或僅付出很低的成本，經濟學中所述「搭便車」情況則無法避免。這將使強權國在國際競爭中，與對手相比處於不利態勢，必將導致均衡的打破，強權國越來越無意也無力維護公共財，中共現正從享受國轉型為公共財的提供國。

第三、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全球經濟的「軟體」要素（資訊、金融）在安全方面變得格外脆弱：資訊時代能夠影響國際經濟安全、國家經濟安全的主體大大的增加。中共隨著資訊時代的到來，國家經貿成長速度快。面對資源的全球爭奪日益激烈，資訊的獲得、交換、運用的安全為首要，這也是中共所面臨國際經濟安全狀況的特點。全球快速發展的一股動力就是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不斷創新。由於現代尖端科技高度發展的結果，特別是資訊革命以來，促使人類的行動日益超出時空的限制，各國皆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互相影響。由於科技進步與政府對貨物與資本流通的限制解除，國際經濟在最近幾年受到跨國經濟或全球經濟的出現，讓市場與企業在全球「無疆界的世界」運轉，並脫離了國家的束縛。³¹³而全球網絡化的關鍵除了價值、制度和經濟的因素外，莫過於科技的進展，科技的發展和競爭形成全球網絡的互動狀態，使得全球問題機制進入了新的階段。

以通訊、傳播技術而言，其應用在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上產生相當便捷的功能，金融與資本流通、華爾街股市和全球股市的共振現象、傳播全球網絡的建立（如 CNN、NBC）、網際網路的興衰等皆是科技帶動人類活動全球網絡化的例子，但金融與資本流通不可控制的變數和複雜度因此陡增，或造成全球性振盪。一般說來，科技的進展似乎為人類提供積極、正面的功能，而在科技樂觀決定論者的眼光中，科技是驅動和解決全球人類文明進步的核心，但從目前的經驗觀察，科技進展不但未完成等同於人類工業文明的進步，反而遞生不少風險。另外，以最受到重視的通訊、傳播技術、生物科技及環境工程科技為例，分別衍生新的全球問題視野。³¹⁴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策略採工業化與信息化並重、基礎產業與加工業並重，傳統產

³¹³ Vic George Paul Wilding 著，林萬億、周淑美譯，**全球化與人類福利**（台北：五南，2004年），頁5。

³¹⁴ 翁明賢、吳建德主編，**國際關係**（台北，五南，2006年8月），頁215。

業與新興產業並重。選擇支柱（旗艦）產業的標準為：需求所得彈性大、已有規模或技術基礎、有利大量就業、吸收現有科技的能力。³¹⁵依據這些標準所規劃未來十年的支柱產業分別為：機械、電子資訊、石油化工、建築業、汽車產業。但大陸現階段資金短缺，技術落後，比較利益仍在勞力密集產業。上述產業之中，除營建業外，都是資本或知識密集產業，對提升就業或減低貧富差距助益不大，反而會擴大區域發展失衡與所得分配不均。尤其是，電子資訊與其他新興科技產業的發展集中於沿海地區，對科技人才的需求殷切，薪資節節上升，內陸地區卻有大批低素質的剩餘勞動，賺取最低工資。「數位落差」的現象勢將擴大區域的失衡。

第四、中共金融資本流動增大和加快的同時，相關連的是中共人民幣的危機：當代國際金融形勢貿易自由化的問題是，中共身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國家整體經濟增長速度快，在經濟全球化、區域集團化，中共經濟金融面臨著新的挑戰為：1.金融全球化 2.金融自由化 3.金融業的創新 4.金融證卷的膨脹 5.電子系統的發展。國際金融日益向全球化發展，與瞬息萬變的國際金融形勢體系，影響到國際社會的穩定與國際金融市場安全。國際金融與世界政治的緊密相連，就必然涉及到國際安全，因為沒有一個穩定與安全的國際環境，就不可能有一個穩定有序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也是金融國際化發展的必然結果。2007年9月8、9兩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將於澳洲雪梨舉辦第15屆非正式領袖會議，美、中「布、胡會」期間，布希將和中共國家主席舉行會談，探討美、中巨大的貿易逆差，2006年已達2300億美金。布希總統表示，中共若能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將有助於紓緩雙方貿易的失衡。³¹⁶

質言之，中國大陸金融體制不健全、金融仲介機能不彰，雖有高的儲蓄率，但儲蓄流入投資的管道受阻，提高資本成本。金融問題的癥結在於(1)金融機構的國有化程度高，缺乏競爭並導致不良債權的累積，銀行資產品質不良，呆帳比率高達25%；(2)各級政府和金融機構，企業集團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影響金融監理之獨立，公正與嚴謹；(3)金融監理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監管銀行、資本和金融市場運作的機制與

³¹⁵ 李京文主編，**21世紀中國經濟大趨勢**（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34。

³¹⁶ 「布希斥：APEC不是中國的高峰會」，**中國時報**，2007年9月6日，版12。

經驗。³¹⁷

大陸經濟仍有相當程度的不穩定性。它在短期內面臨大量失業與通貨緊縮的困境。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調查，1998 年底失業率為 4.75%。由於中國採用較寬的統計定義，實際的失業率遠高於這個數目。³¹⁸大陸加入 WTO 之後，據估計將減少二千三百萬至四千萬個工作機會。失業問題的擴大是社會不安的一個引爆點，其解決的關鍵因素在於經濟的持續成長。過去幾年來，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大陸沒有達到預期的經濟成長，導致失業率攀高、通貨緊縮的困境，2000 年景氣改善，通貨緊縮的壓力稍減，但隨世界景氣的趨緩，通貨緊縮的威脅仍然存在。

第五，中共經濟安全問題已在國際安全和國家安全領域中居於核心地位：經濟利益是國家利益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經濟安全是對國家、民族的經濟利益的維持與拓展，是國家、民族最基本的生存安全，更是國際安全體系的基礎。因此，經濟安全問題也毫無疑問地在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領域中，居於主導和核心的地位。冷戰時代，中共國家經濟問題被美、蘇兩大集團以核武器為核心的軍事、政治對抗所掩蓋，中共國家經濟發展處於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中共自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後，國家整體「綜合國力」大幅攀升。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體系運作下，隨著全球區域貿易的迅速增加，經濟安全、經濟利益制約著歐美國家的國力消長。質言之，世界國家體系均以敵國的經濟為戰略制約與打擊目標。

經濟安全問題已在當代國際安全和國家安全領域中居於核心地位。經濟安全問題，日益通過國際宣言、協定、規則得到表達。歐美等國將以國際經貿組織為平台的對話機制，主導中共面對國際安全，中共國家經濟戰略安全的制定，將面臨嚴峻的挑戰。未來十年大陸經濟仍將維持快速成長，但充滿變數與不確定性，關鍵在於國有企業與金融改革的成效、外人直接投資的成長以及加入 WTO 的衝擊。雖然中共當局對於金融與國有企業改革，顯示相當魄力，政治的不穩定性是否會影響改革速度與魄力，仍有待觀察。

³¹⁷ 張蘊嶺、趙江林主編，**走發展、合作、開放之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 年），頁 24。

³¹⁸ 如大多數國家將勞動人口界定為 16-65 歲人口，大陸則界定為男性 16-60 歲，女性 16-55 歲。其次，一般定義的失業者包括工作中斷者，與新加入勞動市場但尚未找到工作者。大陸的定義則不包括後者。根據王朝瑞估計，大陸各產業隱性失業率為 18.8%，詳見王朝瑞，「大陸人口增長與對業態勢前瞻」，**台海兩岸前瞻探索**，24 期，2000 年 11 月。

1997 亞洲金融危機瞬間爆發，在這次金融風暴中，人民幣一直未受影響，反而在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甚至呈現升值壓力。當時由於受到南韓情況的影響，國際間對於人民必悲觀的論調逐漸抬頭，轉而強調中共的國有企業營運不佳及金融機構大量不良放款等問題，並擔憂外人對中國的投資縮減，而使人民幣即將加入貶值行列之說甚囂塵上。根據標準普爾在 1997 年 10 月的觀察，由於國有企業營運效率不彰，中國銀行壞帳比例已達 24%。另一方面，中國的外債總數逐年攀升，至 1996 年 6 月底，外債餘額已達 1186 億美元，市場人士異擔憂高額外債將可能導致債務危機。但是，中共外債以中長期外債為多，並無迫切的償還問題，且銀行多為國營銀行，雖有壞帳問題，但以中共的國營體制，當不致放任銀行倒閉。³¹⁹大陸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與地方勢力抬頭，提升大陸以經濟戰略代替軍事戰略，成為中共「綜合國力」提升的主軸與國家利益之所在。中共要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同時深化財稅、金融、計畫體制改革，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³²⁰

第三節 外交層面

獨立自主是中共外交的基本立場和根本出發點。³²¹毛澤東時代的獨立自主外交原則是通過結盟戰略來體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改革開放為基本點的國家發展戰略，於是在外交戰略上隨即進一步確立獨立自主外交的主導地位。鄧小平時期，在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目標下，提出了「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為原則的獨立自主外交戰略。³²²江澤民時期傳承鄧小平理論，把發展和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作為外交政策的基石，採取「穩定周邊、立足亞太、面向世界」的外交戰

³¹⁹ 黃仁德，林進煌，「亞洲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基金的角色」，**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 1 期，2007 年，頁 108。

³²⁰ 十七大定調 反腐、均富、黨內民主，2007 年 6 月 27 日，**聯合報**，版 18。

³²¹ 宮力，「試論毛澤東的外交思想」，**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第 4 期（1999 年 10 月），頁 89~97。

³²² 葉自成，「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00 年 1 月），頁 5-10。

略，在此理念下，1997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由江澤民所提出的「與各國尋求共同利益的會合點、擴大互利合作、堅持對話、不搞對抗、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充分發揮在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作用。」，成為中共發展多邊外交的官方重要宣言。³²³準此，江澤民時期力圖朝以下幾點處理全球性的外交議題：（一）審慎看待以美國為首形成的國際新秩序；（二）逐步加強對聯合國的參與；（三）積極推進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各成員國的合作；（四）推動中國成為國際會議中心。³²⁴

十六大之後，中共在外交戰略上仍堅持其獨立自主、不結盟的路線，並強調大國外交、睦鄰外交的路線。胡錦濤在十七大的報告中，再次強調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並繼續和發達國家加強戰略對話，增進互信，深化合作，推動相互關係。此外，對於周邊國家亦將持續貫徹與鄰為善的周邊外交方針，加強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的關係，積極開展區域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區環境，並支持國際社會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改善民生，縮小南北差距。³²⁵雖然中共近年來持續其一貫的大國外交策略，惟鑒於國際環境的改變，隨著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增加、恐怖主義的興起、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抬頭、局部衝突的頻仍、以及南北差距的擴大，中共在國家新安全觀的理念之下，基於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理論基礎，提出其對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並把此一任務正式宣布為新世紀應致力完成的三大任務之一。³²⁶有鑒於此，中共在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上，有以下幾點特點：（一）強調全面參與，力爭更大的發言權，這在中共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申辦奧運問題上得到充分的體現；（二）主動加入地區性，尤其是周邊利害相關地區的國際組織，甚至提出建立多邊機制的倡議，如倡導和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三）致力於發展「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國家關係。³²⁷

³²³ 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1997年外交政策回顧」，*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7年），頁2-20。

³²⁴ 汪新等著，*讀懂江澤民：江澤民治黨治國方略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頁151-153。

³²⁵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全文」，文匯報（香港），2007年10月15日。

<http://news.wenweipo.com/2007/10/15/IN0710150091.htm>，檢索日期：2010年11月25日。

³²⁶ 其他二個任務是完成中國的現代化和統一大業，參閱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143-185。

³²⁷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頁247-248。

此外，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安全的概念範圍逐漸擴大。尤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化的背景之下，面對現代恐怖主義、毒品威脅及其他跨國犯罪的挑戰，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因此，世界各國應在本地區和全世界範圍內就解決上述全球性問題開展最廣泛的合作，並做出實際貢獻。³²⁸隨著中國的崛起，其國家戰略利益在於逐漸拓展自己的實力，如加強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生態安全的維護等。有鑒於此，中共在外交戰略方面便強調積極融入國際社會，以拓展其國家戰略意義。

回顧中共在鄧小平時期，大都將重心放置於國內問題上，而不可避免地對國際事務採取較為消極的態度。但自從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中共認為尋求合作、避免對抗已成為拓展大國關係的主流，³²⁹並積極推動大國外交與發展合作夥伴關係。後期開始，中共便開始越來越廣泛地談論「負責任的大國」的角色，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王逸舟即指出：「90 年代末金融危機中，中國扮演的角色是其開始發揮負責任作用的轉折點，或曰分水嶺。此前，中國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不大，此次危機讓中國認識到鄰居的利益同樣重要。」³³⁰此外，中共亦同時在朝鮮問題、印巴衝突上開始扮演越來越積極的角色，凡此都在表明，中共的外交思維正在面臨重要的變化。尤其對於「非傳統安全」領域方面以越來越多樣的面目出現，包括油輪漏油污染、核電站事故、金融危機、跨國網路攻擊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等，都因全球化的結果使得這一切災難的傳播速度更快，影響範圍也更加寬廣，並幾乎開始改寫國際關係與國際戰略的定義。³³¹有鑑於此，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除了持續貫徹其既有的外交戰略外，更積極將非傳統安全領域納入其整體戰略思維之中，除維護其國家利益外，更可達到綜合性和共同性安全的目標。

近年來中共領導人在多邊及雙邊場合多次呼籲要樹立新安全觀，自江澤民於 1997 年提出新安全觀的宣示後，以通過合作促進安全的新安全觀已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成分，³³²導致中共外交戰略思想有幾點較為突破的演變：（一）逐漸強調以和平的手段

³²⁸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人民日報*（北京），2003 年 5 月 30 日，第 6 版。

³²⁹ 蔣本良，「當前大國關係新格局」，*國際問題研究*（北京），1998 年第 2 期（1998 年 5 月），頁 14。

³³⁰ 「中國經濟風暴中崛起」，*文匯報*（香港），2007 年 7 月 4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7/04/NS0707040002.htm>>，檢索日期：2010 年 12 月 30 日。

³³¹ 王逸舟，「非傳統安全時代的外交思維」，*人民網*，2006 年 5 月 23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764/63787/63790/4397145.html>>，檢索日期：2011 年 3 月 10 日。

³³² 「中國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文件」，*人民日報*（北京），2002 年 8 月 2 日，第 3 版。

處理國際問題；(二)從「反霸」的大國角色朝向睦鄰外交、區域合作發展；(三)針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的威脅，提出「新安全觀」的戰略構想。

中共在新安全觀的戰略思維之下，其實現安全的途徑係強調合作安全理論的概念，主張共同利益對安全的保證，以互信要求與各大國經常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以及重大行動展開對話與相互通報，並以協作方式解決爭端，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換言之，亦即主張共同利益對安全的保證，強調以信任、對話、和平談判為主要途徑，³³³此途徑也與其十七大後「維護世界和平，開展區域合作」的外交宗旨不謀而合。茲就其具體實踐途徑分述如下：

一、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合作

中共在新安全觀的理念下，藉由部分國家主權的讓渡，形成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共同合作空間。³³⁴例如：在 SARS 期間接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監督，同時也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南中國海共同行動宣言」；此外，在參與國際組織方面，中國也積極參加了與東協 10+1 自由貿易區、10+3 組織、上海合作組織、APEC、東協地區論壇等。³³⁵為求致力於深化和亞太地區各國謀求共同安全與發展，尤其在東協地區論壇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已逐漸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官方多邊對話管道，更是中共積極運作的目標。雖然十六大之前，中共已與東協於 2002 年簽署了「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啟動其與東協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進程，又發表了「關於非傳統安全區域合作聯合宣言」，以及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就和平解決爭議、共同維護地區穩定和發展南海合作達成共識；然而十六大之後，中共還於 2003 年 6 月在金邊舉行的東協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上，提出在論壇內適時舉辦「安全政策會議」的建議。2003 年 10 月，中共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與東協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係」；此外，隨著「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³³⁶的不斷發展

³³³ 王逸舟，「論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4 期（1998 年 4 月），頁 23-26；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01-103；吳英明、林麗香，「全球化與中國新安全觀」，*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 2 卷第 3 期（2000 年 3 月），頁 15。

³³⁴ 王崑義，「中國的『和諧外交』與對南太平洋的擴展」，發表於台灣與南太平洋學術研討會（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2007 年 6 月 9 日），頁 23。

³³⁵ 李維亮、許克儉主編，*軍事體育年報*（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02。

³³⁶ 中共於 1996 年 4 月倡議推動「上海五國組織」（成員國為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該組織並於 2001 年 6 月 15 日由以上成員國加上烏茲別克計六國元首共同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

擴大，中共又於 2003 年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和「莫斯科宣言」等重要文件。此外，在其他方面如 2003 年 6 月在泰國清邁舉行的亞洲合作對話第二次外長會議，同意推進農業、科技等 17 個領域的合作，並啟動亞洲債券基金，實際運用新的安全觀，促進與亞洲各國之間的合作。

揆諸中共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合作，基本上不離中共近年來提倡多邊主義的途徑，藉「合作」、「不對抗」的原則，從而擴大共同利益的規模，以保持地區合作的非排他性。誠如胡錦濤在 2008 年博鰲亞洲論壇中所倡言：「積極借鑒世界其他地區的有益發展經驗，通過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東亞—拉美合作論壇、亞洲—中東對話等平臺，加強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對話和合作，以及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廣泛交流合作中實現共同進步。」更足以窺見中共外交戰略的目標。³³⁷

二、加強與大國之間的互動與周邊關係

中共本於尋求穩定合作、擱置分歧的理念，積極推動與大國互動，尤其在解決國際安全問題上，更從建立互信機制著手，除加強與美、俄、日、歐盟等國建立不同層次的戰略夥伴關係外，更強化其與周邊國家之友好關係，以減少衝突的發生。³³⁸中共在倡議國家新安全觀之後，迅即於 2002 年 7 月 31 日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得到東協國家的響應，會後東協國家發表一項齊心打擊區域內恐怖攻擊的聯合聲明，共同進行預防和制止所有型式恐怖活動。³³⁹此外，中共雖早於 1996 年 4 月即和俄羅斯建立「平等互信、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新安全觀提出之後，雙方復於 2001 年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01 年 7 月 16 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簽署「中俄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聲明中指出中俄兩國都認為，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有助於建立一個穩定、民主、不對抗、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這一趨勢客觀上符合所有國家的根本利益」。在兩國關係發展趨於穩定和制度化之後，使得中共在二

立宣言」，宣告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組織」。

³³⁷ 林麗香，「解放軍政治角色轉變之研究」，**中共研究**（臺北），第 39 卷第 11 期（2005 年 11 月），頁 36。

³³⁸ 現代國際關係編輯部，「大國關係與中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北京），1998 年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42-43。

³³⁹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1-2002）**（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頁 269；孫國祥，「全球治理的困境與東協反恐模式之探討」，發表於第三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台北：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2007 年 11 月），頁 21-42。

十一世紀的周邊安全較具實質性的基礎。³⁴⁰

在與美國的互動方面，十六大後，中共亦把大國外交重心置於中美關係的發展上。³⁴¹實際上，美國部分學者對中共的崛起仍有疑慮，Richard Bernstein 和 Ross Munro 甚至預言接下來的二十年間，中國將成為美國在全球的勁敵；³⁴²Peter Brookes 等人亦從權力的歷史角度觀察，預言中國將是美國的頭號強敵；³⁴³John Mearsheimer 更是斷言，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將支配整個亞洲，而美國將竭力阻止中國獲得地區霸權的地位，中國僅僅在迅速發展這個事實的基礎之上，便容易引起中美之間激烈且危險的競爭。儘管如此，中美兩國仍致力於改善雙邊關係，特別是 2001 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後，布希政府基於國際反恐因素亟需中共配合，雙方關係也日趨改善。中共所冀求的是除仰賴與美國合作來保持地區穩定外，也希望藉由雙方關係的強化來緩和與美日安保同盟的效應。³⁴⁴2003 年 6 月和 10 月，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布希分別在法國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會議期間和曼谷 APEC 會議期間會晤，就進一步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達成重要共識。同年 12 月，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應邀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此次訪問乃胡溫體制形成之後，中共新一代領導人首次訪美。雙方並商定，副外長級政治磋商、第六次國防部副部長年度防務磋商和第四次反恐磋商於 2004 年在北京擴大舉行。³⁴⁵2007 年以來，中國副總參謀長葛振峰訪美，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佩斯（Peter Pace）、太平洋司令基亭（Timothy Keating）等訪問中國，說明了雙方高層互訪次數已有增加；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M. Gates）並於同年 11 月訪問中國，兩國建立了軍事熱線溝通管道。³⁴⁶

此外，中共分別於 1997 年 5 月與法國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全面夥伴關係」；1997

³⁴⁰ 張雅君，「『十六大』後的中共外交：相互依賴深化下的利益、挑戰與政策取向」，*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3 年 3 月），頁 16。

³⁴¹ 汪新等著，*讀懂江澤民：江澤民治黨治國方略研究*（臺北：華文出版社，2006 年），頁 25。

³⁴²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Apr 1997), p. 18-31.

³⁴³ Peter T. R. Brookes, "Strategic Realism: The Future of U.S.-Sino Security Relations," *Strategic Review* (Summer 1999), pp. 53-56; Fareed Zakaria, "China: Appease or Contain? Speak Softly, Carry a Veiled Threa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18, 1996), p. 36.

³⁴⁴ 張雅君，「『十六大』後的中共外交：相互依賴深化下的利益、挑戰與政策取向」，頁 16-17。

³⁴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主編，*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52-53。

³⁴⁶ 林正義，「美國國防部長蓋茲訪中與美中軍事熱線」，*戰略安全研析*，第 32 期（2007 年 12 月），頁 10-12。

年 11 月與加拿大建立「跨世紀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1998 年 10 月與英國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³⁴⁷整體而言，中共不斷積極發展和歐盟的關係，1998 年雙方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2001 年建立全面夥伴關係；2002 年雙方更新政治對話協議；2003 年 10 月，中共發表了首份對歐盟政策文件，雙方在各自政策文件中均主張提升中歐關係的戰略成分，加強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合作，構築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³⁴⁸

十七大之後，溫家寶在 2007 年 11 月初即開始加強對周邊國家的訪問，包括在烏茲別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六次會議，及對烏茲別克、土庫曼、白俄羅斯和俄羅斯進行正式國事訪問，並舉行中俄總理第 12 次會晤。³⁴⁹在對日關係方面，2007 年 12 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訪問中國後，兩國關係似乎回到正常交流的軌道。³⁵⁰中日兩國除持續雙邊交流與對話外，福田康夫於 2008 年 5 月 7 日胡錦濤訪日期間，雙方簽訂新的「共同文書」，確定兩國未來的「戰略互惠走向」。這份文件的重點包括雙方同意東海油田問題將以和平方式解決，由兩國共同開發；中國亦將支持日本與北韓關係正常化及爭取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努力。³⁵¹此外，在對南韓關係上，韓國總統李明博於 2008 年 5 月 27 日與胡錦濤舉行雙邊會談，會後李明博表示兩國同意將雙方關係由盧武炫時代的「廣泛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為「未來導向的戰略夥伴關係」，³⁵²雙方並將於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和 2012 年「南韓麗水世界博覽會」分別定為「中國訪問年」和「韓國訪問年」，藉以增進兩國交流。³⁵³綜上所述，中共的外交戰略實際就是其「大國外交」途徑的展現，主要在於透過雙邊模式，建立與大國和周邊國家的夥伴關係，並利用議題聯結的策略，諸如：貿易、投資、武器擴散及反恐行動上與中共的合作，其目的也就是

³⁴⁷ 朱蓓蓓，「全球化與中共安全觀：轉變與挑戰」，頁 102。

³⁴⁸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主編，**中國外交**，頁 272-275。

³⁴⁹ 「溫家寶出訪亞歐將透露十七大後外交新布局」，世界新聞網，2007 年 11 月 1 日。

http://www.worldjournal.com/wj-editor.php?nt_seq_id=1616988，檢索日期：2011 年 4 月 7 日。

³⁵⁰ 石原忠浩，「日中簽署『第四公報』後的日中關係與台灣」，**戰略安全研析**，第 38 期（2008 年 6 月），頁 45。

³⁵¹ 「日中簽署戰略互惠協議文件」，朝日新聞（東京），2008 年 5 月 7 日。

<http://sss.asahi.com/politics/update/0507/TKY200805070034.html>，檢索日期：2011 年 4 月 7 日。

³⁵² 「首爾與北京提升雙邊關係」，韓國時報（首爾），2008 年 5 月 27 日。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08/05/116_24859.html，檢索日期：2011 年 4 月 8 日。

³⁵³ 林正義，「胡錦濤訪韓與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戰略安全研析**，第 42 期（2008 年 10 月），頁 10-11。

要維護其國家安全與利益。

三、參與國際間反恐、反毒等行動

自從 2001 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引起舉世震驚之後，中共當局立即建立了國家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由胡錦濤擔任組長，公安部也成立了反恐怖局，專門負責研究、規劃、指導、協調、推動全國的反恐工作。同時，各省也建立了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及辦公室。

在實際作法上，中共在「911」事件之後支持聯合國及安理會通過一系列反恐決議，又加入及簽署「制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公約」以及「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等，並與有關國家進行反恐磋商和對話。2002 年 6 月，上海合作組織簽署了「關於地區反恐怖機構協定」，2003 年 5 月 29 日上海合作組織在莫斯科舉行第三次高峰會議，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首次參加了這次會議，此次會議決定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於 2003 年 11 月 1 日在北京開始工作，並就伊拉克、阿富汗、反恐鬥爭、毒品泛濫及其他非傳統安全威脅問題進行磋商，決定進一步加強安全合作。此外，中共又於同年 8 月和 9 月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舉行多邊聯合反恐軍事演習，胡錦濤並親自出席觀看代號「長城 2003」的反恐綜合演習。³⁵⁴2007 年以來，中共解放軍與國際間許多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4 月間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俄羅斯聯合反恐軍事演習；8 月間上海合作組織再度在中俄邊境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也是該組織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³⁵⁵尤有進者，針對近年來能源短缺與環境變遷所產生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中共也積極參與於 2008 年 7 月在日本北海道由中、美國、歐盟、日本等先進國家舉辦的八大工業國（G8）高峰會。

綜觀中共新安全觀的架構之下，在整體外交戰略層面上以促進國際合作、應付國際危機（包括反恐、生態保護等）為主，並在經濟、安全、軍事、生態等方面與鄰近國家發展合作。例如：在經濟上建立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強調「10+3 機制」（東協和中、日、韓），逐步形成一緊密的經濟圈；³⁵⁶在安全上，擴展上海合作組織的戰略範疇和目

³⁵⁴ 人民日報（北京），2003 年 9 月 27 日，第 1 版。

³⁵⁵ 王央城，「回顧 2007 年中國軍力發展」，*戰略安全研析*，第 34 期（2008 年 2 月），頁 24-27。

³⁵⁶ 張蘊嶺，「如何認識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國際環境」，*當代亞太*，第 6 期（2003 年），頁 3-14。

標，加強與東協等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在軍事上，積極擴展與主要大國的合作，積極參與反恐、防止武器擴散、聯合軍事演習等；在其他方面推行在農業、科技等領域促進與亞洲各國之間的合作，凡此戰略思維皆有賴外交的手段與方式來完成。

因應全球化議題的不斷擴大，國際合作與國際安全逐漸成為廣泛重視的標的，共同安全亦成了維護國際安全的最終目標。隨著中共的崛起，世界主要大國和亞洲周邊國家對其是否會帶來威脅產生疑慮，而中共方面對此亦有所認知。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大的報告中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胡錦濤在十七大的報告中更重申自十六大以來一貫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順應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為了呼應此一「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共一方面要求繼續發展、壯大，另一方面又必須強調維護世界和平，以化解各國疑慮。因此，中共持續聲稱以平等、協商等和平方式為核心的新型安全觀作為其軍事和外交等戰略思維的基本架構。有鑒於此，中共在非傳統安全層面亦強調積極融入國際社會，並積極在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生態安全等方面厚植自己的實力，達成拓展其國家戰略的意義。

綜觀中共在全球化時代的新安全觀理念與架構下，在國際層面上強調促進國際合作、應付國際危機，並在經濟、安全、軍事、生態等方面與周邊國家發展合作。其具體作法除了在經濟上建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及日、韓之關係，進而希望逐步形成一緊密的經濟圈；另在安全上則期在「上海合作組織」的基礎下，加強與東協等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此外；在具體實踐上，中共也積極朝融入國際社會體制，參與國際會議與國際組織，加強與美、俄、日、歐盟之互動關係，以及參與國際間反恐活動等方面著手。在以新安全觀為基礎之下，最明顯的莫過於中共一改過去對區域安全組織的保守態度，轉而積極朝向綜合經濟與安全多功能組織發展。本研究發現中共的新安全觀雖然以傳統安全領域的軍事、外交戰略思維為架構，並融合了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經濟、環境等概念，然而在具體實踐上仍是以外交戰略為主要途徑，亦即主張共同利益對安全的保證，強調以信任、對話、和平談判為主要途徑，此途徑也與其十七大後「維護世界和平，開展區域合作」的外交宗旨不謀而合。

儘管中共形塑的國家新安全觀，堅持其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則，並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主軸，強調此乃延續鄧小平理論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以獨立自主、不結盟、反霸、不稱霸為戰略思維，更重申「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者」等原則解決國際安全問題，然而國際間對於中國威脅的疑慮仍或存在。雖然中共強調維護與鄰國的良好關係，但是此種現象是建立在目前需要與地區力量合作以實現未來目標的基礎上。因此，西方國家仍然擔心一旦中共日益茁壯，極可能改變自己的利益取向，從而對鄰國和美國在亞太地區構成更多的威脅。再者，台海問題存在著主權和歷史的因素，對於中共積極發展的中美關係儼然是一大挑戰。台海問題造成美國和中共之間目前存在著諸多安全兩難的疑慮，並會影響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準此，雙方為了現狀問題都會在構建區域軍事同盟、加大在相關地區內的軍事存在、追求在戰略武器和防禦能力上的優勢等方面各自努力，如此一來，中美之間的嫌隙亦會有加大的可能。最後，雖然中共堅稱其積極參與國際間反恐活動，不過西方國家對於中共的人權問題以及其所引申出的國家恐怖主義仍多所疑慮。國際教育發展署（IED）歷年來一直對國際恐怖主義和人權問題持續追蹤，並聲稱以政府對自己的人民實行恐怖鎮壓為形式的「國家恐怖主義」—即「來自上面的恐怖主義」比其它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所造成的人權侵犯都要嚴重得多，³⁵⁷該署並據以斷定中共類似以武力鎮壓法輪功的事件，已儼然進行國家恐怖主義和違反人權問題。準此，如何有效處理國際間對其「國家恐怖主義」的疑慮，恐怕是中共在積極發展其國家安全戰略之餘所應思考的另一問題。以上諸多問題均可視為中共在提出國家新安全觀後，國際間對其理念與作為所產生的重大衝擊和挑戰，中共如何在外交戰略和實踐上加以處理和因應，是個值得後續觀察和研究的課題。

第四節 權力轉移理論的比較分析

綜而言之，在國際格局以美國為首的現況下，中共所面臨的威脅是美國為維持其現有地位，而企圖在中國周邊建立霸權控制。為因應此一隱憂，中共必須持續貫徹其現代

³⁵⁷ 「聯合國國際教育發展署聲明」，2001年10月21日。<http://big5.yuanming.net/articles/200110/2193p.html>，檢索日期：2011年4月13日。

化的建軍思想。尤其在中共新安全觀的戰略思維中，為因應可能的外在威脅，經濟發展結合軍事發展乃是厚植中共綜合國力與建立一個大國地位的手段。在軍事上，中共的軍力仍會逐步地實現正規化、現代化的目標，並以平等協商的方式與西方大國進行交流與合作。

儘管中共形塑的國家新安全觀，堅持其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則，並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主軸，強調此乃延續鄧小平理論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以獨立自主、不結盟、反霸、不稱霸為戰略思維，更重申「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者」等原則解決國際安全問題，然而國際間對於中國威脅的疑慮仍或存在。雖然中共強調維護與鄰國的良好關係，但是此種現象是建立在目前需要與地區力量合作以實現未來目標的基礎上。因此，西方國家仍然擔心一旦中共日益茁壯，極可能改變自己的利益取向，從而對鄰國和美國在亞太地區構成更多的威脅。再者，台海問題存在著主權和歷史的因素，對於中共積極發展的中美關係儼然是一大挑戰。台海問題造成美國和中共之間目前存在著諸多安全兩難的疑慮，並會影響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準此，雙方為了現狀問題都會在構建區域軍事同盟、加大在相關地區內的軍事存在、追求在戰略武器和防禦能力上的優勢等方面各自努力，如此一來，中美之間的嫌隙亦會有加大的可能。最後，雖然中共堅稱其積極參與國際間反恐活動，不過西方國家對於中共的人權問題以及其所引申出的國家恐怖主義仍多所疑慮。國際教育發展署（IED）歷年來一直對國際恐怖主義和人權問題持續追蹤，並聲稱以政府對自己的人民實行恐怖鎮壓為形式的「國家恐怖主義」—即「來自上面的恐怖主義」比其它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所造成的人權侵犯都要嚴重得多，該署並據以斷定中共類似以武力鎮壓法輪功的事件，已儼然進行國家恐怖主義和違反人權問題。準此，如何有效處理國際間對其「國家恐怖主義」的疑慮，恐怕是中共在積極發展其國家安全戰略之餘所應思考的另一問題。以上諸多問題均可視為中共在提出國家新安全觀後，國際間對其理念與作為所產生的重大衝擊和挑戰，中共如何在外交戰略和實踐上加以處理和因應，是個值得後續觀察和研究的課題。

第五章 結論

本文的主旨在探討冷戰後美中的權力互動關係的實質內容。有二個議題圍繞在這個主軸上，第一、中美之間的權力關係互動，其實質內容為何？第二、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否能夠提供合理的解釋？本文試圖從「權力轉移理論」為立論基礎，希望從中能對上述問題找出合理的答案。

第一節 研究回顧

本文在第二章除探討「權力轉移理論」外，並就英美權力轉移過程作一列述，其內容簡要如下：

美國的崛起過程有其階段性。在建國成立之後至 19 世紀末，美國首要目標是成為美洲地區的霸權國，採取三個政策作為。

其一，向外擴張：從 19 世紀初期，美國有計畫的向外擴張，尤其是向其西部大陸擴張。1803 年美國從法國手中購買路易斯安納土地；1919 年從西班牙手中購得佛羅里達；1845-1848 年的短時期內，對德州、俄勒岡與加州的兼併；1953 年美國又從墨西哥手中購得哥斯登。至此，美國橫跨大陸的擴張大致上已經完成。

其二，經營所獲得的土地：當完成西部大陸擴張後，美國的安全考量從領土的向外擴張轉為在既有的領土內締造強大的國家，包括 1)發動內戰以消除奴隸制與排除聯邦分立的威脅；2)遷移印地安人；3)吸納大量移民來美國；4)建立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

其三，減少歐洲其他國家在美洲的影響：19 世紀的美國政策制訂者實際上不只是考慮將美國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還要將歐洲國家永遠地趕出西半球。只有如此，美國才能使自己成為地區霸權國，避免受制當時歐洲大國的威脅，而獲得高度的安全。

20 世紀是美國成為全球霸權的世紀。美國想成為全球霸權國，需要走出美洲的「實力」與「機會」。這兩項條件要素在 20 世紀前期形成，「實力」的部份以經濟與工業潛力為基礎，具體表現在軍事力量上，尤其是海軍力量的壯大；「機會」的部份則落實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面對美國的崛起，英國積極的採取因應措施，包括了從 19 世紀初期的軍事衝突到 19 世紀末期的默認與援助。這種轉變取決於雙方滿意度的增加。而滿意度的增加又源自於雙方文化同質性（政治文化、血緣關係）、戰略克制，以及英國需要美國奧援以因應歐陸的局勢發展。雙方滿意度的增加使得即便兩國在 1880 年代已產生了權力均勢，卻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戰爭來進行權力轉移。

在第三章超級強權的全面管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布局部份。本文認為，美國做為後冷戰時期的超級強權，首要目標乃避免霸權地位受到挑戰。美國最擔心中國崛起後挑戰其霸權地位，因此正在進行全面性的戰略佈局來加以防範，主要包括軍事、經濟與外交三個部份來進行。

在軍事方面，首先，美國全球軍事戰略重心從歐洲調整到亞太地區。蘇聯瓦解後，美國對於在亞太的駐軍做了部分調整，但仍保持著一定數量的存在。從 1998 年開始，美國相繼公佈一系列有關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文件，包括克林頓時期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美國軍事戰略》、《2025 的亞洲》(Asia 2025)、《1998 年東亞戰略報告》。小布希時期的《2001 年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這些報告共同的重要內容之一，並不是爭論裁減在亞太的駐軍數量的多寡，而是明確的強調在 21 世紀前 15 年的「戰略機遇期」，美國軍事戰略的重心應向亞太地區傾斜(也被稱為「戰略東移」)，維持一定數量的駐軍。

其次，強化與日本軍事同盟的關係。《美日安保條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為了對抗蘇聯的產物。蘇聯瓦解，基於對抗蘇聯而建立的《美日安保條約》理應廢棄不用，但顯然美日兩國並無如此，且進一步的強化。1997 年 9 月，美日公佈修訂後的《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並且開宗明義指出主要目的包括三個部份：1)美日平常時候的合作；2)日本遭受軍事攻擊而「有事」時的合作；3)「日本周邊事態」的因應。其中，「周邊事態」是最受關注。針對「周邊事態」，日本進一步在 1999 年 5 月通過《周邊事態法》，並於 2001 年 5 月在其新成立的防衛廳辦公室設立「美日軍聯合司令部」。之後，美日又建立安全和防衛問題的「協調機制」，稱為「美日安全諮詢會議」。該機制自 2002 年開始每年定期會晤商討安全事宜，並且對外發表聲明。

其三，與中國進行軍事對話與交流。1997年10月柯林頓與江澤民同意雙方高級官員交流制度化，創立《美中防務協商會談》，希望通過每年會晤進行戰略對話來提高相互在軍事方面的透明度。此外，美中從2003年就建立軍事熱線進行協商，歷經五年後於2008年2月雙方國防部簽署軍事熱線的協議。對中國而言，這是首次與外國在國防部層面設立的熱線。

在經濟方面，美國對中國的戰略佈局採取兩種方式同時進行，一方面以雙邊對話方式，要求中國市場更開放、貿易更自由化。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對話及實踐包括了貿易不平衡、紡織品的輸出配額、農產品問題、電信金融服務業，以及智慧財產權等。另一方面以多邊方式，也就是透過國際經濟組織的方式與中國進行多邊接觸，希望中國能融入既有的國際組織架構，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在外交方面，美國對中國的戰略佈局，主要在兩個方面：

其一，推動雙邊領導人的互訪。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開啟美國推動與中國領導人互訪的大門。後冷戰時期美中領導人多次互訪，並發表聯合聲明。

其二，要求中國遵守人權規範。美國透過與中國的人權對話以及國務院每年發表的《人權報告》方式要求中國遵守人權規範。美國與中國人權對話開始於1990年，到了2002年12月共舉行13次對話。之後，雙方在人權議題上出現分歧，導致中斷人權對話長達6年之久。2008年5月，雙方重新恢復對話。中國的人權狀況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已成為每年《人權報告》關注的焦點。在《人權報告》中，詳盡說明中國政府對人權的迫害，以及是否有所改善。從1993-2008年的每年報告中，發現負面報導中國的人權狀況佔據極大多數。美國國會根據《人權報告》的內容，常常要求行政部門對中國政府忽視人權的現象應該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包括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譴責中國的人權政策，迫使中國簽署有關人權的國際條約，還有必須釋放持不同政見者。

在第四章崛起強權的全面挑戰：中國對美國的戰略佈局部份。本文認為，中國一方面要增強實力，另一方面卻要避免被其他國家，尤其是超級強權認為它的崛起是對其霸權地位的威脅，是對既有秩序的挑戰。因此，中國對美國所採取戰略佈局如下：

在軍事方面，就長期的發展趨勢觀察，中共的軍事戰略規劃正集中精力與資源，致

力於獲取一些關鍵性的武器系統，使中共能夠擁有較有效的嚇阻及控制戰力。尤其是在海軍發展方面，中共更致力於提升海軍的戰力，使其能發揮海上阻絕與監控的能力。就短中程發展趨勢觀察，共軍將偏重於強化「非對稱性」能力及戰略的實力，方以彌補其整體戰力不足與落後的弱點。

中共未來長遠的軍力發展方向，受到兩個關鍵性因素的影響；第一是受到波灣戰爭的刺激。共軍領導階層下定決心要發展如同盟國聯軍一般的戰力。從中共軍方出版的刊物及一些優先發展的提升軍力專案觀察，共軍已經決定要強化在高科技條件下，從事局部性有限戰爭的作戰能力，並企圖以摧毀或破壞敵國軍用及民用資訊系統為目標，以迫使敵人屈服。假定共軍繼續朝向高科技化及資訊戰的方向，發展其未來的主要戰力；同時在經濟資源不中斷，大陸內部政局維持穩定，以及中共高層領導穩固的前題下，至 2015 年左右，共軍將可部署類似美國在 1990 年代初期等同的戰力。此外，共軍在資訊戰力方面，可能在某些部份，可以挑戰任何敵對勢力的先進系統。

在經濟方面，未來 10 年大陸經濟仍將維持快速成長，但充滿變數與不確定性，關鍵在於國有企業與金融改革的成效、外人直接投資的成長以及加入 WTO 的衝擊。雖然中共當局對於金融與國有企業改革，顯示相當魄力，但政權接班在即，政治的不穩定性是否會影響改革速度與魄力，仍有待觀察。大陸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與地方勢力抬頭提升大陸以經濟戰代替軍事戰的可能性。隨大陸經濟的全球化，其經濟發展的速度與動盪都會加快，除非其經濟改革成功，我們甚至不能排除發生金融風暴的可能性。一旦經濟發生困難（改革失敗或發生金融危機），我們需要預防其以軍事手段解決經濟困境的可能性。

在外交方面，綜觀中共在全球化時代的新安全觀理念與架構下，在國際層面上強調促進國際合作、應付國際危機，並在經濟、安全、軍事、生態等方面與周邊國家發展合作。其具體作法除了在經濟上建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及日、韓之關係，進而希望逐步形成一緊密的經濟圈；另在安全上則期在「上海合作組織」的基礎下，加強與東協等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此外；在具體實踐上，中共也積極朝融入國際社會體制，參與國際會議與國際組織，加強與美、俄、日、歐盟之互動關係，以及參與國際間反恐活

動等方面著手。在以安全觀為基礎之下，最明顯的莫過於中共一改過去對區域安全組織的保守態度，轉而積極朝向綜合經濟與安全多功能組織發展。本研究發現中共的新安全觀雖然以傳統安全領域的軍事、外交戰略思維為架構，並融合了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經濟、環境等概念，然而在具體實踐上仍是以外交戰略為主要途徑，亦即主張共同利益對安全的保證，強調以信任、對話、和平談判為主要途徑，此途徑也與其十七大後「維護世界和平，開展區域合作」的外交宗旨不謀而合。

雖然中共強調維護與鄰國的良好關係，但是此種現象是建立在北京目前需要與地區力量合作以實現未來目標的基礎上。因此，西方國家仍然擔心一旦中共日益茁壯，極可能改變自己的利益取向，從而對鄰國和美國在亞太地區構成更多的威脅。再者，台海問題存在著主權和歷史的因素，對於中共積極發展的中美關係儼然是一大挑戰。台海問題造成美國和中共之間目前存在著諸多安全兩難的疑慮，並會影響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準此，雙方為了現狀問題都會在構建區域軍事同盟、加大在相關地區內的軍事存在、追求在戰略武器和防禦能力上的優勢等方面各自努力，如此一來，中美之間的嫌隙亦會有加大的可能。最後，雖然中共堅稱其積極參與國際間反恐活動，不過西方國家對於中共的人權問題以及其所引申出的國家恐怖主義仍多所疑慮。國際教育發展署（IED）歷年來一直對國際恐怖主義和人權問題持續追蹤，並聲稱以政府對自己的人民實行恐怖鎮壓為形式的「國家恐怖主義」—即「來自上面的恐怖主義」比其它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所造成的人權侵犯都要嚴重得多，³⁵⁸該署並據以斷定中共類似以武力鎮壓法輪功的事件，已儼然進行國家恐怖主義和違反人權問題。準此，如何有效處理國際間對其「國家恐怖主義」的疑慮，恐怕是中共在積極發展其國家安全戰略之餘所應思考的另一問題。

第二節 研究心得

壹、權力轉移理論的評價

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說在一定程度上批評了「均勢」思想，並指出國內的發展必然

³⁵⁸「聯合國國際教育發展署聲明」，2001年10月21日。<http://big5.yuanming.net/articles/200110/2193p.html>，檢索日期：2011年4月20日。

導致國際權力再分配的基本事實，並對新興大國崛起的所謂國際後果，作出了既以西方利益為中心，且較為平和的分析，不失為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在權力觀念方面的一種補充。雖然他對現實主義的理論貢獻遠不如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Waltz）突出，但他對權力變化的掌握，對不同國家因內在發展而出現的權力增長，具有一定的學術啟示。

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理論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首先，是受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發展興起的政治學影響，他強調國內政治和經濟發展對權力增長的決定作用。但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均有不同的模式，會形成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從而造成權力的不同性質。這就必然對一個國家追求、運用權力的基本方式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不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權力後果和對國際關係的作用是相當不同的，奧根斯基卻忽略了這一點，僅簡單地認為權力的增長就一定會構成對現有國際秩序的衝擊和挑戰。這樣的分析似乎過於簡單化。

其次，奧根斯基視全球工業化的進程為權力轉移的動力，也看到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國與國之間相互依存的局面。但他對全球經濟的發展與相互依存，對國際關係究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如何制約和改變國家對權力的傳統認知和追求，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什麼是權力的基本狀態，以及在時代變遷中國際關係的基本變化及其結果，卻幾乎沒有論及。而這些問題是在論述權力概念時不可回避的問題。如果站在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理論，在許多觀點上，都是需要重寫的。

第三、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理論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使他在觀察非西方國家時很難做到準確和公正。他的許多論述以中國為例，認為中國是潛在的權力大國，因而也是潛在的威脅。儘管他承認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中國不是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的德國和日本，但他強烈主張面對非西方國家的權力增長，西方國家應保持戰略優勢，甚至對「敵國」進行遏制。按此邏輯，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包含中國大陸）而言，只有永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才不會構成「威脅」，這種理論基礎有待商榷。

由於蘇聯瓦解，歐洲逐漸整合，國際政治的重心由歐洲逐漸向亞洲轉移，崛起中的中共將可能在這波國際局勢的變動中成為崛起強權，並有機會挑戰美國現有地位，誠如奧根斯基所言：「問題並不是中國是否將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而是他們要花多久的

時間達成此一地位，在 20 世紀末美國將持續維持世界領導的地位，甚至更長的時間，但是最終此一地位將轉移至中國」。中共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而這種成長的趨勢至今仍未減緩，並有景氣過熱的現象，致中共總理溫家寶不得不採取「宏觀調控」的手段，以穩定其經濟發展。根據「權力轉移理論」預估，如果中共的國力持續增強，中共將首先在經濟規模上超越美國，並在 2025 年前達成。而中共由於國內充足的資源與國際力量的成長，也確實使中共集體領導人，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能以自信、積極的態度面對。惟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共無可迴避的進入西方所建構的國際與區域格局中，並受這些國際或區域性組織的規範所制約。短期內，中共縱不滿意於現狀，但仍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因此，仍會選擇加速經濟發展，以充實國力的策略，以避免過早與現有的國際體系衝突，而耗損其正在蓄積的綜合國力。

當前對中共而言，足以爆發衝突並遭致國際干預的問題非領土爭議莫屬，其中又以台灣問題最具敏感性，而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也最大，處理此一問題，應以和平解決的方式為至當方案，除可避免與美國的直接對抗，亦可維持其國力持續的增長，更可獲得區域內國家的認同，確保區域和平。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胡 6 點」中指出，願意與台灣協商並達成全方位的協議，並且提出具體的措施，包括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以結束敵對狀態為主要內容的和平協議以及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問題。其中所指「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應是減少雙方衝突，可積極努力策進的方向。

貳、權力轉移理論驅動下的美中戰略競爭

冷戰後，美國與中共之間的力量變動，主要是來自於雙方各自的內部出現不同速度與幅度的發展，尤其是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與軍事現代化。首先，在權力轉移理論所假定之層級節制的國際體系裡，美國與中國分別擁有不同的國際地位—美國較中國位處於較高階的國際地位，美國也較中國富有，擁有更強的國家力量與能力。然而，美國與中國力量的變化確實是反映在兩個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逐漸在縮小或接近當中。就經濟方面來說，當我們比較這兩個國家各自的「國內平均生產毛額之購買力平價」(GDP)時，我們發現從 2004-2010 年間，美國的購買力平價是從 2004 年的 11.8678 億美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14.6604 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為 4.28%。在同一期間，中國的購買力

平價則是從 2004 年的 1.9316 億美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5.8785 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則為 14.29%。而兩國在此一項目上的比值也從 2004 年的 1.93 縮小至 2010 年的 1.29。這說明，雖然中國的購買力平價（GDP）還是低於美國，但是中國的經濟力量正在快速地趕上美國當中。此外，從 2005 年到 2010 年之間，美國的經濟成長率從 2005 年的 3.1% 降至 2010 年的 2.9%（其中在 2008 年的成長率為零，2009 年為負 2.6%），年平均成長率為 3.27%；而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從 2005 年的 11.3% 降至 2010 年的 10.3%（其中在 2006 年的成長率為 12.7% 及 2007 年的 14.2% 均為正成長），年平均成長率為 9.42%。這個趨勢也說明了，假如中國能每年保持過去以來的高平均經濟成長率，而美國相對是維持較低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則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是會很快速地縮短。

就軍事方面來說，美中的權力轉移變化也確實反映在兩個國家的軍事實力逐漸在接近當中。當我們比較這兩個國家各自的「軍事支出」時，本文發現從 2000 年到 2007 年之間，美國的國防支出是從 2000 年的 3,421.72 億美元，（以 2005 年為基準）升高到 2007 年的 5,783.15 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為 14.29%。在同一期間，中國的國防支出則是從 2000 年的 237.78 億美元升高到 2007 年的 582.65 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亦為 4.29%。而兩國在此一項目上的比值也從 2000 年的 14.39 縮小至 2007 年的 9.38%。這也表示，雖然目前中國的軍事支出（或軍事力量）仍不足與美國相互匹敵（2010 年中國國防費預算為 5321.15 億元人民幣，比 2009 年增長 7.5%。），但是中國的軍事力量正在逐漸接近美國當中。根據美國國防部 2010 年 8 月 16 日向美國國會所提出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³⁵⁹指出，中共的大戰略還是依照「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鄧小平遺訓，以維持區域內、外的穩定國際環境，俾使中共能持續高速發展經濟為主軸，畢竟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最大基礎。但「報告書」舉出七項可能改變這一大戰略主軸的內、外因素，以支持其對中共內部目前存在的未來戰略走向分析。這包括中共敏感的民族主義、為了持續發展經濟而必須面對的資源因素、國內政治壓力、人口問題、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變動性甚高的臺海議題和區域領土糾紛。這七項因素已開始在中共內

³⁵⁹ 根據美國國會在 1999 年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此份報告最遲應在月 1 日送達國會。可是美國防部遲至 8 月 16 日才完成，而且名稱也從一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變成「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

部引發針對未來戰略方向的辯論，目前出現兩種對立的新戰略主軸：一是加強與美國合作，二是在國際議題上採取以中共利益為核心考量的強硬態度，並避免遭到美國的圍堵。

在觀察中國的經濟與軍事成長，以及它對國際秩序現狀的不滿之後，依據權力轉移理論，本文認為美中的戰略競爭主要是受兩國間的力量流動變化所驅使；而美中的衝突與戰爭最有可能發生的時候便是在北京後來居上的過程裡。當中國成長得更快的時候，美中的安全穩定會更形惡化，而雙方的軍事衝突也就愈快到來。事實上，從 1980 年代以來，華盛頓與北京已在許多議題上發生過了摩擦與衝突，諸如：人權迫害、核武擴散、雙邊貿易、區域經濟整合、朝鮮半島六邊會談、美日安全保障協定、台灣與西藏問題等。許多亞洲或東亞的政治觀察家也預測，美中之間的衝突，甚至是戰爭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會迅速地到來。以目前來看，或許中國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全面挑戰由美國所掌控的國際體系，然而如果沒有它的經濟發展與軍事現代化，也沒有權力轉移的發生，挑戰美國對北京來說會更形困難。就此而論，本文認為權力轉移正是驅動美中雙方之所以進行戰略競爭的最主要力量。

參、現階段美中戰爭沒有爆發的原因

本文認為，美中戰爭之所以被阻止或延遲的主要因素是受到美中雙方對彼此採行的「態度」與「政策」所影響，也就是以下的兩股力量：一是華盛頓對中國所採行相當程度的交往政策，二是北京向美國與全世界所宣稱的「中國和平崛起」。

一般而言，對霸權國家或是衛冕者國家來說，其對崛起中的強權國家或是挑戰者國家的政策回應可以有以下的方式：(1) 預防性的戰爭 (preventive war)，(2) 制衡或圍堵 (balancing or containment)，(3) 附和順從 (bandwagoning)，(4) 網綁拘束 (binding)，(5) 交往 (engagement)，(6) 隔離或推諉 (distancing or buckpassing)，以及 (7) 混和策略 (mixed strategies)。其中，「制衡或圍堵」與「交往」可被視為政策光譜的兩個端點 (極端不友善 vs. 極端友善)，採行「制衡或圍堵」的作法可被視為是崛起的強權採取「不友善」的政策，通常此一作法也較易引起衛冕者與挑戰者之間的「衝突」。相反地，採行「交往」的作法則可被視為是對崛起的強權採取「友善」的政策，通常此一作法也較易於形成衛冕者與挑戰者之間的「合作」，避免雙方爆發衝突與戰爭。因此，國家與

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常常是彼此對另外一方所採行之態度與政策的結果所影響。就美國而言，從 1972 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訪問中國，打開中國的大門以來，「交往政策」顯然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主軸（雖然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也有若干制衡與圍堵的思維）。雖然美中雙方在許多國際議題上仍存有許多的歧見，但是這個政策的主要效應卻是在相當程度上「緩和」了美國與中國走上衝突與戰爭的可能性。基此，本文推論，假設美國將其對中國的「交往」態度，大幅度地調整為「制衡與圍堵」（如對前蘇聯）的政策，則美國與中國走向戰爭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

就中國而言，雖然中國正快速地崛起中，但中共似乎仍沒有強烈的意願與美國進行全面的對抗與挑戰。而事實上，中國所採行的政策是「雙面刃」的作法：一方面從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不斷地在國際上宣傳解釋其發展乃是「和平之崛起」，希望藉此消弭國際社會與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擔心與焦慮；另一方面，中共仍不斷保持其軍事現代化的發展，逐年增加其軍事費用的支出。因此就「和平崛起」來說，此一說法的提出，正說明中共深刻體認到，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可能對中共造成負面的衝擊，如果它無法改變其他國家對此的疑慮，則中共的崛起與壯大，反而會阻礙中共繼續走向現代化與全面發展，同時也會阻止中共最終成為一個區域與全球的霸權。於是中共遂極力進行國際宣傳，努力將盛傳於 1990 年代初的「中國威脅論」扭轉成為現今的「中國和平崛起」印象。就這個轉變而言，中國訴求的對象，除了是整個國際社會之外，更重要的是針對美國。因為中共相信美國是中國邁向區域或全球霸權的最關鍵國家，因此有必要讓其相信與接受一個崛起的中國大陸對區域或全球是有利的，是溫和善良的，並且是有建設性的。同樣的道理，這個國際宣傳的主要效應也的確「緩和」了美國與中國走上衝突與戰爭的可能性。因此，本文也推論，假設中共揚棄「中國和平崛起」的論述，轉而不顧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論」的質疑與焦慮，而更「坦率直接」地擴增軍事實力與採取鷹派姿態，則中國與美國（或其他國家，如日本、台灣、印度）走向戰爭的可能性也將大為提高。

另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權力一直是觀察與評估國際體系之變化，以及強權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關鍵。靜態的力量展示讓我們看到國家之間有強弱的區別。也因為國家力量

與影響力的不同，以國家為最主要構成單元的國際體系則有層級節制的結構呈現。而動態的力量變化則是讓我們看到隨著國家力量的此起彼落，國際關係為之轉型，國際體系與秩序因此而重新建構。基此，本文認為權力非但是觀察美中雙方的重要基礎，它們彼此之間權力的流動與變化更是討論美中關係與現今（或未來）東亞區域秩序，乃至全球國際秩序的一個重要根據。事實上，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的許多現象正如物理學中的力學原理一樣，是可援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平衡」以及「力量與速度」等概念來解釋說明的。而本文的出發點即是從「力」以及「力之流動與平衡」的概念來解釋國家與國家之間何以會進行戰略競爭。

從某種程度來說，權力轉移即是權力流動變化的一種現象，在權力重新分布的轉換過程裡，不只是國家與國家的雙邊關係受到權力轉移的影響而改變，而且區域與全球的國際秩序也因為國家之間實力的接近而重新調整。美中關係的變化即是一個典型的以「權力重新分布」為基礎的權力政治。美國與中共之所以進行戰略競爭，其最主要的驅動力量係來自於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包括雙方各自內部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的不平均發展（而且是中國高於；且快於美國），以及外部的國家實力接近。這個現象適足以被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轉移理論」所解釋。

參考文獻

壹、中文書籍

- 丁樹範，胡錦濤時代的挑戰，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2002年。
- 王高成，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戰略，臺北：五南出版社，2005年。
-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
- ，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中共軍隊高中級幹部理論學習讀本，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 中國大陸綜覽，臺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年。
-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1-2002），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主編，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8年中國的國防，北京：國務院新聞辦，2008年。
- 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1997年外交政策回顧」，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7年。
- 向駿編，2050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臺關係之迷思，臺北：博揚文化出版社，2006年。
-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 李京文主編，21世紀中國經濟大趨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李維亮、許克儉主編，軍事體育年報，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汪新等著，讀懂江澤民：江澤民治黨治國方略研究，臺北：華文出版社，2006年。
- 李劍鳴，美國通史1卷（1585-177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李而炳，21世紀前期中國對外戰略的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

林正義，臺灣安全三角習題：中共與美國的影響，臺北：桂冠，1989。

James H. Mann 著，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臺北：先覺出版社，1999 年。

Vic George Paul Wilding 著，林萬億、周淑美譯，全球化與人類福利，臺北：五南，2004 年。

邵宗海，「胡錦濤對臺政策之分析 2002 年－2007 年」，收錄於楊開煌主編，胡錦濤政權之續與變論文集，臺北：問津堂書局，2007 年 12 月。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1993 年。

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大外交，臺北：智庫文化，1998 年。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 (1989-1997)，臺北：生智出版社，1999 年。

胡為真著，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臺北：商務書局，2001 年。

胡勝正著，林正義主編，2025 年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預估，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1 年 4 月。

胡鞍鋼、楊帆，大國戰略－中國利益與使命，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美)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著;(美)肯尼士·湯普森(Kenneth W. Thompson)修訂；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 年。

袁易、嚴震生、彭慧鸞合編，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1)，高一中譯，中共崛起構成的挑戰：亞洲觀點，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

翁明賢、吳建德主編，國際關係，臺北，五南，2006 年 8 月。

張友倫，美國通史 2 卷 (1775-186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

陳文賢，柯林頓及布希政府的中、臺政策：決策小組之研究途徑，臺北：一橋出版社，2002 年。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98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9 年 10 月。

Ronald L. Tammen 等合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張蘊嶺、趙江林主編，走發展、合作、開放之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 年。

張亞中、孫國祥合著，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伙伴，臺北：生智文化，1999 年。

Fred N. Kerlinger、Howard B. Lee 著，黃營杉、汪志堅編譯，研究方法，臺北：新加坡商亞洲湯姆生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9 月。

楊松河，軍事外交概論，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1999 年。

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劉飛濤，21 世紀前期中國對外戰略的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

盧建旭，朱宏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文獻評論，臺北：正中書局，1999 年。

貳、中文期刊、論文

一、中文期刊

丁樹範、王俊評，「美國『2010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內容分析與其戰略意涵」，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9 期，2010 年 9 月。

王高成，「柯林頓的中共經貿政策」，美歐月刊，第 11 卷第 2 期（1996 年 2 月）。

王朝瑞，「大陸人口增長與就業態勢前瞻」，台海兩岸前瞻探索，24 期，2000 年 11 月。

王逸舟，「論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4 期（1998 年 4 月）

王崑義，「中國的『和諧外交』與對南太平洋的擴展」，發表於台灣與南太平洋學術研討會（臺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2007 年 6 月 9 日）。

王央城，「回顧 2007 年中國軍力發展」，戰略安全研析，第 34 期（2008 年 2 月）。

石原忠浩，「日中簽署『第四公報』後的日中關係與台灣」，戰略安全研析，第 38 期（2008 年 6 月）。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第 3 期，2006 年。

朱蓓蕾，「全球化與中共安全觀：轉變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6 期，2003 年 11 月。

阮宗澤，「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理論探討」，發表於「中國的和平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圓桌會議（海南：博鰲亞洲論壇與中國改革開放論壇聯合主辦，2004年4月24-25日）。

汪新等著，*讀懂江澤民：江澤民治黨治國方略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

吳克燕、張一民，「美加阿拉斯加邊界衝突」，*社會科學論壇*，9卷（2005年）。

Lawrence Spinetta 著，吳晨輝譯，「斬斷中共的珍珠串」，*國防譯粹*，2007年1月。

吳英明、林麗香，「全球化與中國新安全觀」，*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第3期（2000年3月）。

李瓊莉，「當前美國亞太政策中的經濟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4期（1997年）。

林郁方，「美國提升亞太經合會議地位之動機」，*美國月刊*，第8卷第7期（1993年）。

門洪華，「權力轉移、問題轉移與範式轉移—關於霸權解釋模式的探討」，*美國研究*，2005年第3期，頁7。

林麗香，「解放軍政治角色轉變之研究」，*中共研究*，第39卷第11期（2005年11月）。

林正義，「美國國防部長蓋茲訪中與美中軍事熱線」，*戰略安全研析*，第32期（2007年12月）。

林正義，「胡錦濤訪韓與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戰略安全研析*，第42期（2008年10月）。

俞正梁，「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最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3年）。

宮力，「試論毛澤東的外交思想」，*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第4期（1999年10月）。

唐世平，「國際政治理論的時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4年第1期（2004年1月）。

孫國祥，「全球治理的困境與東協反恐模式之探討」，發表於第三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臺北：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2007年11月）。

孫學峰，「大國崛起與體系戰爭：對兩種理論解釋的質疑」，*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頁3-4。

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年第1期（2003年1月）。

陳文賢 (1999/2), 「國際環境對中共核武政策發展的影響」, 問題與研究, 第 38 卷, 第 2 期。

梁光烈, 「與時代同行的中國軍事外交」, 中國外交月刊, 第 3 期(2009 年 3 月)。

現代國際關係編輯部, 「大國關係與中國外交」, 現代國際關係 (北京), 1998 年第 1 期 (1998 年 1 月)。

張雅君, 「『十六大』後的中共外交：相互依賴深化下的利益、挑戰與政策取向」, 中國大陸研究, 第 46 卷第 2 期 (2003 年 3 月), 頁 1-26。

張蘊嶺, 「如何認識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國際環境」, 當代亞太, 第 6 期 (2003 年)。

黃仁德, 林進煌, 「亞洲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基金的角色」,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1 期, 2007 年。

楊曉輝, 「中國石油戰略的西南佈局」, 當代亞太, 2004 年, 第 3 期。

楊國華, 「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的影響及啟示」, 國際經濟合作, 1998 年, 第 7 期。

葉自成, 「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 世界經濟與政治 (北京), 第 1 期 (2000 年 1 月)。

鄧中堅, 「美國貿易政策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發展」, 理論與政策 (1994 年)

蔣本良, 「當前大國關係新格局」, 國際問題研究 (北京), 1998 年第 2 期 (1998 年 5 月)。

劉宜友, 「對中共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之研析」, 國防雜誌, 第 21 卷 5 期, (2006 年)。

樊勇明, 「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 現代國際關係, 第 9 期 (2000 年 9 月)。

鄭端耀, 「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 問題與研究, 42 卷 2 期(2003 年 3-4 月)。

龐中英, 「和平崛起：關鍵在『和平』」, 世界觀察, 2005 年 4 月 11 日。

二、學位論文

呂冠頤, 「現狀霸權與崛起強權互動模式之研究：一個理論與歷史的分析途徑」, 臺灣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 (2002 年)。

廖文義, 「美國因應「中國崛起」之思維與策略：兼論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攻勢現實主義」,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所博士論文 (2007 年)。

蔡政修, 「後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共的經貿政策：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分析」,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1 年)。

林佩瑩，「911 事件後中共對美戰略與安全關係之研究」，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康崇旗，「中國崛起：美國認知與中美戰略互動」，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參、英文書目

A.F.K.Organsky,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 *World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A.F.K.Organsky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Bemis Samuel F., *John Quincy Adams and Found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Knopf, 1965.

———,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enry Holt, 1955.

Billington Ray Alle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4.

Booth Ken &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London: Polity, 1995.

Buckley Walter, ed. *Modern Systems Research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Chicago: Aldine, 1968.

Brown Michael E. ed,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Braybrook David & Charles E. Lindblom, *A Strategy of Deci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Books, 1997.

Buzan, Barry &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Burton John W. *Systems, States, Diplomacy and Rul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ndler David G.,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Claude Jr. Inis 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Daalder Ivo H. &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 Institute Press, 2003.
- Dougherty James E.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th,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1.
- Ehrman, Joh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Flanaga, Stephen J. and Michael E. Marti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3.
- Gaddis, John Lew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Goldstein, Avery.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oldstein Joshua S.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s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Hsu, Francis L. K. ed. *American &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 3r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1.
- Hunt, Michael H.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 Ikenberry, G. John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Jespersen, T. Christopher. *America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 Kagan, Robert.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3.

- Kegley Charles W. and Gregory Raymond, *A Multipolar Peace? : Great-power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 Kissinger, Henry A.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 Keohane Robert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New York: Longman, 2001.
- Kennedy, Paul ed.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3.
-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 Khalilzad, Zahmay M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9.
- Kupchan, Charles A.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 Lafeber Walt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2: 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 1865-191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ampton, David M.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 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 Little Richard and Steve Smith, *Belief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 Mead, Walter Russell.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1.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 Mitchell, B. R.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1750-1988* 2nd, New York: Stockton, 1993.
- Modelski George.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0.

- Morley William ed.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Munro, Ross H.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 Murray Williamson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s States an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yers Ramon H. Michel C. Oksenberg and David L. Sambaugh eds. *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 Nye, Jr Joseph S.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90.
- .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3rd,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O.E.C.D.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2*. Paris: OECD/IEA, 2002.
- Perkins Bradfor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1: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 Empire, 1776-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umphrey Carolyn W, *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
- Russett Bruce. *Controlling the Sword: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ti, Brian Efirid and A.F.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LLC., preface, 2000.
- Shulsky Abram N. *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 Schweller Randall L.,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Tammen and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 Terrill Ross, *The New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Basic Book, 2003.

-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guin, 1980.
- Truman Harry. *Memories: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6.
- Verano John W. and Douglas H. Ubelader eds. *Disease and Demography in the America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2.
- Vogel Ezra F. *Living with China: U. 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idenor William C. *Henry Cabot Lodge and the Search for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rk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1980.
- Wight Martin, *Power Politic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8.
- Wolfers Arnold,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62.
- Woodward, Bob. *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 Wright, Quincy. *A Study of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肆、英文期刊

- Abramowitz Morton & Bosworth Stephen, "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 *Foreign Affairs* 82(4) (July/August, 2003), p. 119-131.
- Aggarwal Vinod K. and Min Gyo Koo, "The Evolution of APEC and ASEM: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East Asia Bilater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2) (September, 2005), p. 233-261.
- Betts Richard K. and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Getting the Questions Right," *National Interest*, 62 (Winter, 2000/2001), p. 17-29.
- Berger, Yakov. "China's Energy Strategy," *Far Eastern Affairs* 32(3), (2004), p. 45-65.
- Bremmer, Ian. "The Dragon Awakes." *National Interest* 80 (Summer, 2005), p. 128-134.
- Brooks Stephen and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81(4) (July/August, 2002), p. 20-33.

- Bunn M. Eaine, "Preemptive Action: When, How, and to What Effect?" *Strategic Forum* 200 (July, 2003), p.1-8.
- Campbell Horace, "China in Africa: Challenging US Global Hegemon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9(1) (February, 2008.), p. 89-105.
- Chen Edward I-hsi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Overview of U.S.-PRC-ROC Relations," *Views & Policies* 2(1), (December 2005), p. 1-35.
- Chi Wang, "Witnessing Change: Three Decades of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 9(1), (2008), p. 41-44.
-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75(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 37-52.
- . "China,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4) (Spring 1999), p. 49-78.
- .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1) (Summer 2006), p. 81-126.
- Copeland Dale C, "Neorealism and the Myth of Bipolar Stability: Toward a New Dynamic Realist Theory of Major War," *Security Studies* 5 (Spring 1996), p. 29-89.
- Cossa Ralph, "US Security Strategy in Asia and the Prospects for an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 *Asia-Pacific Review* 12(1) (May 2005), p. 64-86.
- Diehl Paul and Gary Goertz, "Territorial Changes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2(1) (March 1988), p. 103-122.
- Dreyer June Teufel, "US-China Relations: Engagement or Taking Past Each Oth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7(57) (November 2008): 591-609.
- Economy Elizabeth, "Don't Break the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83(3) (May/June, 2004), p. 96-109.
- Ellis Jason D. & Todd M. Koca, "China Rising: New Challenges to the U.S. Security Posture," *Strategic Forum* 175 (October 2000), p. 1-4.
- Ferguson Nail, "Hegemony or Empire," *Foreign Affairs* 82(5) (September/October, 2003), p. 154-161.
- Forsyth David P., "US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4) (December 2002), p. 501-521.

- Friedberg Aaron L.,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 (Fall 2005), p. 7-45.
- Chellaney Brahma, "Forestalling Strategic Conflict in As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9(9)(November 2006), p. 29-33.
- Gholz Eugene Press Daryl G. and Sapolsky Harvey M.,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4) (Spring 1997), p. 5-48.
- Gill Bates, "Limited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8(4) (July/August, 1999), p. 65-76.
- Gray Christine,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New Bush Doctrine on Preemptive Self-defens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2) (2002), p. 437-448.
- Godwin Paul H.B., "From Continent to Periphery: PLA Doctrine,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Towards 2000," *China Quarterly*, 146 (June 1996), p. 464-487.
- Hass, Ernst B., "The Balance of Power: Prescription, Concept or Propaganda," *World Politics* V (July 1953), p. 442-477.
- Hirsh Michael,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81(5) (September/October, 2002), p. 18-44.
- Hughes Christopher, "Not Quite the 'Great Britain of the Far East': Japan's Security,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East Asi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 (June 2007), p. 325-338.
- Hu Richard W.X., "APEC and Future Asia-Pacific Regional Architectur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31(1) (January 2009), p. 12-22.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US-Dilemma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67(2) (Winter 1988/1989), p. 76-96.
- Jencks Harlan W.,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 Military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19(8) (August 1979), p. 801-815.
- Jue Stanton, "US-China Relations: Lessons Learned,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 9(1) (2008), p. 35-39.
- Kindlberger Charles,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2) (1981), p. 242-254.

- Kravis, Irving B. "An Approximation of the Relative Real Per Capita GD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5(1) (March 1981), p. 60-78.
- Kristof Nicholas D.,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72(5) (November/December, 1993), p. 59-74.
- Kristol William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75(4) (July/August, 1996), p. 18-32.
- Labs Eric J., "Countering Attack Sub Shortfalls,"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28(9) (September 2002), p. 46-49.
- Lai Hongyi Harry. "Behind China'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S.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2) (April 2001), p. 237-255.
- Lampton David M., "Th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Foreign Affairs* 86(1)(January/February, 2007), p. 115-127.
- Lee Dong Sun, "Democratization and US-South Korea Alliance," *Journal of East Asia Studies* 7(3) (Sep/Dec, 2007), p. 469-499.
- Litwak Robert S., "The New Calculus of Preemption," *Survival* 44(4) (Winter 2002-2003), p. 53-80.
- Lowry, Richard, "Reaganism vs. Neo-Reaganism." *National Interest* 79 (Spring 2005), p. 128-134.
- Lord, Winston, "China and America: Beyond the Big Chill," *Foreign Affairs* 68(4) (Fall 1989), p. 1-26.
- Lynn-Jones, Sean M., "Book Review o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8(2) (April 2002), p. 365.
- Marti, Michael E., "China: Making the Case for Realistic Engagement," *Strategic Forum* 185 (September 2001), p. 1-4.
- Maynes, Charles William, "Contending Schools," *National Interest* 63 (Spring 2001), p. 49-58.
- Macfarlane, S. Neil,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80(3) (May 2004), p. 447-461.
- Mertus, Julie, "Raising Expectations: Civil Society's Influence on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3(1)1 (March 2004), p. 21-40.

- Munro, Ross H.,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62 (Fall 1992), p. 10-17.
- Nye, Joseph,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Fall 1990), p. 153-171.
- ,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4(4) (July/August, 1995), p. 90-102.
- ,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Survival* 39(4) (Winter 1997/1998), p. 65-79.
- , "The Future of China-US Relations," *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 9(1) (2008), p. 29-34.
- Pablo-Baviera, Aileen San, "The China Factor in U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and the Asia Pacific 1,"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7(2) (July 2003), p. 339-353.
- Pavliatenko Victor, "U.S. Policy in East Asia: Interes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ar Eastern Affairs* 30 (3) (2002), p. 67-86.
- Rosen Barry and Andrew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 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3) (Winter 1996/1997), p. 5-53.
- Roy Denny, "Rising China and U. S. Interest: Inevitable vs. Contingent Hazards," *Orbis* 47(1) (Winter2003), p. 125-137.
- , "China's Reaction to American Predominance," *Survival* 45(3)(Autumn 2003), p. 57-78.
- Rumer Eugene B., "Central Asian Leadership Succession: When, Not If," *Strategic Forum* 203 (December 2003), p. 1-6.
- Scalapino Robert A., "Asia-Pacific Security: The Current Balance of Pow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8(3) (September 2004), p. 368-376.
- Schmidt Todd,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raming an Authentic Preemptive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Military Review* 86(5) (Sep/Oct, 2006), p. 75-83.
- Shambaugh David, "Growing Strong: China's Challenge to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36(2) (Summer 1994), p. 43-59.
- ,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2) (Fall 1996), p. 180-209.

- ,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3), (Winter2004/2005), p. 64-99.
- Singer David & Melvin Small, “The Composition and Status Orde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815-1940,” *World Politics* X V III(18), (January 1966), p. 236-282.
- Singh Jaswant, “Against Nuclear Apartheid,” *Foreign Affairs* 77(5), (September/October, 1998), p. 41-52.
- Snyder Glenn H.,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1), (Summer 2002), p. 149-173.
- Spence Jonathan D., “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 *Foreign Policy* 146 (January/February, 2005), p. 44-46.
- Steinberg James, “Preventive Force in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urvival* 47(4), (Winter 2005), p. 55-72.
- Sutter Robert, “China’s Rise in Asia: Are US Interests in Jeopardy?” *American Asian Review* X X I(2), (Summer 2003), p. 1-21.
- , “Why Does China Matter?,” *Washington Quarterly* 27(1), (Winter 2003/2004), p. 75-89.
- Terris Ross, “What Does China Want?” *Wilson Quarterly* 29(4), (Autumn2005), p. 50-61.
- Tucker Robert W., “Reaga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68(1), (1988/1989), p. 1-27.
- Ward Adam, “China and America: Trouble Ahead?,” *Survival* 45(3), (Autumn 2003), p. 36-56.
- Wei Liang, “China’s WTO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1(3), (November 2002), p. 683-719.
- Weston Stephanie A.,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New Post Cold War,” *Japanese Studies* 24(1), (May 2004), p. 45-57.
- Yordan Carlos L.,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Book Re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6(1), (2003), p. 89-92.
- Yong Deng, “Hegemon on the Offensiv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 Global Strateg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6(3), (Fall 2001), p. 343-365.
- Zoellick Robert B., “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79(1) (January/February,

2000), p. 63-78.

伍、報刊

一、中文報刊

中國時報

中央日報

自由時報

青年日報

工商時報

聯合報

聯合早報

南華早報

人民日報（北京）

環球時報（北京）

解放軍報（北京）

中央社（北京）

文匯報（香港）

二、英文報刊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Los Angeles Times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Times

陸、網站資料



一、中文網站資料

中共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

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8221/51758/51931/51935/3626059.html>.

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10/20/content_6913002.htm.

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44325.htm>

中新網，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051215/12949764.html

中國新聞網，<http://www.cns.hk:89/gn/news/2008/07-29/1327576.shtml>

東北新聞網，<http://mil.nen.com.cn/military/284/3192284.shtml>

世界新聞網 http://www.worldjournal.com/wj~editor.php?nt_seq_id=1616988

朝日新聞（東京），<http://sss.asahi.com/politics/update/0507/TKY200805070034.html>

韓國時報（首爾），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08/05/116_24859.html

解放軍報網，

http://www.pladaily.com.cn/pladaily/shichuang/2001108/gb/2001108001252_dongtai.html

中國軍網，<http://www.chinamil.com.cn/>

二、英文網站資料

美國非政府組織軍事網，<http://www.globalsecurity.org/>

美國國防部，<http://www.defenselink.mil>

詹氏防衛週刊 <http://jdw.janes.com/public/jdw/index.shtml>

蘭德公司 <http://www.rand.org>

布魯金斯學會 <http://www.brookings.org>

戰略研究中心 <http://www.africacenter.org/>

美國新世紀計畫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

聯合國 <http://www.un.org>